

鐘聲

ZHONGSHENG



秋怡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2013 加州聚会



钟声



ZHONGSHENG

March 2014

北美钟声整整二十岁了,本刊是第20期,图文并茂精心编辑装潢出色的60余页,将成为北美钟声的里程碑和各位校友收藏的珍品。

1994年12月创刊时,李忠明主持,6页简易印刷,不知当时收到创刊号的校友有否想到,钟声就此连续敲响了20年,热忱的钟声团队每年都继续在为北美广大的校友团体忙碌耕耘。回顾前面八期的封面都是素色的,第2期还有手写的启事,会员费收集在20人左右,每期在10到12页左右。接下来的五期,没有看到主持人的名字,但是很多熟悉的名字都持续地撰稿,他们都是热心人,第9期至第11期钟声,陈文乔主持由柯捷出版社正规出版,不幸的是文乔在2005年英年早辞。那年秋天文乔病重,委托德霖将已经在筹稿的第12期完成,全靠大家帮助,钟声12期顺利出版告慰文乔。

从第13期起,多位热心校友参与了钟声的编辑工作,吴攸承校友在大家的帮助下做最后的编排,近八年来,我们的钟声年刊图文并茂,超越专业水平,在大家的协同下,每期都在40页到60页。2012年起,现在的编辑组以钟声和编辑组成员周家钧主持的北美位育网站为中心为大家服务,贡献宝贵的精力时间,每期都在250份印刷量以上,和我们的会员数相称。

每年年底和年初,是编辑组最忙碌的时期,征稿,校对,查证,讨论,大家群策群力,为出版新一期钟声而努力。今年我们收到的稿件数量创历史新高,在此向各位投稿的校友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编辑组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做有限的编辑以便出版,但与文章的观点无关,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

没有传统的位育精神,这20年不可能一路走来,谢谢大家的支持。

钟声编辑组:

蒋青,王家斌,叶善章,吴攸承,叶秋怡,

周家钧,华非非,孙雯, 瞿德霖

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第二十期

- | | | |
|----|------------------------------|--------|
| 2 | 加州湾区行 - 记 2013 年校友会聚会暨旧金山地区游 | 宓哲新 |
| 6 | 但愿同窗情长久-记 2013 秋北美位育校友聚会 | 柯晓明 |
| 7 | 是同学会牵的线 | 罗自平 |
| 8 | 从位育 70 周年校庆到回忆我们的老师 | 陈怀谷 |
| 13 | 70 周年校庆速写 | 汤沐黎 |
| 14 | 重现青春六年 | 汪维雯 |
| 17 | 2013-聚会加州积累经验 | 瞿德霖 |
| 18 | 难忘位育情结 | 黄承海 |
| 22 | 破阵子-贺母校七十华诞 (填词一首) | 吉力立 |
| 23 | 怀念胡文梅老师 | 叶秋怡 |
| 24 | 西雅图探师记 | 诸葛奇 |
| 25 | 位育中学原校址 | 林 更 |
| 26 | 超晶格的先驱 | 叶秋怡 |
| 28 | 我在大洋洲看《北美位育人》 | 王伟国 |
| 29 | 我的钢琴老师 杨嘉仁 | 张秉颐 |
| 30 | 向照顾潘承芬老师的上海位育校友致敬 | 俞吉慧,孙雯 |
| 32 | 别了,我的秋叶! | 柯晓明 |
| 33 | 家长里短 | 殷蔚芷 |
| 34 | 明州情结 | 柯晓明 |
| 35 | 田长霖教授位育情结 | 黄承海 |
| 36 | 乐在骑中 | 周家钧 |
| 37 | 羽毛球画 | 周国辉 |
| 38 | 在布拉格的“计划外”旅程 | 王家斌 |
| 39 | 旅欧散记 | 李定一 |
| 40 | 西贡行 | 石洪基 |
| 43 | 海外游子吟 (歌词五首) | 柯晓明 |
| 44 | 粗茶淡饭忆往事 | 王家斌 |
| 46 | 一个工人的儿子-悼念毛金华同学 | 张立民 |
| 47 | 怀念我家阿姨 | 袁哲明 |
| 50 | 我的伯父张歆海 | 张秉颐 |
| 51 | 托比的故事 | 姚方方 |
| 52 | 在迪斯尼推销我的 T 恤画作 | 周国辉 |
| 54 | 燕飞莺鸣 -油画《周小燕》创作手记 | 汤沐黎 |

1994-2014





加州湾区行

记 2013 年校友会聚会暨旧金山地区游

宓哲新 67 届

我和王家斌很早就报名参加2013年的加州聚会了，还和相熟的校友联络，相约在加州见面。9月7日，怀着期盼的心情，我们赶了八个多小时的路，来到了聚会会场。这次活动跟以往各次不一样，会场大，参加的人多，入口处有专人负责签到、登记，发名牌、纪念章，有志愿者摄影师在忙前忙后为大家照相。会场里布置了五彩气球，正面还拉起了大横幅“欢迎位育（51）中学北美校友会2013团聚”。

一进门就见到那么多熟悉的、认识的面孔，听到亲切的乡音，我们回到位育人中间了。首先见到的是我弟弟中学同桌、他最要好的朋友周国刚。他是周家四兄弟里的老四。我们两家都住在襄阳南路上，是相隔几个门牌号码的邻居。我们都是位育小学（后来改名襄阳南路第二小学）的校友。后来发现这次参加聚会的一共有17位位育小学的校友呢。我有三位小学同班同学住在加州：周瑞桢（Frank）、洪大德和贾通艺。周瑞桢与我早就联络好了。在聚会前一星期，洪大德给我电邮说他已经从工作地上海回到加州，会参加校友聚会。他和我先后发电邮给贾通艺，邀他来参加。贾通艺因此临时改变计划，订了机票来参加聚会，成了最后报名的校友之一。他是我从托儿所起一直到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同校的小朋友，近五十年后再见，非常难得。

随着校友们陆续到来，会场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有四位老师前来参加：谷红宝老师教过我体育，杨宝琳老师教过王家斌英语，另二位是陈明赉老师和金承熹老师。我们67届高中同学有朱凯靖、谢宇新、蒋青、史美进和薛嘉禾。薛嘉禾与熊谊民（66届初中）夫妇一起前来，2007年的校友聚会就是在他们家举行的。那年参加的最年轻的校友王轶伦（2005届高中）当时还是大学生，现在已经工作、结婚了，她也来参加了。2011年明州聚会，认识了叶秋怡和瞿德霖，以后我们保持了联系。2010年聚会时见到的陈旦丽、梁家琨，这次又相聚了。66届高中的还有李慕靖、黄土耀、郑慧敏、苏红军、安久等人。原来在学校里就熟识的王敦平、许敏青已有45年没有见面了，可她们还都显得很年轻。矫桂瑾当年在学校里出钟声黑板报时跟我共事过。

周家钧是我在校话剧队时的队长。这次我认识了许多话剧队的前辈，包括老队长顾刚，周瑞桢的姐姐周玉书，东道主赵振平学姐，周国辉、周国权师兄等等。这次还见到了那么多加州的老师校友，那么多前辈师兄学姐。加州是位育校友会成员人数最多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次校

友会历史上最盛大聚会成功的基础。

聚会由59届周国辉主持，东道主兼召集人赵振平介绍了这次聚会的筹备过程并致欢迎词。召集人瞿德霖致欢迎词，召集人叶秋怡谈校友会财政和钟声征稿，周家钧谈北美位育人网站。校友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有周国辉的朗诵和独唱，周国权的男高音独唱，蒋青的评弹，还有周国权和周家钧的诗朗诵。这首“老师啊，老师”诗的作者是话剧队老队长顾刚。顾刚也在会上发言致词。校友们的发言，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精彩的节目表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主持节目的周国辉一家四兄弟，都是位育人。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四周国刚，还有老二周国权和老三周国屏。这次聚会，四兄弟都出席了。位育学生大多来自徐汇区，像这样一家兄弟姐妹，父母和孩子都上位育的例子还很多。这次来聚会的就有金承杰师兄和金承熹老师兄妹，周玉书和周瑞桢姐弟，范培培和周凡母女。此外，通过位育校友关系还可以连接上许多别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关系。聚会时照相，除了按班级、年级照，还有原话剧队合影，原位育小学（襄二小学）合影，原世界小学（淮二小学）合影，陈文丽老师教过的学生和陈老师的女儿赵振平合影，原丰收拖拉机厂同事和家属合影（王家斌和61届初中的林嗣康在那个厂同事了十几年）等等。

这天最忙的是两位志愿者摄影师，郑慧敏的先生Sammy和周瑞桢。他们在聚会前几天分别特地赶到会场看场地、测光线，为拍下最好的照片做足了准备工作。Sammy专门负责拍聚会的集体照，因为人多，场面大，而且各人忙着说话，所以调度和拍摄都有难度。Sammy忙得出汗，但是成功地拍好了集体照。聚会结束，他马上用计算机整理、处理照片。第二天旅游活动结束后一部分人留下聚餐，他又赶到餐馆给大家看他处理好的照片，果真非常好。周瑞桢自始至终活跃在会场上，活跃在旅游的大客车和各个旅游景点。他不光要选背景、安排大家站队，还要帮大家设计该摆出什么样的姿势。经他导演拍出的照片，大家都笑得很灿烂，因此也显得更年轻了。聚会后，他又连续开了几个夜工，整理出六百多张高质量的照片，为我们的聚会留下珍贵的纪念。王家斌报名当志愿者时，我可很不放心，心想他从来没有给我拍过一张好的照片，这次别把事情搞砸了。幸亏他后来主动把自己定位为“打酱油的”（即跑龙套的），在现场的任务主要是帮忙搬三脚

架、挪动一下桌子椅子之类的。还好活动结束后他交给网站的照片得到周家钧的认可。

那天瞿德霖只简单地讲了几句,其实在筹备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的反复动员,到八月底、九月初的那几天里报名参加的人数不断上升,活动的内容越来越充实、详细。那些天里我们天天看电子邮件,就是要找他的“无轨电车”,读他风趣的鼓动词,看看又有哪些新的名字加了进来。同样出了大力气的还有周家钧。她在幕后做了许多繁琐的后勤工作。她把所有报了名的人的信息输入到一个数据库里,能统计出准确人数,也方便参加活动的人互相联络。她设计的纪念章和玻璃杯为活动增添了色彩和美感。赵振平是圣何塞地区的主要联系人,负责联系会场、印制横幅、制作玻璃杯、布置会场以及一切琐琐碎碎、烦不胜烦而缺一不可的筹备工作。活动当天,她还要前后照应,让每个人过得快乐,吃得高兴。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校友,其他校友也尽了不少力,提供建议、信息,联系旅游车、饭店,捐助聚会费用等等。我们都是位育人,我们聚在一起办事,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聚会的后半场是自助式聚餐。有中式、日式,各式海鲜、点心、甜点,食品极丰盛。大家聊得开心,吃得也满意。

第二天(9月8日)校友会组织去圣何塞南面的 Monterey Bay 游览。大客车载着三十多位校友和家属时而穿行在湾区以南的丘陵地带,时而沿着太平洋的岸边疾驶。我们曾在好几个海滩停留,看栖息在海中礁石上的海

鸟和海狮,看海浪冲击海岸溅起的水花,看海水退去留下的细沙。我们曾在一家高尔夫球场停留,曾在一大片私人住宅区内穿行,路边尽是设计各有特色的住宅和高尔夫球场。住宅区内一条曲折的道路长17英里,这条路也因此得名17-Mile Drive。午餐是在Monterey渔人码头小镇里一家叫Domenico's on the Wharf的餐厅吃的,每人一份蔬菜色拉,一碗汤,一份海鲜三明治。一组八个人坐在一张长条桌边就餐,给大家更多的交谈时间。最后一个景点是Carmel小镇。镇上一处商场里回廊环绕,高低错落,分布着许多小商店,中间又有一个小巧的庭院,种着热带植物,放着桌椅供顾客和游客休憩。

这次出游,历时一整天,行程几百公里,除了看风景外,更给大家欢聚畅谈的机会。在旅途中校友们展示出来的多才多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周国辉一路上唱歌、朗诵,包括朗诵他自己写的诗,用普通话和各地方言讲话;用方言学上海街头的叫卖声,绘声绘色,引得大家捧腹。周国权的男高音独唱又一次博得大家的掌声。蒋青表演了他拿手的评弹开篇和京剧清唱,大家一再叫他“再来一个”。一路行来,车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驱散了旅途上的疲劳。我们位育中学的人,书读得好,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做事、做学问做得好,文艺表演也一样精彩纷呈。

大客车回到了早上出发的地方,该说再见了。可是大家兴致还高,不愿意分手。除了另有安排的人,二十个人分乘几辆车来到“大上海”餐厅吃晚饭。都是一些很地道的上海菜,而且量大。正好两位校友王一范和王以敏过生



日，于是大家又一起拥到许敏青家喝红酒，吃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歌。

校友会组织的两天活动以外我和王家斌还留了三天在旧金山湾区旅游。我们深深感到旧金山地区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无论怎样抓紧看都看不完。

三天游的第一天，9月9日，周国屏早就到旅馆来接我们去旧金山。一个上午看了市政厅、花街、渔人码头和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周国屏介绍了每一处景点的历史和特点，让我们领略了旧金山的风貌。他还带了三脚架为我们拍合影。中午与周国刚会合，在“上海春”午餐。餐馆门面不起眼，里面却干净、雅致，而且上海菜做得地道而精致。

下午去了金门公园，园内古木参天，是大都市里的避暑好去处。公园面积广大，我们仅看了日本花园、露天音乐堂。下一站去金门大桥却大失所望，浓雾把整个桥身，包括两座塔和钢缆都严严实实地遮起来了。车开到桥对面的小镇 Sausalito，却看到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自然奇观。只见一片云雾从一座山头翻过来，无声无息地贴着地面移动，再贴着旧金山湾的水面漂移，移到远处的旧金山市区附近。周国刚告诉我这叫平流云，还解释了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晚餐就在镇上一家海鲜餐馆吃的。食物自然新鲜可口，通过临着海边的一扇大窗户，更可以欣赏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和远处的旧金山市区。这天两餐美食，都是周国刚请的，我们只能以后在上海或多伦多回请了。周国屏一整天开车陪我们游旧金山，这份情也是我们深深铭记于心的。

我们住的旅馆在圣何塞，但因为租了一辆车，以后两天就自己开车到处跑了。我们先去了斯坦福大学，校园规划整齐，建筑也有特色。在校园里的罗丹雕塑公园观赏了露天陈列着的几十件这位大师的作品，特别是见到了那件“地狱之门”（Gates of Hell）。上一天因为大雾没有看到金门大桥，总不甘心，于是决定再开到旧金山去碰碰运气。到了桥下，我们发现天有点阴，桥身却清晰可见。我们顺着桥面走了一段，总算了却了“到旧金山看金门大桥”这桩心愿。

在湾区游览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亚洲艺术博物馆和荣誉军团美术馆（Legion of Honor）。

亚洲艺术博物馆是在美国企业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捐赠的几千件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介绍，该馆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在亚洲以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在17,000件收藏品中，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古代艺术品。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该馆镇馆之宝之一，一尊铸于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的释迦牟尼鎏金铜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佛像。该馆的网站上称之为Seated Buddha，有详细的说明。陈列品中还有许多精美的中国玉器和瓷器。

走出博物馆我们被一片喧闹声吸引，循声找去，原来是一个露天市场。小贩们在叫卖水果蔬菜、小吃和各式纪念品。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鲜艳色彩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旧金山风俗画。出了露天市场，顺着繁华的Market Street走，看到了著名的缆车掉头的场景，又转到了名店林立的Union Square。

林肯公园里一个小山头上是荣誉军团美术馆。美术馆的建筑是以法国巴黎的Palais de la Légion d'Honneur为蓝本，尺寸缩小为其3/4建造的，面积不大，但依然典雅大方，

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主要收藏西方绘画、雕塑和瓷器等。把这座建筑赠送给旧金山市民的Mrs.Spreckels曾收集了七十多件罗丹的作品，也捐赠给了这个美术馆，因此它的罗丹作品的收藏是个特色。比较著名的有The Thinker, Three Shades等。

那段时间里美术馆正在举办“Impressionists on the Water”特展，集中

展出了印象画派大师们的作品中跟江、湖、河、海、航行、船等等有关的作品；有该馆自己的收藏，还有从法国巴黎的奥赛美术馆和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样的大型博物馆借来的，还有的是私人的收藏品。能在一个地方同时看到这么丰富的印象派大师们的作品，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大饱眼福。

这两天里我们还到林嗣康、朱凯靖家作过客，都由他们请客品尝了不同风味的中餐，我们又一次感受到老同学们的热情好客。林嗣康的孙女儿要到南加州去上大学了。听他们一家讨论带什么去住校，以后怎样去看她，虽然都是些家务琐事，却透出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在朱凯靖家还碰到住他家的薛嘉禾。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聊到很晚我们才告辞回旅馆。这次加州之行有机会到三位校友家作客，看到了他们在加州安居乐业的情况。我们所见到的又一次证明了我们位育人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劳动和吃苦耐劳，在北美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开创了新的生活。



欢迎位育(51)中学北美校友会2013团聚



但愿同窗情長久

记 2013 秋北美位育校友聚会

柯晓明 67 届



自1968年深秋学业未就被迫离开51中学校园，特别是1984夏末负笈远游美国以后，我和母校的联系就日渐疏远。直到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回国探亲，由胡蔚英书记作东，父亲柯教导主任“作陪”，在酒店餐桌上见到了朱家泽校长和教过我历史的蒋衍老师。但那次餐桌上都是他们“大人”老友之间的话题，作为小辈，我就象当年端坐在南楼和北楼教室的初中生一样，除了“有问必答”，便是“洗耳恭听”。和67届中二（7）班的同窗，除了和石道林与张健生在最初几年略有联系以外，其它的几乎都杳无音。

今年六七月间，收到多年未联系的66届初中的学长兼美国明州法学院的学弟瞿德霖的伊妹儿和电话，盛情邀请我去参加九月份在加州南湾举行的北美位育校友聚会。本无意前往，但不知是被那颗深藏已久的“位育心”所唤醒，还是因夕阳无限，人老念旧的情愫而激动，还是经不住德霖兄的“忽悠”，我不但自己去了，还说服了太太共同前往校友聚会。

回到西雅图已四月有余，短短两天的校友聚会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作为67届初中，我虽然和大多数与会的校友不同届，不相熟；与会校友的年龄从40后横跨80后，但是位育的共同经历，位育的精神气质，使我们一见面缘份情结就油然而生。我们仿佛像一群活蹦乱跳的青春少年，重新回到了四十五年前复兴中路校园，重拾昔日的欢笑，重温难忘的趣事。银鬓霜发，掩不住曾经的丰华正茂；娓娓深沉，抹不去当年的壮语豪情。谈起南楼北楼和红楼，个个如数家珍，争先恐后；说到老师的教诲和关爱，人人肺腑动情，铭刻心头。

在第一天的自助聚餐晚会上，每人一盘日本料理或中华美食放桌前，一杯香片清茶或可口饮料握在手，同窗切切叙旧忆当年，校友笑语欢歌遇知音。老话副队员家钧和国权的朗诵，依旧字正腔圆，更是铮铮有声；美进等老排球队员们虽略已发福，威武高挑不减当年。主持人国辉的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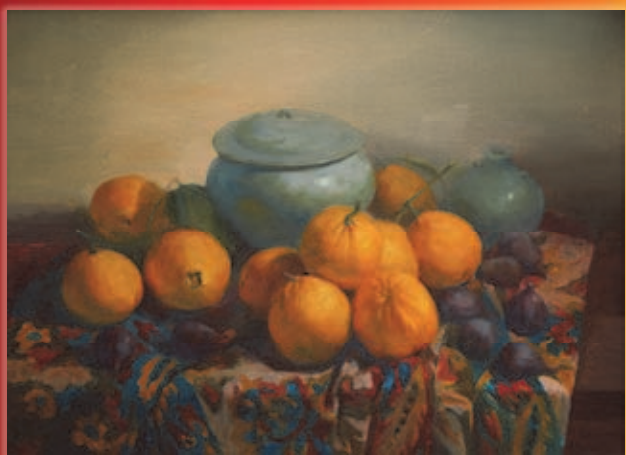
谐和流畅，蒋青的吴依评弹，顾刚的杰作“华夏礼赞”等等，无不彰显出位育人的才华和情操。此时，窗外秋风习习，繁星满天；室内笑声阵阵，情深意添。那刻，沉淀多年的记忆不断地浮现在眼前，人和事，情和景，就象是一幅幅远近交叠，淡浓相宜的水墨画，令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聚会的第二天，在组委会的精心安排下，许多校友同乘豪华旅游车，沿着著名的十七里铺海岸观光线，前往蒙特利尔海湾，并在依傍海水的海鲜餐厅共进午餐。古有“桃花潭水深千丈，不及汪伦送我情”，今有“海湾潮涌千层浪，不及位育校友情”。那天我们三五成群，挽手搭肩，呼吸着清新又略带腥湿的海风，漫步海湾边的小镇，留下许多美好的照片。

是啊，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但是不管你从哪里来，位育的情结，位育的精神使我们昨日牵肠挂肚走四方，今朝相聚共渡好时光。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五世修得同窗读”，我为身上位育的印记自豪，我为同窗的纯真难忘。是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儿要互相倾吐。位育人无论是走到那里，不管是顺势逆境，都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像与会的金承熹老师所说，“位育人在世界哪里都是最棒的”。在唏嘘光阴荏苒的同时，我听到不少位育校友在北美闯荡一片天下的感人故事，感受到许多学长在阅历人间正道沧桑后的超脱和潇洒。同窗校友之间亲切的问候，祝福和鼓励更使我体会到，在没有功利炎凉的氛围中自然形成的少年情谊是多么的纯真和宝贵。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许多学长和我聊起家父当年在51中学时的点点滴滴时，对他那浓浓的四川口音仍然记忆犹新，描述他上政治课时的神态仿佛就在眼前。钱冠方等学长还饶有趣味地提到五十多年前，身材瘦小的我在寒冬的清晨，跟着父亲——他们的柯老师，还有其它大哥哥大姐姐同学的后面，气喘嘘嘘地在操场上绕圈长跑。而当我在64年以全区前五名的成绩如愿考入向往已久的51中学时，他们都早已是分

油画

闵蕾琪 75届



2013北美位育校友聚会

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了。韶光白首,岁月无情。聚会短暂,来去匆匆,但是同窗在我眼里依旧年轻,母校在我心中永远慈祥。聚会期间, Sammy, Frank和家斌等多位摄影好手,用相机镜头,捕捉下校友欢聚时的激情瞬间,记录了师生同窗重逢后的喜悦笑脸。那张校友聚会的“全家福”将成为我永久的珍藏。

借此短文,再次感谢会务组和东道主振平等各位的辛勤付出和周到安排,使我有幸在校庆70周年的前夕和来自北美各地的校友共尝重聚首的甘醇,我会久久地记住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感慨之余,附庸风雅,写下以下小诗二首,及词一首,愿与各位分享,更求校友斧正。

秋风洛阳起乡愁, 独揽流光梦常忧,
真情莫非重聚首。 同系扶桑往昔留。
把酒南湾明月溶, 沧桑历尽真英雄,
冰心玉壶位育友。 但愿同窗情长久。

清平乐 | 位育同窗
青春激情, 岁月烧不尽。
踏遍青山攀峻岭, 等闲识得风景。
寒耕热耘他乡, 做人学学清芳。
北美谁人风流, 还看位育同窗。

是同学会牵的线

罗自平 65届

早在位育会刊上得知矫桂瑾同学是个成功的工程师,又擅写作,直至今年9月7日的北美湾区同学聚会,才得以相见。随后,很意外地,我得到桂瑾同学的e-mail,说起画家丰子愷先生早年为祝贺我祖母寿辰,所作的一幅画,数年前在海外拍卖。这使我非常震惊。无疑,我家的资产被不知情地拍卖,是当年抄家的后果。

首先,对这幅比我年龄还大的画作,我仅有模糊印象。父亲生前收藏甚丰,与丰子愷先生师生之谊延绵半世纪,在这幅画的款识上,子愷大师也深情地记叙了这段特殊的师生情。我一向淡看身外之物,文革中曾目睹父亲凝聚一生心血的文稿被付之一炬,家中文物被洗劫一空,我并未耿耿于怀。可是,我从未想到过这批文物的感情价值。桂瑾同学的e-mail让我看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对丢失

文物的感情价值的麻木不仁。我更为自己当年未能安慰父亲于万一感到彻心的痛。

父亲是多么关爱我啊!我在位育上初一时,他听说我们班的文学小组有意愿,便向他的愷师禀报,由我当时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朱应谷带领我们一班和六班的文学小组同学去丰子愷家访问。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还是那么温暖亲切。一边是著作等身、闻名于世的艺术大师和文学家,另一边是一群不谙世事、刚开始好奇地睁大眼睛看世界的同学少年,留着美丽长胡须和戴着圆眼镜的大师和青涩的我们,一起聊写作,谈人生一多么矛盾的和谐!

感谢桂瑾同学让我有机会自省并唤起我美好的回忆,感谢同学会牵的线。



从位育70周年校庆到回忆我们的英文老师

陈怀谷 66 届



早在2013年5月份，邓思贤同学就email给我有关位育70周年校庆的消息和网页。虽然我那时在北京，但还是犹豫是否要去上海，因为如要去，就得周五晚上出发，周六参加完校庆，周日就得回京，很赶，折腾。到时再说吧。时间真快，一眨眼11月就到了，还是犹豫。打电话与同学商量，有人说10年一次，应该去，也有不少人说没意思，不值得。最后姚方方和许蕴中同学说教过我们的老师如今都七、八十岁了，再过十年，到80周年校庆的时候，可能都见不到了。而且姚方方说在上海她家有地儿可住，我就下定决心了。



位育校服与Logo

如今中国的高铁也很是方便。记得以前上海去北京，火车要坐一天或一天一夜，现在高铁5个小时就到上海了。11月16日，星期六早早来到了原来51中在永康路，襄阳路的后门。路边挂满了大红欢迎标语和指路牌。一长溜的大客车停在路边。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登上了一辆车，已经坐满了，只剩下最后一排有一个空位，就坐下了。坐在边上的一个西装中年人很是活跃，介绍自己是74届的，与边

上的几个67届中四的女学生攀谈起来。我注意到的是坐在我前排的一个老太太，满头白发，很有风度，边上是个40多岁的中年女生。那老太很面熟，安静，很有修养，不像如今的大陆上海人那么嗑吧。我以为她是我们66届的同学，但又不认识，我们这一代都是老年人了。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才知道她们是薛兰芬老师和她的女儿。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位育中学新校舍，现称位育高中部。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注意到那条路叫位育路1号。大门和校舍挺气派的：一进门是个大广场，后面是一个草坪，

然后是大楼。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感觉挺不错的。门口场子上搭了大红的桥型大幅标语，下面是好几个登记台子，挤满了来客。登记完了，每人发一个袋子，里面有一些纪念册，校庆agenda，矿泉水之类。服务人员都是学生，穿着校服，上面绣着位育的Logo。我想，与当初‘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年代的我们这一代相比，现在的学生真是鸟枪换炮了！登记完了，志愿者让我们到右面的一个大广告牌上签名，无数的名字已签在上面。我在左上角也写了自己小小的签名，还没忘了我在51中一直是个小八辣子！

来访的同学，校友和老师都聚集在广场上，大多都是几十年没见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学生，如今大多是老头老太了，见面后，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在广场上见到那位车上见到的白发老太，原来是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薛兰芬，和她一起的是她的女儿。见到老师，十分激动，聊了起来。我问她是否还认识我这个50多年前的学生，她说记不起来了，有些失望。薛老师的女儿说，老师已经88岁了，身体不错，就是记忆力差了。她们昨天从新加坡飞来上海，今天参加校庆，明天就要飞回西雅图家了。88岁高龄，而且长途跋涉，老师还是精神矍铄，真是不容易。

我从北京来，与老师比算得了什么呢？

见到薛老师，即刻就想起当时她教我们英语的情景，及从中一到中五教过我的英文老师们。1961年刚进51中，中一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就是薛老师，最不能忘记的是，教我们一个单词发音时，老师会走到每一个学生前面，指着我们的嘴让我们读这个单词，然后说‘对’或‘错了’。最后再一起教我们准确的发音。记得有一次老师教我们发“busy”这个字，有一个同学发成“比才”（上海话），而且又说得很响，哄堂大笑，以后就给这个同学绰号“比才”。你知道我们给薛老师的绰号是什么吗？“Eleven”，与她名字谐音。当时的学生也是够淘的。我想就是今天问起我班的同学，都会记起这个的。No surprise, 初中毕业后，分到外校的同学都说，51中英语得3分的学生，到外校都是5分学生。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们有像薛兰芬这样的老师！不是吹捧（以前吹捧文章实在太多），心里话。



薛兰芬老师在位育70周年校庆

进51初中后，我分在初中（1）班，中二的英文老师是朱耀坤老师。第一印象是，与其他在当时“革命”时代说来比较打扮的英语老师比较，朱老师是十分朴素的，刚见到朱老师，我还怀疑这个老师是否真的是教英文的。但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朱老师是我在中学最好的老师之一。朱老师教我们字母书写时，她在黑板上连续写了a,b,c,d...26个字母，说，并不是我的 hand writing 怎么漂亮，但是，你们学会了工工整整的书写以后，随你怎么发挥，你们都可以写出漂亮的 hand writing。这是何等的真理！做什么事都不是这样吗？至今50多年后，朱老师的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响着，而且还是我工作，学习的座右铭。文革中，有人说朱老师是‘反革命’家属，是坏人。我觉得，说这话的人才是坏人。在生育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多少年来，黑白颠倒，人妖不分，残害了多少好人！还有一件小事，回忆起来也是挺有趣的。早在50年代，我姑姑也是51中的学生（57届）。有一年学校国庆晚会，在襄二（位育）小学礼堂表演，那时位育中学有一部分也在那里。姑姑上台表演女生合唱朝鲜歌曲‘青山坡下’（那时我还在

幼儿园。这个歌我至今还会唱），让我一个人坐在台下等她。唱完了她们卸妆，我在下面等她不来，吓哭了，走到礼堂外面找人，找不到。这时一个中年老师过来，问我情况，安慰，并把我带到后台我姑姑处，她们都笑我，但那个老师的脸我一直难忘。后来到了51中二，再遇朱老师，她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赴美前，我打听过朱老师，据说她已逝世。我后悔离校后没再找过她。能想象她在文革中不会安生。但愿朱老师在天之灵一切安好！

中三，中四我们的英文都由胡文梅老师教。据说胡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s）毕业的，但最近在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我的弟弟查阅了上海圣约翰毕业生的名册，却没见过胡老师的名字（我母亲也是上海圣约翰毕业生），可能没搞清楚她是哪年的毕业生。胡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口流利和标准的发音，我想如不是圣约翰的，讲不出这么漂亮的英语。她的 Classroom expressions 让我受益匪浅，中三开始，她在讲课时就坚持用英语授课，没间断过。后来我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 教书多年，很多课堂用语也都是从胡老师那儿学来的。记得有一次讲“along”这个单词，胡老师就沿着黑板从一头跑到另一头，说这就是“Run along the wall”。胡先生在当时算是打扮挺入时的，记得那时她穿一双船鞋（那时穿这种鞋的人不多），‘run along’时，那鞋像拖鞋，脚根离开鞋根，在地上发出磕磕的声音，至今还记忆犹新，along 这个字的用法也记住了。中三时，一次回家作业是抄课文，胡老师给了我‘Excellent!’。很得意。回家爸爸见了，说这样的字也能拿优秀？无语。听说初中时，同学沈家驹坐第一排，大概是近视眼吧，胡先生讲课吐沫飞溅，沈就用粉笔在他的课桌上吸，胡看见了，敲敲他的课桌，甚是尴尬。初中毕业了，大家准备考高中，心情紧张。有一次经过红楼门口，胡先生从上面走下来，英语教研组好像是在红二楼吧，那时看到老师总是有点紧张，我低头快走，不料胡老师叫住我，问，“你是广东人吧？你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我诧异，说，“你是和我住一条弄堂的吧？”，我想大概是街坊的原因。我家那时住淮海路上方花园63号，胡家在后面七十几号。她说她看到总务处在写我的毕业证书，上有籍贯。插一句，那时有个瘦瘦的老夫子先生，每当调课，他就在上课走进教室，也不说话，打开夹子，在黑板上写上什么课调到什么时间，还是一句话不讲，关了夹子就走。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至今还不知道！只是大家叫他‘调课先生’。他好像练过字，写得一手很有特色的字体。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何方神圣，为何不教书。听说好像有‘政治问题’才不能教书。不知他有无逃过‘文革’一劫。愿上帝保佑他。毕业证书都是他写的毛笔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墨迹。此文寄出后，又有51校友发给我一段补充，也提醒我的记忆，这位老夫子叫‘孔先生’。校友补充如下：“他叫孔庆涵，在教导处工作。当时调课，有时是临时性的，有时是永久性的。他会在黑

板上写得很清楚。他走出教室，大家都会笑一笑，他也会会意地浅浅一笑。他写的“永久”两个字特别有劲，我们班的同学就叫他“永久先生。”很有意思！

据说胡文梅老师在50年代还是共青团支部书记，真是人不可貌相！五、六年前，我得知胡老师住在 Brooklyn, New York 打过电话给她，几十年没联系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第一句话就是“胡老师您还记得陈怀谷吗？”她说“你就是住在上方花园的那个学生吗？当然记得。” Surprised me! 我说我父母都在纽约，我经常去，到时我来看看您好吗？回答，“现在我不行了，天天躺在床上，难看得很，还是不要来吧。”我说“胡先生当年教我的英语，现在都派上用场了。”她说，教学方法都是教研组长朱启新先生设计的，我们只是照做就是了。不想这次校庆时，听同学说胡老师两年前就过世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没说声感谢呢，就一个个走了（朱启新老师也走了），只留下了记忆！中四还是胡文梅老师教英语。那时在东楼，教室很暗，黑板上写的字都看不清。更糟的是，‘革命化’，教育改革开始，读书成了‘白专’，51中开始走上一条反常的‘极左’之路。

中五的英语是朱启新老师教的。朱老师是有名的英语



同学集体照。很多名字都叫不出来了！

教育家，记得在66年初《学英语》杂志上每期都有他的英语教学文章。可惜在1965, 66年那个政治环境下，我们几乎没有从他那儿学到什么知识。那时搞教改，“要把学校的课程砍掉三分之一”，“学生上课可以打瞌睡”。据说林彪的夫人叶群当时在徐汇区教育局蹲点教改。学校那时上课教师不讲课，学生自己读书，然后在课堂做作业。记得那时英语课，朱先生进教室就坐在讲台上改作业，学生自己看，虽有教科书，但也没有指定的读本。记得我那时就读英文老三篇，能把《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从头到底背出。然后就写作文，大篇大篇地抄英文杂志上的革命口号。记得朱先生在我的“作文”上批，“Try to use your own words.”。没有学习，哪来的 own words 啊？当

时因为没有积极地‘要求进步’，与我“一帮一，一对红”的一个从广东农村来的班长，天天与我‘谈心’，说不能走‘白专’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自觉走，不自觉地压着你走。’（彭真语）感觉就是每时每刻都是被



位育军乐队

人压着。精神压力大，学习就不行了。我从中一开始，英文一直是最好的，中五是课代表。但那时每次朱先生叫我来回答问题，都紧张得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说老实话，至今对51中都没有什么好感，大概是经历了高中极左的教育方针，尤其是66年后两年的文革争斗吧。

再回到校庆那天，同学越来越多。在大广告牌上签完名后，回到广场，有人叫我，见是一位雍容华贵，很有修养的女士，问我‘你认识我吗？’很面熟，但无论如何想不起了。虽然学过绘画，但我这个人对形象的记忆还是极差。‘我是林嘉陵。’记起来了，第一次见到她是还在学校时，其兄我班林孝标带我去他家听他妹妹弹钢琴时见到的。她带我去见她先生吉立力，还见到汤沐黎，孙大成，四班的周守正，还有我们中五(3)班的蒋正宇，陈念同学及其他班级的同学，都是几十年没见面了，大多都认不出来了。拍完照，到大礼堂开大会。大楼前，大红制服的学校军乐队在演奏欢迎曲，很正规，完全可与美国 high school marching band媲美。大家都说，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开会时，与汤沐黎坐在一起。沐黎还是与以前一样勤奋，一坐下，就拿出笔纸开始写生。坐在周围几个老阿姨没等画完，就迫不及待地要看沐黎的画，又拿了到处炫耀，啧啧赞赏。大会和中国所有的官会一样枯燥，感觉位育一向就是推崇政要，名人，富人。一个个什么长，什么院士讲些马屁空话，也没什么意思，还是下面的演出可以看看。但给我的印象还是八个字，‘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学生管弦乐队，民族舞蹈，吉他合奏，都显示了如今的学生既有才，又有钱，与我们那时的‘艰苦奋斗’大不相同了。我们是落后了，不得不承认！记得我姑姑说当时他们表演朝鲜合唱时，用家里拿来的红绸被单做裙子的。

校庆前，邓思贤告诉我，学校可能要收¥30-50元材料费和午餐的费用。我都准备好了零钱，但报到时却没有



沐黎在写生

收钱。午餐在学校食堂吃，门口站着一排志愿者学生在发餐券。

学校准备的午餐很不错，一碗大排面，还有一大块素鸡，味道极佳。和邓思贤及中五的一批同学在食堂等志愿者送餐。这时有几个女生（老阿姨了，在北京过路人都叫我老爷子，公交车上给我让座。）过来，我不认识，好像与邓思贤很熟，邓招呼她们一起来坐。长桌的我们这一端坐满了，另一端还有空位。邓让她们坐那儿。但这几位老



在食堂前发饭票的志愿者

阿姨说不坐那儿，不喜欢那儿的人！我想这又是51中‘极左’路线和文革留下的后遗症。我们这些都是过了‘耳顺’之年的人了，还是耿耿于怀。反过来，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头上三尺有神明’，做过什么事，大家都记着，都会有报应。还是多做点好事吧！

下午大巴把我们送回到复兴路1261号51中后门。同学聚会，又见到不少老师和同学。几个感觉，一是原来觉得很大的校园，操场，现在怎么都这么小了！另一个是，见了不少校友，有50年代（姑姑的同学），老三届的最熟悉，66,67,68级的都有朋友，还有一些七几届的（我弟弟那一届），但 believe or not, 来得最多的还是66届高中和初中的校友，坐满了整个教室，还不够。大概在学校呆的时间最长，最有‘感情’吧！66级高中在南楼一层的一个教

室，中五（4）班的同学来得最多，还有我们（3）班也不少，见到几个（1）班和（2）班同学。在走廊上见到陈文瀚老师，他说腰背痛，不能久待。我与陈先生很熟，经常见，带他进教室后，也没多谈。陈先生中二时教我们平面几何，我们都叫他‘阿凤’先生（可问中三（1）班男生），原因是一次放学了，我们在北二楼女厕所门口看到他大声叫‘阿凤’。阿凤好像是学校清洁工，陈先生不知叫她有何事，‘阿凤’先生成了陈先生的雅号。可惜蔡光天先生走了，不然又有一番寒暄。叶宝康老师来了，西装笔挺，极有风度。印象最深的是，中三他是我们班的代数老师，在考高中复习课时，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典型例题，每讲一题，就讲此题中的关键，用他的话就是一个‘窟窿’（叶先生好像是苏州人），然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讲得极清楚，我们记得也很清楚。以后没见过这么好的数学老师。徐大年先生是中五（4）班的班主任。我是很感谢他的。他大学刚毕业，在我们中三（1）教化学，并是副主任。中四还是他教我们普化。他的教育方法很好，吸引了我对化学的兴趣，并造就了我今天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药物化学研究人员。虽然受各种政治气候和中国民族性，素质的影响，但位育的老师，这些教过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纪大一代的老师，都是很敬业，很杰出的中学教育家，给我们的知识，思维能力和做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是如今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所做不到的！再啰嗦一点，教室里有不少初中学生在做志愿者，给校友倒茶，擦桌子之类的，看着那些十三、四岁的孩子，真是很 cute。一个小女孩坐在那儿玩智能手机，如今无论在地铁，公交，商店，或马路上，都能见到这些年轻人在玩手机，极其熟练，近视眼也极多。我和那个小同学聊起来，‘我们在位育（51）时，也是和你们现在一样年纪，风华正茂。50多年一瞬间就过去了，看看如今我们都是老头老太啦！’那女孩笑笑，没反应。



玩手机的女孩，我们当年也这样年轻！

一天的校庆很快就结束了，和几个同学走出校门。校门前一排走廊原来是《钟声》报的报廊。和我一起走的许

蕴中同学说，当年汤沐黎就在这儿写报头的。记得沐黎手拿粉笔，两腿叉开，大笔一挥，特有的‘钟声’两个大字就出现在一整块黑板上，颇有大将风度！还有几个字写得好的同学在写板报，记得我班的何贤淑就是其中一个。如今黑板没了，代之以一些玻璃橱窗，大概也是‘鸟枪换炮’了吧！



原《钟声》板报没了！

最后邓思贤邀请我参加了中五（4）同学的聚餐。阿邓和我是老同学了，我们小学（位育，后来的襄二小学）同班，后51又是7年同学，尤其分配工作后，在三牧，五牧牛奶棚10年战友。虽然她那时高就二楼（五牧场房子最高也只有二楼）的医务室当医生，我在最下面的产房挤牛奶，接生小牛，‘操牛污’，但在同一条战壕里‘与牛奋斗，其乐无穷’。我来美后，每次回沪，邓思贤都热情地安排与同学聚会，是最长久的战友之一！周守正同学在学校对面预定了一个广东餐馆。和我们（3）班的陈冠大同学一样，周守正同学也是个热心人。聚餐的有二十几个同学，两大桌，欢聚一堂，不仅是（4）班同学，还有二班的沐黎，中四的何祖明及女友，还有中三的当初闻名学校的女子排球队员许蕴中同学都来了。可惜的是中三的姚方方原来要来，但后来没有成行，有些遗憾。最后孙大成同学慷慨解囊，为大家埋了单。大家都聊得很畅快。同学聚会，不少都是几十年没见的了，自然高兴！过后又分散到世界各地，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能如此相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PS：不知为何，我最近很想念汪学瑜老师。她是我中

一（1）班时的班主任，当时也教我们政治课，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用的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一书。我自知在班里是毫不起眼的小八辣子，不引人注意的。当时在学校吃午饭，自己带饭，一个饭盒在东楼下面食堂蒸饭，上午第四节下课后去拿了饭在教室里吃。学校规定吃完饭是午睡时间，汪老师每天到教室督促我们趴在课桌上睡一小时。我们贪玩，打牌，玩40分，但汪老师来了只得午睡。有一次曹启华和我们一起商量出去玩。我们四个同学就一起去襄阳公园打牌。玩到下午上课前才回到教室。那时汪老师站在教室门口，问我们到哪儿去了，怎么没午睡？我们吓得话都讲不出来了。这次校庆，我特地找汪老师，但没见她。回北京后，我找陈冠大问老师的电话号码，未果。又找邓思贤，很快就给我寄来了。我即刻接通了老师的电话，事隔五十多年了，离开学校后从未见过她，她有这么多学生，可能早把我忘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汪老师，你还记得你1961年的学生陈怀谷吗？”回答居然是“当然记得，你那时小小的个子，和贺章经常在一起。”我挺感动，一般人大概是体会不到这种激动的。她说因为腰痛，没有参加这次校庆。我们聊了很久，从50年前的学校生活一直讲到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感慨万分。但愿我们的老师都健康，幸福。感谢你们！这是我的心里话！

刚才，我弟弟陈怀志打电话来，说着图书馆找到St. John's胡文梅老师的名字了，和王群老师在一页上。胡先生是也是英文系的，正如叶秋怡同学所说。

January 27, 2014, 写于 Ann Arbor, MI USA



聚餐会上：陈怀谷，何祖明，汤沐黎，吉立力

WWW.WEYU51NA.COM

校友会网站《北美位育人》家园，在周家钧校友和联络组团队的辛勤耕耘下茁壮成长，在增进位育校友之间的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站加速了校友会的讯息交流。有校友就是得知聚会消息后来参加聚会并欣然成为新成员；还有不少校友通过网站联系找到了多年失散的同学；在上海举行的各校友聚会活动中也广泛传播，导致众校友踊跃参与。校友们的积极支持是网站的生命力，校友们提供的照片，联谊活动，录像幻灯片等等，使我们的网站内容日趋丰富多彩，大大提高了北美校友会的知名度。请各位校友常回家看看：www.weiyu51na.com。每期《钟声》年刊的电子版，可在《北美位育人》网站上浏览或下载。

七十校庆速写

汤沐黎 66 届



重现青春六年

汪维雯
59届



记得去年7月间曾飞往波士顿，陪同我舅妈荣智珍，去纽约给我大舅朱传策（Jeffrey Chu）上坟，时为他逝世二周年祭日。这个美国著名科学家，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之一，现已安静地躺在绿荫环绕、宽敞安静的荣氏公墓里长眠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多年，他不遗余力地为北京奉献了炎黄子孙的一片赤子之心。

带着一份惆怅和伤感，无限感慨地回到洛杉矶。打开电脑，便见到国辉学友发来的，有关位育北美校友聚会的邮件。很是惊喜，对我来说这是一份意外的珍贵礼物，好像从天而降！回想起，在位育中学那长达六年的学习，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规范、最严谨、也是最有系统的教育。而我的青春少年时代，那最为美好难忘的点点滴滴，最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也是在位育校园中渡过的。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周国辉，在这个重要时刻，他记起了我并通知了我！让我有机会，在阔别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飞越过了太平洋，在地球的另一边，又回到了位育校友怀抱中。更要感激那些年轻热情的学弟、学妹们默默地辛勤耕耘，为了我们大家能欢聚在一起，多年来，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在这里，我要谢谢德霖，家钧，秋怡，振平，攸承和大家伙们。

在要参加的9月7日SJ的校友聚会上，我知道，认识的同学并不多，同届同班只有周国辉一个，自从59年高中毕业后，这将是第一次见面，整整54年，比人生半百还要多出几年。和我同行的杨宝琳老师也是因为参加湾区聚会，从相识到相知，从LA飞到SJ。虽然杨先生从未教过我，但我在她身边却受益非浅，学到很多我所欠缺的东西。她知识渊博，思维清晰，有着优雅的教师风范。还有，我那住在田纳西州、十多年未有机会见面的弟媳傅平夷，在最后一刻才等到机票，赶到SJ机场附近旅馆和我们会合，我俩庆幸能在校友聚会上碰面。当年，我如果知道我弟热恋追求的女友是毕业于位育中学，同门的学妹，早就举起双手欢迎她了！

在聚会之前，就已经有几次邮件交流的家钧开车来

旅馆接我们，她比我想像中更显年轻，仍然像是大学生般模样，豪爽又可亲。她像一阵风似的吹来，顿时慰抚了我们激动和紧张的心情，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的神经立即松弛下来。当然，更高兴的是，自称无轨电车的大律师德霖也随车同来，他站在我们面前，满脸笑容。他身材高大，魁梧，不愧为老大！他厚实的双肩要担负起一代位育人的重托，位育精神将会从他们那里得到延伸，一定会发扬得更精彩，更深远！



一踏进会坊，一连串的呼唤声接二连三，“汪维雯……，……，”原来是周家兄弟！自己的中文名字已经不常听到，何况还是家乡口音！刹那间，像流行的穿越剧剧情一般，我立即跌回到位育校园、好像又坐在那北楼和南楼中间葡萄藤走廊的长凳上。那里留下了我逝去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少年时代天真无邪的朦胧情怀……，还有我所敬重的老师，还有胜似亲兄妹的同窗们。这些回忆，全部奇迹般的再重现在聚会中。校友们有的虽已鹤发，但仍童颜。有的虽然从未曾见过面，却笑容可掬，犹如童年一起长大的竹马和青梅。大家幸福欢乐的笑声弥漫在每个角落，连空气也被位育的精神所感染，散发出一阵阵甜蜜如花香的气息，这如醉如痴的气息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境界；

一个位育的精神世界，一个位育的知识世界。如果，我不和大家一起走下去，就永远不会知道，这边的风景会有那么的美！

周家一门四杰热情的招呼，使我很感动。除了老大国辉，我们不仅是同窗六年，课外还一起参加市少年宫的美术小组和雕塑小组，由少先隊大隊輔導员裴祖耀老师帶領我们二人，每星期一次，风雨无阻，有时，还未下课，我已看到裴老师站在教室门外等我们了。但周家老大下面三兄弟的顺序，名字和面容仍然还对不上号，有待下次，我将保证弄个明明白白！来回报兄弟们对我的友情！

校友会开始前，我随着大家排队，站在进门处的一条长桌前，等待填写新会员表格。桌子后面最左边坐的一位学妹，温和而儒雅，我们默默地相视而笑。那么亲切，感觉上我认识她很久了！我用心地记下她的名字，“叶秋怡”。回家后才发现，我手中仅有的三本钟声校友会刊，封面上的花卉全部出自她手，我特别喜爱第18期钟声封面上的那幅画，那栩栩如生的三只小鸟，粉红色的小肚皮相映衬那粉紫色的花朵，寥寥几笔，着墨虽不多，意境太美了！记得高中毕业后，我也曾经投考过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和上海电影学校的动画片系，但都因家庭成份不好而落榜。在当时，我是非常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相信党的政策；即“出身不能选择，重在自我表现……”。结果却是“出污泥而不染是绝对没有的……”。我曾主动向校党委组织交代家庭成份问题，妄想得到“平等对待”。结果是没有一个高校录取我。之后，我自学了时装设计，无奈地远离了绘画。以后如有机会，想向秋怡学妹讨教，但愿她有时间。

校友聚会上的另一大惊喜，是我找到了陈文丽老师的女儿！哇！太激动了！记得初三那年，我在位育校园北楼转角处，听到有人叫我小名，小乖……，原来 是位美丽的女老师，一瞬间，我没有认出来，后来她提醒：我们曾经同住在大西路……（现在的凯旋路吧？）她就是陈文丽老师，也曾叫陈美丽。我们一起住的那幢公寓式大楼是陈老师父亲当时新盖好的，是一幢非常新颖的歐式建築，好像是2幢連体的，每一层都有2套，每套的客厅都有个大阳台，可以俯瞰下面那极大的花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幢楼，我一生和父亲仅有的短暂相处的日子就在那里渡过。）陈老师一家住在最好的三楼，我们住四楼。那时的我刚刚從躺了5年的石膏床上站立起来，走路要用二个拐杖，美丽阿姨每次在三楼的楼梯口处碰到我下楼时，都要轻声关照我：当心啊！慢点啊！而我也会停下来，和她怀里抱着的可爱小女儿逗樂一会！原来那小女孩就是现在SJ中医药学院院长振平学妹！当我心急火燎地找到她时，她正在角落里，独自忙碌地为校友们包装她的学院赞助给校友们的礼品，一个透明，厚厚的玻璃杯，上面有家钧设计的图案，还有清晰刻着的五个字：“北美位育人”。

其实，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选择，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

程，我们走过的人生旅途，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1953年，为了不愿意和继母陈璐一同生活，才返回到妈妈家。选择了去位育读初中，放弃了同时被录取的市三女中。当时，我还是一个被大人们寵惯了的，跛腿的病态女孩，自尊心交織着自卑感，胆小兮兮地走进了学校大门。初一甲班的班主任是汪润老师，她对我就如一个嚴师加上良母。极其嚴厉，近似苛刻。她住在徐家汇，每天坐三輪車上班，经过衡山路家门口就把我带上，下班后再送我回家。甚至于星期天，我也常要到徐家汇她家里去做功课。在她嚴格的调教下，我从一个任性，自由散漫的女生，成長为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可惜的是，汪老师一年后就调往南洋中学升任校长了。初二时，我已从少先隊中隊長变成共青团员，初中六个学期的学生手册上全部都是5分。我还负责初中，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班级的黑板报工作，那时只有一块大黑板，竖立在北楼底层教室门外牆壁上。我开始学会了写稿件，再用白粉笔誊抄到黑板上，然后用彩色粉笔，写上大大的立体美术字题目，和画上五彩缤纷的报头与插图。当时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出报时间，各个小队长都要来帮忙，一般都放在星期六下午开始，经常饿着肚子搞到很晚，最后总是在门房伯伯三番五次的催促下，被赶回家。

初二的班主任是金晨光，他和李平钧，蒋文生，杨乙华都教过我们语文，至今记忆猶新的是：每次上李平均的课，我都必须高声朗读课文，上蒋文生课时，而必然要摇头晃腦地唸古诗“关关雎鳩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



初中三年级时和同学在位育校园所攝



速……”
还有俞述翰老师初中时教我们俄语，高中时教英语，但没人喜欢他的俄语课。柯从绳老师教政治，蔡光天曾教高中三角。我的物理成绩很好，因为朱嘉柏老师每堂课必盯牢我：“汪维雯把围巾拿下来，把眼镜戴上！”以致

我从来不敢开小差。初中代数老师是刘光坤，高中时是黄孟庄老师，黄是我最崇拜的数学老师，记忆力之好，绝非常人能比！他能记住每个学生提出的每道疑难数学题目，然后在不同的上课时间再举例一一解答。文革期间，我在楼下邻居范若良老师家中刚和他见面不久，便听到他惨死的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难受得不能释怀！

特别要提的是：恩师朱瑚先生，他是初三时的班主任，美术老师。我的那么一点绘画基础，除了我叔叔汪志傑（徐悲鸿的高材生）的影响，就是在朱先生的手把手学到的。在我们班上，他有众多爱好画画的得意门生，都源自他的教学魅力。最有出息的当是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的倪紹舜，可惜大学毕业不久便遭受迫害，跳楼而亡，冤死在文革初期。有出版了近百本连环画和在广告界颇有成就的张仁康，也几进山城，后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和我一起投考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同样名落孙山的舒家鼎，在日本定居后，以画仙鹤享有盛名，却患上忧郁症，自杀绝命在日本。幸好留下我们四人当年在上海愚园路，舒家鼎哥哥家一起合画的仙鹤图，现仍保存在我家。朱瑚先生已94岁了，由年轻的太太照顾得很好，我亦可算是他得意弟子之一，虽说艺术细胞不够发达，但神经组织细胞却够强壮，经历了无数次的磨炼，仍自得其乐的活在当下。每次回上海都会请朱瑚夫妇出来和同学们聚会一下，在此要遥祝他健康长寿，迎接百岁的到来！

高中的三年，57年—59年，正是动荡的三年，恰如风雨欲来风满楼！57年的反右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高中一我们下乡到莘庄去学农。高二全民大炼钢铁，男同学彻

夜去运煤，女同学连夜守在炉旁，等待出钢，家中有用的铁门、铁窗和铁锅都必须上缴。第三年去闸北锻压机床厂建筑工地上学工。学习再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了，取而代之的是投身到这些运动中去。共青团的组织生活就是检举揭发别人和写不完的自我检讨。许多优秀的老师们，如朱瑚，李平钧，杨乙华，夏祖敏都消失了！不知去向了！

六年的学校生活凝聚着对老师们深厚的敬意，我深深地感谢他们。也有老师在那些所谓运动前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适者生存”，对保护我们无能为力，还在我青春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当时成人受迫害都承受不了，我才是个天真无瑕的少年学生。

57年，我父亲在上海机械学院任教时被打成右派，后又因陈小璐（继母陈璐和前夫唐纳所生之子）的诬陷和诬告，于是又加上一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那时我根本不和父亲住在一起，获悉后向老师如实报告了家庭变故，于是导致班上尖子同学便受命对我进行猛烈轟击；教室墙上连日不断贴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共青团员汪xx隐瞒父亲是反革命…，迟迟不向组织上交代…”。

高三时在闸北锻压机床厂建筑工地上学工，母亲知道我腿怕寒，送一包棉毛衫裤到学校托老师带回工地，包内有母亲偷放的一个梨。幼稚的我拿到后，当然不敢吃，又不敢坦白去上缴，正犹豫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却已被学校工宣队，团委组织，建筑工地上的领导获知，再次导致他们兴师动众展开批斗这个“梨”的事件。我妈妈永远不曾知道为了这一个倒霉的“梨”带给她女儿的恐慌和。如今近六十年过去了，已谈不上创伤，却难以释怀。

在我的漫漫人生道路上，无论是；欢乐青春或辛酸往事，痛苦经历或幸福晚年，不管是喜或忧，爱或恨，现在，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都是我人生旅程中，形形色色的沿途风景。我要慢慢地欣赏它们，享受它们。生命只有走出来的风采，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不是吗？



我和朱瑚老师、同学张仁康、舒家鼎于上海。1988年

如我2011年小结北美校友会是在明州的团聚时提到:我们位育的每一次团聚都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时隔两年,这次2013年九月小阳春的加州硅谷和蒙特娄海湾,迎来了位育北美校友会成立以来史无前例的参与,作为团聚服务组的一员,就今后团聚的准备筹划聚会旅游等,再次抛砖引玉,希望今后的每次团聚都更紧凑高效完美。

关于组织:实际上这次团聚的成功就是组织和参与相辅相成导致。通常长达近六个月的组织联系是前期的时间精力消耗,这次我们采用单一网邮系统,比2011效率大大提高。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日报对协助各位已经报名的校友去凝聚更多校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各位的鼎力帮助,尤其是家钧学姐的每日更新名单,是不可能能有如此大的规模的。

关于专职:今后希望针对团聚的每个要点,有专门的人负责收集建议并讨论,如确定时间,机场接送,团聚餐饮,表演节目等等。这次2013团聚有实施,尤其是照相团队和会场安排,以后如能越早讨论安排越好。团聚拍照的紧凑问题这次由于大家的合作和照相团队的专业化而迎刃而解,今后一定保持。

位育同胞每个人都出类拔萃,所以大家一起搞活动,都从容不迫轻松自如。回想自己在校时,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图画平均3分,中文英文4分,体育想尽办法逃课,历史地理稍好一点,4到4加,代数3分,几何4加。只是每位任课老师都善待我,令我感激不已。

关于安全:2011年的结论是团聚的安全舒适最重要。参与者年龄不一,身体状况不一,所以要从最高年龄和最弱体质的情况考虑。交通,饮食,住宿,时间,携带衣物等都要顾到。2013团聚旅游再次采用大型旅游车,还配上导游。

关于旅游:如果导游费用太高就不是很实惠,因为单是司机就应该对路程很熟悉,导游要达到满足我们位育人的文化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后可以在确定时间和地点后,大家分析归纳网上丰富的信息,编排最适合位育人的行程,自

导自游,将有限的时间由我们自己控制。

关于餐饮:我想团聚日主餐的目的是聚会煽情,不在乎吃什么。考虑到中餐自助可能会比较乱,我个人本来想提出团聚日主餐为美式简单的冷餐会,但又考虑到可能有朋友不一定配口味。这次海湾旅行采取和2011年一样集中定位单

一菜肴,游览回来在大上海饭店两桌聚餐,和晚上更小范围庆贺66届初中两位同学的生日聚会,稍微静下心来品尝酒菜或糕点。这样两三次再聚会,将整个团聚引到更深的层次,值得提倡。

关于赞助:校友会对2013的慷慨资助和各位同学的赞助,是我们大型聚会的经济保障。历年来团聚的规模不一,资助赞助的数额不一,但是没有一次因为经济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所以要谢谢大家,同时希望今后校友会的资助在团聚人数基本确定后就决定,这样可以更有目的地计划团聚内容。

关于时间:本来提出旧金山和国家公园的旅游点,后来没有大规模进行,海湾旅游的人数比团聚日的人数也少,我现在想这是正常的。大家的参与不容易,所以今后在时间上还是以2011和2013的方向,和全国性的节假日错开,不会和家庭团聚冲突,旅行住宿方面也不会很贵。大队人马的天数不超过一个整天,然后就是近距离范围旅游,如果有需要,小队人马可以自行安排。

关于谅解:一个成功的团聚和协作的精神分不开。位育人为我们特有气质的永存而自豪,人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大家互相体谅互相沟通,就保证了团聚的成功。**特别特别特别要谢谢各位提出很多好的建议但没有被一一采纳的朋友,您的理解和宽容是我们这次和谐大团聚的成功的基础和保证。**

我想到哪里无轨电车开到哪里,但是有天线在上充电,那就是我时刻都想到每个位育人的参与,精力,才能,和位育精神的发扬,各位音容宛在,栩栩如生,我诚挚的向您们一一道谢和致意,能作为校友结交,无上荣幸。



2013-聚会加州积累经验

瞿德霖 66届



难忘的“位育”情结

黄承海老师

我从61年大学毕业到徐汇区工作，03年退休，前后整整42年，在五十一中学（今位育中学）工作了23年，从84年到03年在机关工作了19年，今天回想起在位育那段工作经历，是我的人生中受益匪浅，终身难忘的日子，位育的老领导、老同事、任教过的班级和同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报到

61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拿了师院毕业分配通知书到区政府集中，在机关巧遇同分在五十一中学的赵家镐（之前，我们彼此并不认识），就一起乘42路前往五十一中学报到。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问了交岗的民警才找到学校大门。在校长室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朱家泽同志。他亲切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分别向我们介绍学校和教研组的情况，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希望我们，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锻炼，他说，学校今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教师身上。接着，就给我们明确新学年的教学任务，让我担任高一（高一一年级当时还设在向阳小学）、中三各两个班的课，并当高一（4）的副班主任（班主任是沈文君老师）。

记得当年一共有十位新教师报到，他们分别是：顾蔚华（化学，她比我高一届，从第五师范调来）、徐鞠令（俄语，她从市二中学调来），其他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有谷红宝（体育）、刘序常、金复华（语文）、廖志豪（历史）、潘益善（物理）、金艳清（生物）、赵家镐（数学）和我（化学），为此学校的李楚材、胡蔚英、朱家泽三位校长和工会主席朱耀坤老师等，专门在红楼二楼的工会俱乐部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困难时期，学校的食堂以一碗南瓜汤作为点心来招待我们，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但我们当时还是

感到相当亲切、相当温暖的，我们为能成为这所学校教师集体中的一员，而由衷的喜悦。我还记得，开学后的第一次教工大会上，我作为新教师的代表发了言。

我很幸运，在位育中学，有机会参加五年制的试点工作。62-65年，从中三到中五，我担任了班主任和化学课的教学任务，中四、中五时还兼任年级组长和副教研组长，工作量比较足、任务比较重，但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在校领导的指导帮助下，在老教师的关心支持下，逐步适应并胜任各项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这一届五年制的试点工作圆满完成，得到社会、家长的一致好评。文革前的五年，组织上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年年使用新教材，任务虽艰巨，但使我较快地熟悉全部高、初中的教材和教法，打下了比较好的业务基础，初步学会班主任工作和年级组的管理工作。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有意义，最踏实、最有成效的五年。65年秋，送走了65届，我担任67届（3）班的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可惜因文革而中断了。在文革期间，我曾担任72届（2）的班主任，还兼年级组长（有十五个班级、八百多学生），当时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学生来源都比较差，但年级组的老师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心协力，在教育、教学工作上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任务，使我受到一种极不平常的磨炼和考验，对我工作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粉碎四人帮后，我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在学校主要领导张启昆和陈炜的带领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工作上，经过学习和实践，使我不断进步成长。在位育中学，我前前后后工作了二十三年，我从青年走向了中年，留下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我对位育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二、我崇敬的几位老领导

在位育任教的二十三年中，接触到的学校主要领导有**李楚材、胡蔚英、朱家泽、鲁夫、张华、张启昆、陈炜**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领导水平、懂业务、会管理，都是我崇敬的好师长、好领导。

李楚材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在解放前，他就在位育中学试行了中学五年一贯制的学制，到了六十年代初，又积极实施了新一轮的五年制试点，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可惜只完成了60-65的一届，后几届因文革而中断了），他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记得63年秋，在庆祝校庆二十周年的教工聚餐时（在老东楼底楼餐厅），借吃寿面（上面盖了二个荷包蛋）的机会，李校长即席向全体教师发表祝词，希望位育优秀传统代代（蛋）相传、绵绵（面）不断，令在座的全体教工难以忘怀。当时，我作为一个新教师，与李校长的接触交往不多。八十年代中期，在他被任命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后，因我在区里工作的关系，曾与他多次交往，时有电话联系，有几次应约上门去拜访他，听取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次在他家巧遇也去看望他的朱家泽同志，我正好随身带了一个相机，在我的建议下，为他们拍了好几张照片，他俩作为师生又是同事关系，单独在一起的合影可能仅此一次，事后他俩拿到照片后甚为高兴。此外，在八四年第一届教师节上，叶克平、李楚材、赵宪初被市政府分别任命为上海中学、位育中学、南模中学名誉校长时，我不仅参加了在展览中心宴会厅举行的仪式，还主动充当了一次“摄影记者”，抢拍到汪市长向李楚材等颁发任命书的珍贵镜头。事后，区委、区府也专门举行祝贺的仪式，我手头还保存着当时与李楚材三位名誉校长在一起的照片，每当手捧这张照片，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甚觉珍贵。

胡蔚英和鲁夫，他们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作为支部书记，他们是当年位育中学的主要负责人，我作为一个初入校门的年轻教师，在我的眼里，他俩是政治水平高，熟悉学校管理，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好领导，他们尊重教师的工作，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能组织好发挥好领导班子的作用，学校党支部是深受广大师生信赖的战斗集体，作为主要领导，他们还能和教师亲密相处，印象深的是，中午休息时，在工会俱乐部，他们还常常和教工一起下五子棋和打乒乓球，关系极为融洽。文革结束后，**胡蔚英**曾先后担任徐汇区的区长、政协主席。八四年三月，时任区长的**胡蔚英**同志曾陪同区委书记**邢志康**同志来学校找我谈话，要我作好去区里工作的思想准备。四月下旬，我接到调令去教卫部工作。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较多的接触，他在工作上给我很多的关心和指点。他离休后，仍一直关注着区的工作，对教育事业和位育中学的建设和发展，发表不少重要的意见，尤感亲切。**鲁夫**同志文革后调往市二中学任书记兼校长，每当我去市二中学联

系工作时，他都很亲切、很坦诚地与我交换意见，提出建议，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和鼓励。八十年代末，他离休后，曾应区委领导之邀，与朱家泽同志共同担任区教育咨询组负责人，经常带领一批资深的老领导，深入各类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我们很少见面，但每当位育中学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时，还经常提起他，大家很怀念这位受人尊敬老领导。

朱家泽同志当年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五年制的试点工作，经常受到他的关心帮助，四十多年来，不论在位育中学还是区里共事期间，他是我接触最多、交往最深，对我教育最大的一位领导，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最真挚的朋友”。去年他不幸病故后，我立即以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深切悼念他的文章，分别登载在《徐汇报》和区政协的有关材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有较多的回忆，这里不再重复，几年前也曾有位育海外校刊上登载）。

张华同志是在文革中特殊时期，来到位育中学担任主要领导的，我与他有一些接触和交往。他也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有文化素养。在那个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又十分无奈的年份，面对工宣队、军宣队和“红卫兵小将”，他发挥了老干部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维护学校和教师良好的工作环境，他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多次在小范围内流露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忧和对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做法的不满，有时为了保护教师免遭打击甘愿受些委屈，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他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对他落实了政策，在区人大机关担任领导，离休后，身体不太好，我也曾多次去他家探望。

张启昆和陈炜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调来我校任主要领导的。当时的位育中学，原来的校领导有的调离，有的退休，记得在位的仅我一人（那年我任教导副主任，以后朱彭令、陈钧渊、叶宝康、张礼贤先后任教导副主任），那段时间，我在他俩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有较多的联系和交往，也有较深的情谊，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毫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沟通情况。他俩的改治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和领导风格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那几年，是位育中学最艰难的时候，张启昆和陈炜同志带领大家，发奋努力、踏实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教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令全体教工无比激动和兴奋，他们两人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值得回忆的事很多，印象特别深的有：（1）在拨乱反正，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做了大量细致、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两位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对四人帮那套做法有切肤之痛的感受。来校后，通过个别谈心，召开各种教师座谈会，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勇于探索。他们两人还分别去一些老教师家里走访，予以关心和慰问，对家庭、本人存在的思想障碍和困难，

态度很诚恳的听取和关注，并尽力解决。我就陪同陈炜同志去探望过张嘉荃老师。张老师在文革中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迫害。那年，她近六十岁了，病休在家，原本想早点退休算了。陈炜同志去看望她时，很亲切地鼓励她养好身体，大胆出来工作，带教好青年教师，为振兴教育事业再作贡献。张老师听后深为感动，当场嬉问陈炜：你们再重用我，就不怕再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陈炜立即回答：今天来看望你，就表明校领导对你的信任和尊重，对你多年来工作的高度评价，我们再也不会知识分子政策上走歪路，你尽管放心！学校会全力关心和支持你的工作！这次家访后，张老师心情很舒畅，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本来体弱多病长期休息在家的她，很快就得到康复，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中去。她每天到校指导、帮助青年教师，做到热心、细心、耐心，经常到课堂听课，还具体辅导青年教师如何备课、如何命题，在她无微不至的关心下，一批青年教师茁壮成长，或为学校的骨干，挑起了教学重担。有时学校师资紧张时（如79届理科班教师长病假），她还重执教鞭走上讲台，代了一学期的课。从七九年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教学岗位上。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张老师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都出奇的好，展现了一位老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类似张嘉荃那样的老教师，当时在校内是不少的。例如陈冰清老师，在应邀担任学校顾问的那几年，几乎全身心投入，全力支持张启昆、陈炜的工作，对当时学校的各项工作发表了许多很具体、很有成效的意见和建议，两位主要领导对他很信任、很尊重、很照顾，使他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和工作能力，在他的晚年又得到充分发挥。他的精神面貌是很振奋的，心情是十愉快的，在老教师中产生很大的反响！（2）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些教师先后出国探亲或定居，对此，两位领导以十分认真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记得杨宝琳等老师赴美定居手续办妥后，张启昆同志就找她谈心，勉励她出国后不忘祖国情怀，要多向学校介绍国外好的情况，常回国走走看看，老张还对杨老师说：你去美国，支部会热烈欢迎你，将来你若想回来，我们同样会热烈欢迎你！过几天，杨宝琳老师临行时，学校真的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令杨老师和到会的同志十分感动，生动体现了两位领导切实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真心实意！之后几年，每到春节，他代表学校，还专门发贺卡给在国外定居的各位老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支部主要领导，能这样做是很有胆量的，也是很不容易的！（3）他们严以律己，不徇私情，以此带动和要求班子的成员。当时位育中学的招生情况已趋紧张，慕名而来的家长和学生应接不暇，张启昆在招生工作上严格把关，不随意开口子。记得有一次，上级部门曾派人来，希望照顾解决一位已故中央领导的孙子进位育就读，在班子开会讨论时，多数同志感到有点为难，如拒绝，似乎情理上有点讲不过去，但张启昆明确表态不同意随意开口子照顾，在场的同志看他讲得有理，态度又坚决，就不

再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了。这在当时环境下，表明他的党性很强，令人敬佩！记得当时，两位领导还在班子中宣布一条规定：在评先进时，班子成员一律不参加，让给在一线辛勤工作的教师，这在教师中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张启昆同志平时生活上艰苦朴素，他的双手和头部经常颤抖，吃饭写字都很困难，尤其在公众场合，更难控制。那几年，他在学校用步，从不让食堂照顾，买了饭菜带到办公室，用双手握住调羹慢慢进食，有时我们看到此情景，很难过也很感动！主要领导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严格要求班子成员，所以两位领导在学校威信高，有号召力和凝聚力。

（4）大力培养和关心青年干部，当时在学校的领导层中，张和陈是年令比较大、经验丰富又有水平的老同志，他们两人合作配合得很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这些同志，大都缺乏学校领导的工作经验，只是在他们指点下，做些具体工作，对全局性工作很少关心。老张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身体欠佳，尤其是双手颤抖，不能书写，他每次去区里参加重要会议后，回到学校，马上找办公室同志（经常是叶秀珍老师）来，由他回忆复述会议内容，让叶老师记录成文，再向班子或全体教工传达。老陈在时，学校的重要计划、文件都由他执笔，老张最后审定。老陈调离后，开始一段时间，老张仍用老办法，先由他思考，准备好腹稿，然后由他口述，让办公室同志记录成文，交班子讨论定稿，那时学校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陈炜调离后，老张很注重对我们的培养，先从制订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开始。在班子讨论后，他要我们轮流执笔，成文后，交给他审核，他提出意见后，再由我们修改、定稿，并负责在教师大会上宣讲布置工作。初次接触这样的工作，对我们这几个人来讲，还是难度不小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锻炼、提高的机会。记得还是从我（当时我已担任支委、副校长）开始实行这个办法的。另外，在开会讨论工作时，他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坦率地发表意见，讲错、讲不完整，他不会随意批评而是耐心分析指出，以此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和领导水平。所以，在这几年中，班子成员积极性高、思想活跃又步调一致，大家齐心协力，学校各项工作很有起色。

（5）张、陈两位领导还在政治上关心和启发我。记得七八年底，张、陈两位领导分别找我谈心，重点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明确帮我分析，指出我的家庭情况不应该成为要求入党的障碍，要我解除顾虑，振奋精神，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党组织。春节过后，我重新写了一份入党报告并请陈炜和姜顺法两位同志作我的介绍人，七九年六月支部大会审批通过我的入党要求，我幸运地成为位育中学文革结束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同时还审批通过了孙欣耕同志的入党要求）。八三年后，陈炜、张启昆同志先后调离学校（朱彭令同志任支部副书记，之前，区里调来庄中文同志任副校长），陈炜曾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宣传部长、副区长（八七年后调任静安区区委书记、人大主任，九七年离休），老张则任区教育学院院长兼总

支书记，还担任区人大副主任。八四年我调离学校后，在区里工作时，又与他们有较多的接触联系，从未间断。可以讲，这三十年来，我政治上的进步，工作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两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的结果，几十年来我一直很敬重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几年，张启昆病危时，我多次去探望他，询问他有何最终的嘱托？。他虽然故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范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三、温馨、团结、奋发向上的教师集体

1，当年，我所在的化学教研组，都是女同志（张嘉荃、陈惠娟、顾蔚华、喻昌楣），我是新教师，又是年令最小（63、65年后，徐大年、周觉平分配来校，以后陆续又分配来了一些同志），所以各位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爱护，热情帮助。第一年我任教初三、高一两个年级时，陈惠娟、喻昌楣两位教师无论在教材分析、备课命题还是演示实验等环节上，都对我悉心指点，发现不足及时指出，有点进步就鼓励。记得上第一节时，教研组长张嘉荃老师约了陈惠娟和教导主任陈冰清老师来听课，听课，除向我提出意见外，他们勉励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工作的场景似还浮现在眼前。二个月后，在教研组的安排和鼓励下，我在高一（1）班向全区化学老师开了一节公开课，为此教研组全体同志都来关心指导，尤其是与我同教材的喻昌楣老师更加热心。张嘉荃老师还特地请来了市教育局的季文德老师和已调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李玉廉老师（原教研组长）来听课指导。作为一个刚踏上岗位的新教师，这是很大的鞭策和鼓励！平时，我们教研组学习空气很浓，组内相互间经常听课，交流心得体会，每天中午食堂用饭时，总是坐在一起交流沟通，甚为亲切、融洽。教学上，很重视备课组活动，每堂课，从教材分析、演示实验到复习提问、作业布置，都要仔细讨论研究，统一认识。不论是谁，凡先上课的，在课后就会主动把课内的教学效果和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别人，以期共同提高。教研组还经常去外校先进教研组学习取经，学习有关报章杂志上介绍经验的文章，一些重要的教学实践活动，如大型公开课、化学实验考查等，全组通力合作，以期达到最好的成效。教研组内，不论是谁，也不论是那个年级，只要有人病假，总有人会主动出来代课。63年春天，我因劳累，一度发声嘶哑，无法上课，当时教高二的张嘉荃，教高二的顾蔚华与陈惠娟都争着来代课，一周的课就由组内同志分担，没放掉一节课。64年秋，我第一次教高中毕业班，教学上毫无经验，但张嘉荃老师鼓励我勇挑重担，她将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毫不保留地向我传授，常让我随堂听她的课，在她的带教下，那届高中毕业班的教学任务较好地完成，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信心。化学组的这种好风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教师，在校内较大的影响。七十年代末，我虽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但我仍在第一线兼课，连续六年任教高

中毕业班的课。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是永远不会离开教研组的，与教研组教师深厚的情谊从没间断过。八四年我到区里工作，仍经常联系，还先后举行两次聚少联谊活动。现在原教研组的同志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了，但近期还时有联系，节假日我仍象以往那样去探望已九十高龄的张嘉荃老师。

在位育中学许多老教师都象化学组老师一样，对青年教师很热情、很关心。我第一年的办公室临时安置在北四楼，那里大都是数学组的老师，如叶宣薇、杨光明、陈文翰、蔡光天等人，他们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也经常在教学方法、学生工作上指点我，我一个人在这样的办公室并不感到孤独，却感受到长者对青年人亲切、温暖的情怀。六三年起，我先后担任过中四、中五的年级组长，这两个年级组，几乎集中了校内资深的教研组长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如朱启新、李莲宝、章寿朴、张嘉荃、蒋文生、戴筱尧、黄孟庄等，他们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级组长，都很支持、很配合，热情诚恳地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丝毫没有轻视的情绪，这一点我是很感动的，是我当年做好工作的重要动力。

2，位育中学从60年起，从华师大、上师大陆续分配来二十多位青年教师，当时的学校支部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管理和培养。那几年，先后委派汪学瑜和白铃任团支部书记，教工团支部的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在青年教师中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学校由朱家泽联系和指导教工团支部的工作。当时的青年教师大都住在学校宿舍内，有较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的第一年就勇挑重担，如曹建中、赵家镐、邓大文就任教高三毕业班。在学校领导和老教师的关心帮助下，都很快地熟悉和适应所担负的工作，两年后，有的还担任年级组长和副教研组长。记得63年组建中四年级组时，组内除了一批资深的老教师外，班主任都是青年教师，有曹建中、徐鞠令、殷蔚芷、潘益善、白铃和我。我们几个班主任，在工作上相互鼓励和支持，在一些重要环节上，相互提醒和帮助，两年中，我们青年教师之间也好，青年教师与各位老教师也好，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整个年级组的工作很有生气、很有成效。63年秋、64年夏和64年秋，由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带领，整个年级先后去马桥农村和吴泾化工厂劳动，我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好评。六十年代初的几年，位育中学良好的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文革结束后，良好的政治环境，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很快成为学校的骨干，涌现了一批师德好、业务强、有丰硕成果的优秀教师，劳动模范，有的走上学校和区的领导岗位。赵家镐、潘益善、蒋衍、陈文高、金荣熙等先后评为特级教师，张礼贤八三年调到区里工作，曾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区人大副主任。赵家镐在八十年代中期起，在担任位育中学校长的十多年中，位育中学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他多次荣获上海市和全国优秀教

66届吉力立校友为
校庆而作《破阵子》
一词，并把位育校训
八个字嵌入了词中。

破阵子

贺母校七十校庆

走过峥嵘世纪，辟开变幻风云。
翰海留名七秩萃，桃李无言百丈荫。
悠悠学子心。

回首蹉跎岁月，依然位育精神。
进取求实真济世，严谨团结乃善身。
煌煌母校魂。

2013年11月16日作于上海

注：进取，求实，严谨，团结，乃位育校训

师、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被评为特级校长，后又命名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还先后当选为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代表，是当年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今天，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在位育中学工作、生活的情景，多年的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令人难忘和留恋。多数同志，至今仍有来往，还保持原有的老习惯，相互之间直唤名字，无话不谈，真诚相处，十分亲密。

3，位育中学的老师都是以事业为重，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对班主任工作积极负责，对学生一片真情又严格要求，许多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文革中学校的好传统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教师们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炽热之心不变，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竭尽全力献身教育事业。这里记起两件事：（1）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后，招收了72届（按地段分配，就近入学，这个年级有十五个班级，八百多名学生，我任班主任兼年级组长），当时学校并没有那么多教室，年级组的老师人人动手想办法，与后勤人员一起挖潜力，把东楼底下的小食堂以及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都清理出来，把一间阴暗、潮湿的储藏室辟为年级组办公室。教师办公桌不够，好几位教师每天拎着包去图书馆办公。好几位教师因种种原因，只得临时改教其他课。如原上体育课的曾倩老师改教政治，学外语的肖子真老师临时改教语文课。当时年级没有开设化学课，我就改教了四年的政治课，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来对付。

年级组内所有任课教师都当正副班主任，以应对混乱的学校秩序和各种干扰。处境困难、条件差，但大家总是以高度的责任感面对我们的学生，尽力教育好每一个学生。这届特殊时期招收的学生，经过四年的中学学习，还是取得不小的进步，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2）在74届年级中有一批很优秀的教师，面对不太正常的教育秩序和教学环境，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作种种探索和实践。外语组的刘光坤老师在教研组和田丽云老师（班主任）的支持、配合下，在（1）班，结合外语课的教学，把课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改编成英语版的活报剧，利用课内外时间约请同学排练（实际上班内大多数同学都关心参加），在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气氛不浓的七十年代初，能有这样的尝试是多么的勇敢！要花多大的代价啊！经过反复动员、辅导，这些学生竟奇迹般地排演出来，在校内彩排和正式演出时引起全校轰动，好评如潮，在全区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光坤等老师这种热爱教育事业和勇于探索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位育中学教师集体是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相互间是真诚相处，携手共进的，同事间都有深厚的情谊，几十年来大家友好交往，格外亲切、真挚，我一直怀念这个令人难忘的集体！但愿位育中学的好传统能“代代相传、绵绵不断”！

胡文梅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从中二到中四，教了我三年英语。记得中二时胡老师开始担任英语老师，我们就被她那生动活泼的讲解，标准的发音深深地吸引住了。英语课成了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胡老师讲课时全力以赴，充满激情，她的声音清晰响亮，有时在一楼教室里都能听见她在三楼讲课的声音。老师非常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强调要能说能听。许多同学为胡老师的英语才能着迷，学着老师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练口语，就连日常用语中也夹杂了不少英语腔调。那时，我们每天课外花很多时间朗读英语，我妹妹听到我夜里说梦话都在背诵英语课文。

上胡老师的课，既兴奋，又紧张，因为胡老师以严格而闻名。为了增强我们的英语听力，老师常常在英语课结束前来个突然袭击，要求大家拿出一张纸，在五分钟内来一小段英语听写测验，然后收上卷子。下一堂英语课前，发还评了分的听写卷。我在英语听写测验上常常吃到‘3’分，那个大大的红色‘3’字虽然令人难受，也激励自己今后继续努力。到了中三，在每次英语课开始时，胡老师安排一位同学用英语讲述一小段故事，以此来训练学生的口述能力。胡老师鼓励我们要课外阅读，建议使用正规的英汉大字典。当时，市场上唯一的由国人自编的英汉大词典就是郑易里编写的《英华大词典》，人民币五元多一本，价格不菲，有的同学得与父母商量好久才能买下。到中四时，全班同学基本上是人手一本《英华大词典》。胡老师指导我们善用字典，增进阅读速度，“速度就是时间”是她的口头禅。老师还常常以问卷了解同学们的课外阅读材料，根据同学们不同的兴趣，推荐适宜的英语短文或原著。

胡老师原先不是教英语的，1954年，她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被选中，来位育中学任教地理。后来才转任英语老师。凭着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时训练出来的英语基础，胡老师展示出在英语教学上的独特才能。胡老师的英语教学引起了区教育局的重视。曾以我们中三（4）班为例，给区里英语老师上过一堂示范课。记得那天有很多老师来听课，教室挤得满满的，连走道上都坐着旁听老师。示范课上得很成功，同学们和老师配合得很好。下课后，同学们围着老师，兴奋地讨论刚才的英语课，胡老师看着我们，爱抚地说：“看，你们的脸都憋红了。”

那三年由胡老师严格训练出来的英语能力令我受益终身。中五时遇上了“育才中学”经验，上课时老师不再讲课，以学生提问为主。十年动乱后重返学校，读大学和研究生时英语免修，不再在教室里上英语课。后来出国留学和工作，都是靠位育中学那几年打下的英语底子。有时与负笈海外的同学聊天，大家都深深感谢胡老师当年强化训练：“我们的英语都是胡文梅老师逼出来的”。看到现在的一些青少年学英语，父母化了大把大把的钱上英语补习班，学了好多年，英语还是开不了口，还在默默地学语法，静静地做生词卡，回想起当年我们轰轰烈烈地学英语的情景，真希望现在孩子们能受到像胡老师那样的英语训练。

1984年胡老师移民美国，定居在纽约。已经五十五岁的老师依然积极进取，不畏工作艰辛，跨入美国社会奋斗。她进入了纽约市教育局工作，很快能熟练地运用先进的计算机软件，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

位育北美校友会于1994年成立时，胡老师是第一批会员，并且多次慷慨捐赠给同学会。翻看早期的钟声年刊，几乎每一期都有胡文梅老师的报道。每次校友会在纽约聚会，胡老师都兴致勃勃地来参加，有时下了地铁，还得走半小时才到达聚会地点。我在2000年得知北美位育校友会，那年夏天兴冲冲地去参加纽约地区的聚会，最大愿望就是想遇见胡老师。那时我离开位育中学已经32年了，并不奢望老师还记得我，没想到一见到老师，

她马上就说出我是四班的。已经70岁的老师，依然神采奕奕，幽默机智。

2002年，在纽约地区欢迎朱家泽校长一行来美访问的聚会上，我和胡老师再次相聚。位育师长们的来访，令人回想起位育中学在文革时期的腥风血雨。文革初期，校党支部有组织地通过大字报公布一些教师的档案材料，挑动学生斗老师。外语教研组被冠以“高级垃圾箱”，是运动批判的重点。胡老师被扣上‘歧视工农学生’的帽子而被批斗。看到我们敬爱的老师受凌辱，心里很难受，那真是那个不堪回首的疯狂年代。其实，胡老师的严厉，是对工作的热情，是对学生的爱护。“爱之切，责之深”，我们班就有一位工人子女是胡老师的得意学生。聚会上我和胡老师聊起位育中学的文革时期，老师很坦然很宽容地对待那



各位同学，我在上周日坐飞机从旧金山到西雅图去看望贺俊三老师。那天飞机到西雅图时正值大雨，在机场租了一部车去了贺先生的家。由于路不熟又是倾盆大雨滂沱，开了三个小时才摸到他家里。由于我在两个月前就致电给他相约，又在一个星期前跟他确认，他非常高兴，然后他说他每天都在计算天数盼望我的到来。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他住在那所房子已经廿多年，现在是一个人住。他有两个女儿分别住在西雅图和温哥华。我也有25年没有看到他了。从外观来看他还算健康，只是非常苍老了。他在近年里发生了三四次中风。他说他很想念我们八班的同学和七一届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文革师生一直在一起，比如学工学农，条件也比较困难，同学也比较单纯，他很喜欢。他带过很多班级但是最喜欢这两个班的同学。一开始我就把同学们对他的祝愿和对他在我们年轻时对我们付出的心血的感谢一一讲述了，也把同学的录音放了，他很高兴，他说大家能记得他的耕耘和心血他也就知足了。他跟我讲每个人在青春期的培养是不一样的，有些需要鼓励，有些要引导，有些要帮助，还有些要适当纠正，这样他们才能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正确成长。他还算看得起我。说他一直认为我是孔明的后代应该会有智慧克服人生困难，走



西雅图探师记

诸葛奇 75届

入佳境的。他说他十岁就独自生活了，受过很多辛酸。后来在教会学校里才受到很好老师的教育以后成长起来。他说他对男同学的要求较高，因为他父亲就跟他讲男人要有能力才能结婚，不能靠家人。他自己到三十多岁才结婚的。他0三年和同学们见面时要求大家把家庭照片给他。他说看到同学家庭的成长很高兴，他说只有王大宁同学把家里的照片寄给了他。他把它珍藏在盒子里，也给我看了。我说鞠九同学要求把以前我们的照片给拍一下留作纪念。他说很抱歉找不到了，因为年代久又搬家和出国。但0三年的全部照片他都给我看了，我也拍了照。后来我又请他到附近的饭店吃了晚饭，其间又讲了很多的学校和同学的往事。那天他非常兴奋，只是走路非常缓慢和困难。看到从前那样一个我们青少年时代博学多才，纵横捭阖的老师忽然成为一个虚弱的老人，内心是很难受。在那大雨如注的晚上九点把先生从饭店送到家里，又和先生告别时握着他那双垂垂老矣的双手，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以前讲美人迟暮英雄末路令人叹息，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只是祝愿他老人家所剩不多的晚年一切安好。啰啰嗦嗦报了一遍流水账，只是希望对各位同学的嘱咐有一个交待和报告吧。并祝各位好。

上接 第23页 怀念胡文梅老师

时期的荒唐和不公，依然流露出对位育中学的深厚感情。胡老师的大度，令我感到自己有点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老是要提起文革时期的位育。大概是因为我们在1968年离开位育，那时的位育中学的惨状，就像电影的定格镜头一样，深深地烙在我们对母校的回忆里。

2002年之后，不再听到胡文梅老师的行踪。向校友会徐慧丽打听，才得知胡老师病了。胡老师嘱托徐慧丽，不要让她病情惊扰大家，她虽然不再参加校友会的活动，却依然关心着校友会的活动和钟声年刊。

胡文梅老师于2011年十月辞世，老师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很寂寞，悉心照顾她的老伴先她而去，三个月后，胡老师也孤寂地远行了。

谨以这篇短文告慰胡老师在天之灵：您的学生们永远怀念您！

1/21/2014 谢应平 Email

叶秋怡记性真好，写得很全，充满感情。胡文梅是位育的骄傲。她上课充满激情，说得不好听点，甚至吐沫四溅，

这正是当代所有学科教师缺乏的。记得我82年到复旦附中时，老校长姜拱绅对我说，文革前的位育试点5年制，其他比不过复旦附中，就外语特别好。记得万粟珍、朱启新也教过我们，当时没有多少原版可读，只有莎士比亚简写本，Peking Review, Vietnam 之类，为省钱，老师建议我们到福州路旧书店买过期的报纸杂志，说反正我们不是学时事政治，而是学语言，记得北京周报0.26元，过期的0.05元一本。78年读本科，我是华师大数学系英语A班（最高程度）的，还选读《科技英语》、《日语》，87年读研，总受到英语教师赞扬，说我可以免修了。在复旦附中，我与美国数学教师可以不用翻译谈1个小时数学教育（外语教师翻不出专用词汇）。现在督学数学教师多，我总被安排去听、评英语课。哈哈，全是胡老师打的底啊！

胡老师，谢应平想念您！

谢应平（中三(7)&中四(4)班同学，曾担任复旦附中校长近18年）

位育中学原校址

林更 52 届

1943年，位育中学在位育小学的基础上建校，当时的校舍是在拉都路（现襄阳南路）388弄15号内。五十年代中期中学部迁往复兴中路，原址改为小学至今。1987年我重访阔别了卅多年的母校原址，照了几张校舍的相片，值此建校七十年时，寻出和校友们分享。

最近收到五年制51届校友李三立院士的短信，他写道：

“祝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我到襄阳路388弄15号看我们念书时的位育校舍，发现这些两层的校舍正在拆掉，后面正在盖新的高楼大厦。遗憾！”

数日后，他又来一信如下：

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位院士朱邦芬（男），是在复兴中路的位育中学1964年毕业的。今天上午我们体检，碰到他，他说，复兴中路的位育中学校舍也拆掉了。现在上海都在搞房地产，有一块地皮，盖个高层建筑群，可以大赚钱，弄个中学“不合算”。

看来以后我们只能在我们各别的记忆里寻找我们位育母校的校舍了。



学校大门



大门左边的中学部主楼。一楼篮球架下的两扇窗内是李楚材校长的办公室，二楼左上角的两扇窗内是多位老师合用的办公室。



正对大门隔了两个操场的小学部大楼



中学部两座支楼之一，原来也是红砖建筑。



对着中学部主楼隔着篮球场是藕初堂，也就是我们用来集会，表演的大礼堂。里面的舞台上有一架钢琴，所以这舞台也是音乐教室。

超晶格的先驱——朱兆祥先生轶事

叶秋怡 66 届



我的博士后导师朱兆祥 (Raphael Tsu) 先生是著名的固体物理专家，是量子阱和超晶格的发明者之一。朱先生1949年毕业于位育中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医二年后，于1951年赴英，后来赴美攻读物理，1960年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1966年，朱先生加入了IBM，在位于约克镇高地的T.J.华生研究中心作为江琦 (Leo Esaki) 博士的助手，那时，江琦已发明了隧穿二极管，是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先生在与江琦合作时期主要从事人造量子材料的研究。1973年，朱兆祥与江琦首次在理论上提出了半导体超晶格和量子阱的概念，预见这种人造材料具有超越普通半导体的优良性能，两年后，他们的预言开始得到实验的证实。到1996年，由超晶格引起冲击是巨大的，仅在美国就有一万多文献发表，500多专利。近四十年来，半导体超晶格和量子阱在许多领域中趋于成熟。朱先生是公认的超晶格的先驱。

2013年五月上旬，夏洛特北卡州立大学举行超晶格研讨会，庆祝朱兆祥先生八旬生日和超晶格四十年。我应邀赴会，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朱先生，也遇到很多老同事和一些久仰大名的物理学家，当年我在博士论文中引用过他们不少文章。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生动活泼，轻松热烈，朱先生依然精神抖擞，风趣幽默。他妙趣横生的讲话，引起全场的阵阵笑声。研讨会回顾了超晶格从理论到实验的发展，展示了当前超晶格的各种产品的开发。在研讨会的晚宴上，朱先生讲述了不少他经历的趣事，在此略记一二。

1972年五月，朱先生参加由美国科学家协会 (FAS) 组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这是继美国总统尼克访华的破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前排左4为朱兆祥

冰之旅后的一个民间交流活动。科学家们以个人或科学小旅行团的成员身份访问中国。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由6人组成，其中有4位华裔科学家：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的高能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文物理和流

体力学家林家翘，亚利桑那大学的太空物理实验家范章云和IBM的固体物理专家朱兆祥。在三周访华期间，他们访问了各地的研究机构，工厂和大学，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美国科学家访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籍华裔科学家们。得知朱先生在IBM工作，周总理委托他向IBM的高层领导转达中国政府的邀请，邀请他们到中国访问。

朱先生回到美国，为如何实现周恩来这一委托很伤脑筋。IBM公司内部等级森严，朱先生是IBM约克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无法越级向IBM总裁通话。他只能把周恩来邀请访华之事写了个报告，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从基层的科学家到公司总裁有近十级的管理层次，至于该报告能否最终到达总裁手里就不得而知了。报告交了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消息渺然。就在朱先生几乎把此事忘记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IBM总裁-小华生要见他，朱先生驾车北上，到IBM总部的所在地-阿蒙克。心里还在疑惑：不知是小华生终于看到了他的报告呢，还是IBM内部有懂中文的人，从中文报纸上得知周恩来委托他转达的访华邀请。总裁小华生向朱先生询问了有关周恩来邀请的详细情况，最后说，要是中国政府允许他乘G2到中国，他就去访问中国。朱先生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什么是“G2”，又不敢再问，只能应诺下来再说。

朱先生满怀疑惑回到研究所，向同事们打听：“什么是G2？”同事们大笑：“G2是小华生的私人飞机啊！”看来，所谓的“G2”可能只是IBM总裁婉拒中国邀请的一个托辞而已。不管怎么样，这都是IBM总裁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回应，还得转述给中国政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怎么转达？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没有中国大使馆，朱先生在纽约华埠的朋友帮助下，找到当时驻联合国的中国大使黄华，告知IBM总裁的回应，总算完成了他给替周总理传话的委托。后来，IBM总裁访华之事不了了之，中国政府没能同意小华生的乘G2来华访问的要求，他们担心，一旦开了IBM的先例，万一其他国际大公司的总裁也提出相同的要求，他们总裁的私人飞机也要进入中国，岂不要乱了套吗？

能被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接见，朱先生感到很荣幸，他还记得和周恩来握手时，感到周的手非常软，民间有说法，凡是能做大事的大人物，手都很软。一年后，在美国华裔科学家研讨会 (US Sino Conference) 上朱先生再次遇到杨振宁，杨振宁得意地对朱先生说：“被周恩来接见，没什么稀奇。我还被毛泽东接见呢！”1973年夏天，应杨振宁的请求，毛泽东会见了杨振宁，同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和周培源。当时的国内外社会舆论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见，纷纷推测在这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毛主席与杨振宁究竟交谈了些什么？中外记者多次采访杨振宁，各式报道，众说纷纭，最标准的答案是杨振宁的英文表述，说毛泽东的物理造诣是“Very



朱兆祥博士(左)与江琦博士(右)

interested and has profound knowledge.”然而，这样的回答，不能满足朱先生的好奇心。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朱先生想知道这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是如何与毛泽东讨论高能物理的。既然杨振宁提起他与毛泽东的会见，朱先生趁机要问个究竟。面对朱先生的追问，杨振宁迟疑着不答，最后说：“我几乎什

么都没说，都是毛在讲。(I hardly say anything. Mao did all the talking)”这是一句大实话，杨振宁在多次的记者采访中，从来没提到过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1972年11月，应美国科学家协会邀请，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回访美国。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尚未派遣过任何人访美。当时中国科技界大部分科研工作仍然处于停顿状态，众多科学家均在五·七干校。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决定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回访美国。中国代表团在美期间的访问，名义上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负责接待，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代表团的访问极度重视。朱先生受美国国务院委托，负责招待中国代表团在美国东部的参观。当时他要统筹包括纽约警察局在内的四大部门，安排中国代表团的吃住行程。那时期的中国科学家们，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再加上科学家的营养状态都不好，若不睡午觉，下午就萎靡不振，困得不行。很多美籍华裔科学家对这一现象很是反感，大加批评。朱先生注意到来美访问的科学家们也有睡午觉的习惯，他特地安排了一辆大客车，专门供中国科学家们睡午觉之用，行程上也安排出午睡时间，用心良苦，体贴入微。

朱先生访华回美之后，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1972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访问的所见所闻。现在网上可以查到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朱兆祥评价中国的高端科技》。1972年，正是处于中国十年动乱的中期。以朱先生的睿智，当然感受到那粉饰太平背后的乱象，观察到在极力掩饰下的落后。如何报道他的中国之行，需要智慧和技巧。既要保持真实性，又得顾及到中国当局的感觉。细读朱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朱先生努力地以正面的角度详细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当时的状态下，朱先生依然深信中国人的才能和智慧，依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1973年，在美国华裔科学家研讨会（US Sino Conf.）上
左2：朱兆祥，左3：杨振宁

他预言：“我深信这个国家正在建立她所需要的技术基础。以中国的现时需要和社会形态而论，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很可以称为平衡的。已经发展了支持技术的科学基础，而且使科技推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在变为先进工业大国的道路上。”朱先生的预言，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得到充分的证实。该文章的中译者感叹：“想不到，72年一个华裔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的高端科技！”

虽然中美两国的科学家互访只是民间交流，在70年代初，中美关系仍然十分敏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经约谈朱先生，想了解他为什么对中国如此友好，朱先生对我讲起此事，他对FBI的约谈并不在意，只是不屑地说：“他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然而，对朱先生不理解的还有他的一些亲友们。朱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叔公是中国第一批由罗马教廷指定的六位主教中之一。解放后，留在上海的朱氏家族中，有些亲友被关押劳教，文革期间，朱氏家族更是受到冲击和迫害。朱先生的儿子大伟告诉我，在那个时期，他们全家到纽约华埠的餐馆就餐，曾有人跑到桌前指责他父亲，指责他为何对红色中国如此友好。然而，这些都不能改变朱先生作为炎黄子孙的赤诚之心。

朱先生处事低调，淡泊名利，他与江琦的那篇超晶格论文的引用次数高达2500多次，成为被引用的学术文章中之最。朱先生独特之处在于，他总是保持一种孩童似的天真好奇和充沛的精力，在科学领域里不停地上下探求搜索。一旦取得了成果，他又到另一个领域里，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新的探索。从来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就，也不徘徊于随之而来的名誉地位上，更不屑用已有的成就去争名夺利。朱先生开创了超晶格量子阱的领域，当超晶格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开展时，朱先生已经在非晶态的领域中开始了新的研究，由于朱先生的研究工作常常超前于一般人的认知，他的不少研究成果在发表时，和者甚少，就像阳春白雪那样。等到多年后，其他人在这领域里才开始大作文章。我曾见到朱先生在审阅一篇文章之后，摇摇头，笑了笑说：“这些成果，我当年早就做出来了！”既不沮丧，也不懊恼，只要能探索到真理就够了，至于随之而来的可能的名誉利益，朱先生看得很轻。

我于1990年期间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作博士后，研究多孔硅的量子束缚效应，常常感受到朱先生的精湛的科研才能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他的中华情结。是朱先生帮助我进入了工业界。二十多年来，我与朱先生一直保持联系，亦师亦友，朱先生是我人生中一位重要的导师，是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位育校友！

题头照片： 2013年5月，在夏洛特北卡罗立大学举办的超晶格研讨会，作者与朱兆祥先生合影。

我在大洋洲看《北美位育人》

王伟国 67 届

我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南半球的墨尔本已生活了二十六年了。

每天上网已成了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众多我所喜爱的网站中，近来又多了一个，那就是位育中学同学会北美分会所创立的《北美位育人》网站，那是我失去联系四十五年，小学和中学同窗十二年的叶善章同学热诚向我推荐的。谁知浏览了此网站，又下载了自1994年创刊至今的共十九期《钟声》年刊，我竟深深地被吸引住了。这不仅是位育曾是我学习了六年的母校，它伴随我度过了人生最值得留恋的青少年时代，而且，出国几十载，鲜有回故里，我和位育失去了联系。我怀念母校，怀念母校的师长和学友。《北美位育人》和《钟声》，让我身在大洋洲，过了位育瘾。

从这些钟声年刊中，我又见到了久别的教我育我的众多师长。在上海襄阳公园，坐在轮椅推车上的李楚材校长（《故乡之旅》55届罗家晖，钟声第6期），依旧风度翩翩，不减当年。在《听校长讲那过去的事情》中（60届潘重，钟声第13期），向我诉说了位育的建校史。2002年，受人尊敬的朱家泽校长率团遍访全美，与北美位育人叙旧话新，留下了张张佳影。我又见到了曾教过我的胡文梅、薛兰芬英语老师，陈文丽数学老师，潘益善物理老师，黄承海化学老师，席与清体育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老师们向我教授知识的情境，又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在校时相邻几届的同学，甚至解放前的校友，数以百计地再现在我眼前。北美位育人，精英聚集，不乏成功人士。著名高等学府伯克利大学华裔校长田长霖，有机化学家覃雪芝，固体物理学家杜瑞瑞，气象学家周嘉瑜，仅是几位出类拔萃者。还有当年位育的知名人士，诸如画家汤沐黎和指挥家汤沐海汤氏两兄弟，《钟声》报总编伍幼威，女排队长刘仁，男排队长史美进，不胜枚举。

记得几年前，在墨尔本的一次聚会上，有一位冯先生得知我中学在五十一读书时，问我是否认识覃雪芝。原来，他

们俩曾是淮海西路同一条弄堂的邻居。他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覃雪芝绝对聪明。我与覃雪芝偶有交往。读了《钟声》俞沐民写的《上下求索，孜孜不倦—覃雪芝专访》，一个怀有诺奖梦，勇攀高峰，自强不息的成功之士，令人敬仰！我在他葬礼的录像中，瞻仰了他英年早逝的遗容。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一期又一期《钟声》年刊。《钟声》第10期有一篇《夏访黎谨》文章，作者龚纪光。原来她在加国温哥华。龚纪光，她是我高安路一小的校友，比我低一届。一位活泼开朗的阳光女孩。当年在大队部里，赵国屏是大队长，我是副大队长，她是文体委员。我去过她家，记得她母亲杜淑贞是团市委副书记，还应邀来位育作过报告。在北美位育人中，看来有不少高一小学的校友，叶善章、蒋青、瞿德霖，还有住在永嘉路陈文乔家楼上的李恰曾。

北美位育人，生活多姿多彩。洪大德的《跑，跑，跑》，萧亦麟的《高尔夫》，徐承一的《闲话乒乓》，叶秋怡的《初学国画》，还有蒋青的《我在费城京剧社》。纽约聚会，费城聚会，明洲聚会，中西部聚会，加洲聚会，同学聚会，连年不断，笑语不绝。那些畅游世界各地，图文并茂的游记，更令人目不暇接。

浏览《钟声》前后十九期，诗文画作数百篇，主题包罗万象。以上仅是我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拙作。真是：

北美位育人，亲善如一家。
校园忆往事，异国响钟声。
精英齐聚集，鸿图大施展。
海外逍遥游，古迹风光留。
有朋远方来，众友笑相迎。
学子遍天下，南北遥相应。

美国澳洲，一北一南，一西一东，互联网站，位育相通。

我在大洋洲向北美位育人祝贺新年，并祝《钟声》二十大寿“快乐”，海内外位育情源远流长！





My Piano Teacher Yang Jiaren (杨嘉仁)

Benjamin Chang, 1961

Ts' ong (傅聪) and Gu Shengying (顾圣婴), for instance.

It always gives me stabbing pain to think of this great musician who took his own life by putting his head under gas in 1966 after being humiliated and tossed around in the maddening whirlpool of political turbulence. Together with him went his wife, an outstanding music educator. Their tragic end was seen as an act of bravery because in doing so they condemned an insane society in which talents were no longer appreciated but brutally trampled upon.

When I was about 11 years of age, every Friday afternoon I would visit a beautifully decorated house nestled in the quiet neighborhood of Maoming Road, Shanghai. There in the living room a kindly-looking, bespectacled man would sit on the couch opposite to a grand piano, waiting for me. I had come to Prof. Yang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family friend. The professor had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take me on one condition, i.e., I must be easy to teach and quick to learn, which I managed to prove myself to be the first time we met.

I had been self-taught for a couple of years prior to receiving Prof. Yang's formal training. On the first day of instruction, he explained to me that when my fingers were on the keyboard, they should take the shape of a ball, curving downward, rather than being flat and moving around like in mahjong game. His vivid remark tickled me. Before long, he put me on the right track, focusing on basics. He selected five books, each geared to a specific goal. He was strict but disarming, critical but encouraging; making careful notes in my notebook as reminders and sometimes in the music books as well as points for special attention.

Prof. Yang had a tremendous sense of humor. He preferred to walk around when the class was in session,

The year 2012 marked the centenary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rofessor Yang Jiaren, who founded the conducting department of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the early fifties and trained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of well-known conductors, whether symphonic, operatic, or choral, that are still active on stage today. Among his piano students were some internationally known pianists, such as Fou

punctuated with his witty remarks. Once I was playing a little piece from Carmen when he put down his burning cigar in the ashtray and started a Gypsy dance while humming the tune. Hardly had I finished when I heard a series of spitting sounds vehemently coming from him. What had happened, I wondered? I turned around only to find him spitting the tobacco bits from his mouth in exasperation. It was some time before he finally controlled himself and explained to me that I had played so well and he had been so enchanted that when he resumed smoking he had accidentally got the wrong end of his cigar, i.e., the burning end, in his mouth!

Prof. Yang also taught me how to associate sound with image. Thus, he said, not only would my playing be delightful, but also meaningful! As a kid, I used to separate the two until one day he told me to imagine while playing Burgmuller's Pastoral that I was tending a flock of sheep in the pasture, roaming around and having fun, and that as evening set in I headed home and lightly bolted the door as the final note was gently touched on the keyboard.

Prof. Yang had an amazing command o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Not infrequently was he heard conversing with my father in English, which I didn't understand at the time. But I listened in awe and admiration. Stepping out of his house one day, my father confided to me with pride that Prof. Yang had said I had been making rapid progress "like an airplane". His remark sure made me feel good, but deep down I knew that it was a compliment for a little boy with only the beginner's profile.

Every single class I had with him was a positive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 I had never seen any signs of sternness or impatience on his face. I would leave his home with "a song in my heart and a spring in my step,"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lesson that would come in a week.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my lessons with Prof. Yang came to an abrupt end after two years. But I always see those two year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in my life. For he led me into the fabulous world of classical music,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taught me to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whenever I am in distress. Sixty years ago I saw Prof. Yang as no more than a good piano teacher, but today as a great maestro whose musical legacy is timeless. His dynamic larger-than-life image will always remain fresh in my memory with his shoes hard to fill as ever, even decades after his departure.



向照顾潘承芬老师的 上海位育校友致敬



俞吉慧 70届, 孙雯 81届

和我的语文老师蔡啟凤蔡先生打电话拜年，她移民澳洲多年，每年都会回国。最近一次，八十多岁的蔡先生特为去日晖老人院，看望了九十多岁的潘承芬老师。蔡先生讲起潘先生在她刚进位育教书时，做过她的MENTOR，也可以算是她的老师了。

俞吉慧这个名字和电话，是蔡先生电话里告诉我的。她讲：“我们位育的校庆啊校友会啊，除了歌颂很多成名成家的校友，千万不能漏掉俞吉慧那样的校友。”第二天，我就与俞吉慧学长通了电话，他非常客气也非常谦虚：“主要还是位育的同学热爱位育，而且普遍素质都高，潘先生教过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很帮忙的”。他电话里一口气提到了很多同学的名字，因为无法一一记录下来，应我的要求，我们连通了微信，于是一来一去，有了下面这段近乎采访的对话。

孙：“…我母亲徐鞠龄也在位育执教，与潘先生老同事三十多年。幼时跟随父母去潘先生家石门路的房子，我记得吃到很多稀奇的东西和高医生的和蔼可亲…我父母八十年代上黄山，也是和潘先生家的高医生一同去的，我爸调皮给高医生起绰号叫他高老太爷，以示高医生的德高望重…”

孙：“潘先生后来做我初中的数学老师，她没有子女对学生像自己的孩子。高医生过世之后，近年来由位育学生在照顾，这件事其实我们听说已经有一阵了，但凡听到的同学老师，无不深受感动。我们都希望有机会能了解一下来龙去脉，认得一下热心的同学们，弘扬一下这种精神。”

俞：“我是位育70届的，潘老师做了我四年的班主任。她看着我长大，下乡11年后返沪工作，现在央企中国外运上班。讲起照顾潘先生这件事，陆志刚，郭殿华，顾根莲，陈志伟，都是有功之臣，关键时候都是他们在帮忙，他们都是潘先生的学生。还有70届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可能因为以前我是班长，指派他们去照顾潘先生都很卖我面子，尤其是女同学们，她们很多已经退休了。”

俞：“我和你随便聊，但是不要去写和发，这些不是我刻意去做的，而是随着潘先生年纪越来越大，她越来越不能自理，老太太对我们提要求，我们不可能置之不理，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俞：“比较难的是最近的几年，2012年12月21日晚上，潘先生睡觉时幻觉棉裤掉地上了，自己弯腰去捡，人也跟着掉下床去。天亮后保姆给了我电话，当时告知情况尚可，稍有痛感，身体可以活动。等我晚上下班后赶到，郭殿华

(徐中心的医生，好像是65届的)已经在楼下等救护车了，告诉我需要去医院拍个片子，才可以放心。检查结果是股骨颈骨折，医院认为不宜手术，卧床3个月，就此回家了。”

俞：“医院回家后，潘先生要我打电话给她朋友，就是陆志刚的母亲，第二天陆志刚就回电给我，才知他也是潘先生的学生。他马上就去看望潘先生，过一天送上门一只气垫床。就是郭医生建议我去买的还没来得及买的。”

俞：“医生吩咐不好动，保姆也不够专业，潘先生就此得了褥疮。本来睡眠就不很好，因此晚上更睡不好，常常整夜喝水，换尿片，还要抓痒。日夜连续作战保姆无法承受，找来的看护做了两天也受不了逃走了，无奈之下只好我自己下班之后去当夜间陪护，保姆管白天我管晚上，夜里趁平静时在潘先生床边靠一下，天亮交给保姆我再赶去上班。直到2013年的1月30日，为了让保姆回家过年，郭医生联系的日晖医院进去，当时的褥疮已经很深见骨了。褥疮的问题很难解决，我拍了照片后，专门去九院疼痛专科询医配药膏、药水。中山退休的护士长顾根莲，应该也是我们位育的学生，60届的大概，她亲自指导保姆换药。”

俞：“2013年春节之后保姆不愿再来，潘先生就没法回家。日晖进去说好一个月的，也赶我们，无奈之下，我再次找了陆志刚，他第二天就帮我落实到宛平医院，最终住了一个多月又被赶了，陆志刚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只得再想办法，其间也试着找过保姆，但始终因为在家，生活和医疗，都没有专业护理来得可靠。最终一致决定开始找养老院，走访了很多家，费用大的，老太太心痛太贵，便宜的根本进不去，最后还是郭医生托了人，2013年5月进的日晖养老院，逐渐平稳过来。”

俞：“我在潘先生的养老院里留着个记事本，尽量记录每个来看望她的访问者。因为来看她的朋友、同事、学生太多太多。在养老院里潘先生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工作人员和其他老人也看得出她为人好，所以那么受人尊敬。”

俞：“很想提醒去看过潘先生的同学老师，不要为养老院简陋的条件难受。这个心路过程我也是慢慢调节过来的。其实以潘先生的经济状态，她完全有条件住到设备更全条件更好的地方去。我也一直在劝她，我们需要节约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责任在身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负担无所谓留多点少点，自己辛苦一辈子省下来的，该想通该用了。但她始终还是担心用完了以后怎么办。”

孙：“老一辈都这样的，一来他们艰苦惯了，二来对外面飞涨的物价也不了解跟不上。真是难为你了，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也都深有体会：跟老人们沟通，最难的不是孝而是顺。”

俞：“是啊，所以我还是尽量顺着老太太的意思去做。平常潘先生的开销，我总是先垫付后结帐。其实我内心都有点怕和潘先生结生活费，担心她有情绪波动。2012年12月摔倒后到住院时，就没有再和她结过生活费，她把两张工资卡交给了我，大的费用我还是先垫上然后从工资卡里扣。平常去看她，每次我都烧些时鲜的或者是她喜欢吃的东西、带点日常的用品去医院，所有这些都是小钱都不入她帐，省得老太太心疼。最气人的是开车停车的罚单，不过花这些钱我都不在乎，因为我自认付有所值，金钱难买，是为潘先生开心，也是我自己对先生的回报。”

孙：“潘先生学生无数，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单单是您，受到潘先生的钦点？”

俞：“你的电话的确唤起我很多回忆，以前也没有仔细去想过个中缘由。“做人要善良正直”，是我父母大人言传身教的。照顾潘先生这件事，其实十年前就开始一点点在做，自然而然就过来了。潘先生是看着我小从小长大的，连带我的家人她也都是认得的，所以大概她对我太了解了，晓得我心软，也难得她那么信任我依赖我。做这些是为了让潘先生高兴，也是了自己的心。不是为了出去说，说出去不见得人人理解，没意思的，所以公开场合我反而常回避。”

孙：“抱歉打断一下，中国目前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老人摔倒都没有人敢去扶。请问吉慧大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难道从来没有受到过其他人的怀疑动机么？”

俞：“怎么会没有呢，当然有不少同学劝过我适可而止少给自己找麻烦，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下不为例。但是每次具体的事情一发生，总是心肠硬不起来回绝老师的。我唯一把握住自己的是，和老师是师生关系不是家人，我要做的是尽自己的能力关心照顾她，一旦碰到棘手的问题，就帮潘先生找位育中学的组织。退管会的许老师和曹老师都出面帮助过潘先生。另外，潘先生也有专业的位育学生，在帮她管理财产和法律上的事务。”



俞：“离开学校后那么多年，和老师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是真的。2011年春节后，由于潘先生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到不能行走了，只能卧或坐，她苏州的侄子侄女来上海后决定带她回苏州生活，我们于是开车送她。潘先生对苏州的福利院不甚满意，那段时间几乎每周赶去苏州，我们都是早上7、8点钟到，晚上给她吃好晚饭再回来，有时也推着轮椅带她去饭店吃饭，陪她和院里的其他老人熟悉熟悉，减少寂寞。潘先生苏州的侄子侄女也都是70、80岁的老人了，不可能到上海来照顾她，他们自己家里子女都上班，也要煮饭做家务帮忙带孙辈的。潘先生一次次找我要我带她回上海的家，我很为难，和那些亲戚商量，再做了潘先生

的工作，换了一家社区医院，单独一间病房，单独一个护工照顾，总算平息一段时间，但还是不能维持长久。最后潘先生的亲戚给我电话，让我去接她回上海。”

俞：“在苏州大概半年吧，在2011年的10月15日接回的，14日晚上8点给我的电话，第二天早上9点我就到苏州医院了，我和75届的一个同学(陈志伟)俩人接她回来的。我找了我一个乡下的亲戚，19日到上海来照顾潘先生生活。其中2012年春节亲戚回老家，是我和夫人过去照顾的，这样一直到今年1月5日。”

孙：“照顾潘先生，您夫人绝对是有功之臣，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您一定很难做到今天的，请问她也是我们位育的校友吗？”

俞：“她不是的，85年她生儿子在长乐路一妇婴，待产房内情况危及，我电潘先生后她上完下午一节课后赶到医院，都搞定，潘先生熟人多。所以我夫人和潘先生一直关系都很好的。”

孙：“哈哈，你这么一讲，潘先生的形象跃然纸上。她就是这样的，风风火火好管闲事，热情得不得了。”

俞：“是啊，就现在这个状态，她还要管闲事呢，张罗着帮人找对象啊，托这托那的，很有意思的。”

孙：“近十年如一日地照顾老师，一般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也顶多做得到这样。我把你的事迹转给海外的校友，大家都很有感动。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上海校友们做的这些好事告诉更多的同学们。感谢您的夫人，请您有机会也代我们转谢各位帮忙的同学和校友。”

俞：“好吧，那你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所取舍，一定要注意保护潘先生的隐私，维护她做老师的形象。”

孙：“实际上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校友，除了感动，也提供不了什么实际的帮助，写个报道，争取在校刊上登载一下，让更多的同学知道俞吉慧，陆志刚，郭殿华，顾根莲，陈志伟，也是希望给上海的校友们一点绵薄的支持。”

俞：“今年的1月5日潘先生被她娘家亲戚接回苏州老家。但愿她在自己亲友的照料下生活更快乐，更健康。”

孙：“这也是我们海内外潘先生学生的共同心愿。祝潘先生健康长寿！”

其他同学谈俞吉慧：

张希琳：“俞吉慧这个校友我们也听说过，潘先生没有儿女。做老师的时候，对学生充满爱心，应红慧和胡晔曾经是她的学生，对她充满感激。照顾潘先生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叫陆志刚的，上次到日晖养老院就是他帮忙的。因为他是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生。小时候，潘先生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的。俞吉慧，还有陆志刚，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热心人，对老师的恩情念念不忘。我是被他们感动的。原来也想尽点力，可惜，后来家里出了点事，我一时无从分身。后来，潘先生就被转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去了。所以，非常惭愧，没有帮上忙。”

胡晔：“是的，我那次去看了潘老师后他和我联系过，我有他的微信。后来我们几个同学也去看过，现在潘老师去苏州了，嗯，他住在宝钢那里，很远的，近十年如一日，俞吉慧真是很不容易的。”

瞿德霖：“听了相当感动，潘先生也教过我，为我们位育的校友骄傲，好人有好报。”

徐智平：“俞吉慧的故事让我感到作为位育人的自豪，感恩那些曾教导我们，关爱我们的恩师，祈祷他（她）们安享晚年！”

叶秋怡：“谢谢孙雯！文章很感人。”

潘先生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她把我们当成她的子女一样关心呵护。记得当年潘先生上课时，一位同学困得打瞌睡，潘先生一面讲着课，一面走到那同学身边，轻轻地说：“***，醒醒”。那语气，就像妈妈在唤醒孩子那样。那时我们刚从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许多事还不适应，潘先生不仅教我们代数，还关心我们在其他学科上的进展。在自修课时，她帮助同学听写英语单词，至今还记得潘先生那带着苏州口音的“Pencil”的发音。语文小测验的考卷发下来，那些在小学时语文从来都是5分的同学，得了3分就趴在桌上哭了，潘先生来教室里安慰启发。

读了孙雯的文章，非常感谢照顾潘先生的上海位育校友们。向你们致敬！”

别了，我的秋叶！

柯晓明 67届



傍晚时分，牵着我家的狗狗Abby在住宅附近的西雅图华盛顿湖畔散步，这是我们的每日例行。放眼望去，湖畔的小径上静静地铺散着金黄色又参杂着不少深红色的秋叶。秋风萧萧，不时将落地的秋叶无情地卷起，又轻轻地抛下。我和Abby都真不忍心踩上去，听见她们那吱吱的低声呻吟。抬头看去，在落日懒散的余晖下，树枝上昨天还是满满的，今天煞时稀疏的秋叶已流露出了几份孤单的无奈，却依旧保持着那份成熟的坦然和昨日的风雅。我心

中不禁动情：“残叶几片黄暗红，孤艳自赏仍从容”。秋风吹来，又见残枝上的所剩的秋叶飘落纷纷。落叶归根，它们轻轻地俯吻着树底下的泥土，难舍难别，仿佛在用生命的余温给人间留下无尽的回忆和来年的盼望。回家的路上，黄昏的路灯朦胧地点亮了已不知不觉降临的夜幕，心中不免有些惆怅，连Abby都驻足脚步，踩在落叶上，有些不知所措。别了，我的秋叶！别了，我的秋叶！

在“钟声”上看到同学们发表的各种文章、游记、回忆以及画作，不由得有些冲动，也想写点儿心里话。

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就有双重的身份、地位。男士是儿子也是女婿，女士是女儿也是媳妇。因为他们都会有两对父母，我也不例外。

我的父亲殷宏章，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母亲许桂岚，天津河北师范学校毕业，小学语文教师。后因子女多及抗日战争牵累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公公王明道，中国著名基督传道人，解放后因不愿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955年被逮捕入狱，被判反革命罪，无期徒刑。后听说是因胡耀邦当政，于1980年1月“落实政策”获释，前后在狱中近23年，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入狱，不明不白的出监。

婆母刘景文，也因与公公同罪入狱十五年，于1970年获释。婆母与我犹如母女，也经常会斗嘴，但都不记仇。斗嘴的内容不过是婆母过于节俭，在上海家中还经常穿监中的破衣烂衫，狱中多年使用的小马扎儿（一种可折叠的凳子）。天气炎热，隔夜剩下的饭菜都有味了，还舍不得倒掉，说多煮煮开就可以吃，我只好说：“妈，你想想，人家看见你这个样子，不会说儿子不好，一定说媳妇太恶，不给好吃好穿的。”可是她老人家给别人可舍得了。有弟兄姊妹寄来点钱，让二老增加点营养。老太太转身掏出二三百元，加上人家寄来的汇单转寄给其他的更困难的弟兄姊妹。以至我去邮局办这又取钱、又汇钱的事，邮局工作人员搞不清我是否有毛病。

说说我的父亲，我小时候虽然因为淘气，闯过祸挨过打，受过罚，但是并不怕父亲。因为他常会领着我们玩，他和三叔合伙变戏法给我们看，耍得我们一愣一愣的。头发长了父亲给我们剪，有一次不留神把我的耳朵剪破了一点。考试不及格他也不责骂，反而说，“孩子们还没到懂得读书的年龄，到了一定年龄，你不叫他们读都不行。”功课上有不懂的地方去请教父亲，他总是耐心细致，深入浅出讲给我们听，为了讲清楚树龄，父亲一时兴起，晚上拿着手电筒到树林里去找到被锯倒的树根，教我们数树的年轮。父亲喜欢唱英文歌曲，在我还不认识26个英文字母时，我已经会唱Old Black Joe, My Old Kentucky Home 等歌。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外公是天津颇有名气的牧

师，母亲中文修养很深，教我们背诵“唐诗三百首”，教我们唱用李白、白居易诗谱写成的歌曲，还教我们唱赞美诗。

说说我的公公王明道，1946年到1948年我在北京时，就知道这位传教士，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每周日都去王明道先生在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作礼拜，回来也常讲起她听到的真理及王氏夫妇的为人，当然只是听众与主讲人之间的关系，彼此并不认识。

1962年我这个没有见过公公的儿媳妇（我们1960年结婚时，他们已经在监中服刑），在北京草兰子胡同监狱院子里第一次见到公公（婆婆在1952年天铎陪母亲南下去杭州看望他外婆时在我家见过一面，当时我还是个初中生）。

公公见到儿子非常激动，抱着儿子（天铎是他们的独苗儿子）泪流不止，把我撂在一边。1980年因落实宪法，公公的无期徒刑改为一年，并提前释放。回到上海的家中，公公说起我，“一个女子能到监狱里去第一次见未谋面的公公，实属难得。”

婆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听说天铎娶了殷家的女儿，我非常高兴，也很放心。”要是拿现代青年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傻了。上海人常说一句俗话，“捉只白虱子摆在头顶上。”果然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他家的挂落。当然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这罪孽也深重呀！

1972年7月6日，女儿清音的诞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更多的欣喜和欢乐，她也很知道孝敬父母，敬爱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她在南京读南京农业大学时，每次寒暑假返沪，都用电话这样通知我：“妈妈，我下了火车直接到爷爷奶奶家，然后再回外公外婆家。”（我们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我常想，这辈子六件事最满意：

1. 天父给了我慈祥的父母，他们给了我良好的教育和深沉的爱。
2. 给了视我为亲生女儿的公婆。
3. 给了我一个好女儿，现在新加坡Novartis搞科研工作，研究新药。
4. 给了我一对好外孙儿、外孙女。
5. 我有许多我爱的和爱我的学生。

朋友们说，还应再加一条

6. 一个好丈夫。



家长里短

殷蔚芷 54 届，并任教 32 年

明州情结

— 望秋色，忆秋情

柯晓明 67 届

2013 年初秋 9 月，北美位育校友聚会在加州南湾。聚会才短短二天，但聚会散人气不散。会后的几周里，在伊妹儿上不

时读到 66 届中三学长瞿德霖一些有关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的文字和照片，这不由使我回想到久违的明州的秋天。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双城渡过四年的学生生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刚到美国的那些年，虽然学业繁重，乡思缠绵，但明州辽阔平坦的大地和友好朴实的主人逐渐将我们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学子拥入她温暖的怀抱。我不敢说我喜欢明州的冰雪严冬，但我真心想说，我怀念明州的秋高气爽和风俗人情。

明州真正的秋天，就象那里的春天，只有四五个星期。“稍纵即逝”对粗心的人或忙碌的人来说，一点不为夸张。明州也有大片的枫树，但在明州，与其说是“一叶知秋”，倒不如说是“一叶送秋”。常常是一夜秋风，就把昨天还是澄黄的枫叶染尽深红色；转眼又过了几天，枫树上只剩迎风残枝，枫树下铺满飘散的枫叶。我那时住在离明大农学院的实验农庄不远，偶尔也会钻进玉米田间，我喜欢那里的金秋气息和丰收在望的景象。明州一望无际的平原更给那里的秋天增添了一些萧瑟的气象。明州秋天的脚步匆忙，只有潇洒自如的人才能欣赏它独特的豁达，坦荡和温情。在明州的四年中，我有好几次都准备周末和朋友一起驾车去北方看红枫，但是同许多刚来美国不久的莘莘学子一样，我不是忧学业忙，就是嫌秋风凉。记忆中成行的只有一次，那是去了 Duluth，那是在 Lake Superior 旁的一个非常宁静，秋色宜人的小城。那天只是在明大 Duluth 分校看了一些朋友，在 Lake Superior 湖畔的航行灯塔小照了几张相后就匆匆赶路回家。至今想起仍后悔，不知何时再去！

明州值得一提的景观还有途经南下的加拿大野鹅。明州有千湖之州的美称。在北邻加拿大寒冷漫长的冬天来临之前，你常常会看群群壮硕的野鹅成队排行在蓝天飞过。它们经常悠闲地择湖畔栖息觅食，休整几天再继续它们的漫漫南飞旅程。明州来自北欧，尤其是斯堪尼维亚后裔居多，他们对这些南下避寒的过路客旅总是非常友好，虽然野鹅那嘶哑低沉的喊叫会让你心烦，它们那随地放肆的粪便会使你躲避。我曾经在美国三大食品公司之一的通用面粉公司 (General Mills) 实习过，在秋末时，公司就派人把大楼前的一片人工湖略略加温，让这些来自北方的野鹅有一个舒适的休息之处。

1989 年，为了毕业后的那第一份工作，我五月下旬就独自一人先行来到西北角的西雅图。一晃已有二十五年，也不

自觉地把西城当作第二故乡。翡翠城依山傍海，城中秀丽明镜的华盛顿湖和帆船林立的联合湖。华湖上有号称是世界最长的两座浮桥，其中的 I-90 浮桥把美国西北角的重镇西雅图和千里之东的波士顿连在一起。和明州的双城不一样，西雅图秋季漫漫，秋风萧萧，秋雨绵绵秋月泱泱。湿润的天气更使西雅图的秋天多姿多彩，多情善感。Anyway, picture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这题头和文尾照片是刚拍摄的，配上小诗一首，晒晒西雅图的一点秋色。

华湖秋兴

红黄缀绿影华湖，潋滟水碧卧通途。

秋色连波天云淡，南雁极天漫漫路。

明州情结 - 旧日犹在？

萧瑟秋风今又是，旧日犹在？

“Mall of America”是我离开明州三年以后的 1992 年在 Bloomington 市落成。九十年代中期，我因业务关系常去双城。虽不爱逛商店，却也曾慕名“到此一游”。临去前朋友告诫，一定在 20,000 多个泊车位置记住你停放之处，以免受大海捞针之愁。我那次进去一个多小时溜达，不化钱，才逛了一角，印象最深要数比肩室外规模的室内游乐场。据吴攸承学弟告知，他所在的新泽西州曾有意建造一个更大的 mall，但最终无果，因此 MOA 至今还是全美最大的 mall。

明州一直走在全美自然生态保护的前列。州立法有明文规定，千湖之州中的许多湖泊不准 motor boats 行驶，记忆中好像就连明尼阿波利斯城中的 Lake Minnehaha 也不例外。我所就读的法学院有一位女教授专注研究这项法律，还曾邀请我参加过一次有关的研讨会，但当时完全是好奇而不知其所以然。我有生第一次 kayaking 就在明州的湖泊，虽然以后在香港，加勒比海和墨西哥都曾 kayak，在西雅图更是三天两头，但没有一处享有明州的那份宁静闲达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真希望游船制造商和推销商对明州依然手下留情。

双城也是骑车人和慢跑者的天堂。夏日的傍晚和秋季的周末常会和家人和同学去骑车和走路。绕湖修铺平坦的柏油小道上，骑车人和跑步者互不干挠，友好相往。沿湖有好几段的林荫道常会把我带回上海 51 中学校园附近的那一段法国梧桐遮荫的复兴中路，所不同的是，二十年以后的我比当年的毛头小伙更懂得欣赏自然赋予的美景。

除了法学院苦不堪言的期末考试和毕业前找工作那段忧虑不安和苦苦等待的日子，明州的四年可以说是我来美国三十年中最为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次北美位育校友南湾聚会，我从德霖身上又看到了明州人的那份轻松和自然。当然明州的雪和西城的雨有时也难免令人小起牢骚，可世上哪有好事全让你一人贪！

田长霖教授位育情

□黄承海

7月31日,看到《文汇报》上登载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教授、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的专访,畅谈旧金山湾区对上海的启示,读来深受教育和启发,也尤感亲切,因为他是位育中学的校友,解放前曾在位育中学就读过。田先生九十年代初一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是第一位领导美国一所著名研究性大学的华裔美国人,是享有盛名的机械工程专家。他多年来,为发展中美友好交往,促进两国教育、科技界的友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次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会见,我有幸两次接待过他,虽然已过去了20多年,但今天回忆起来仿佛就在眼前。

第一次接待他,大概是在1975年初,那时我在五十一中学(即今天的位育中学)当教师,一天,校革委会领导找我去谈话,告诉我有一位美籍华人要来学校参观,要我和另一位女教师一起接待。当时我们对田先生的情况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解放前在位育中学就读过。文革时期的五十一中学,破坏严重,学校几乎没有接待过外宾,校革委会领导和我们都有点紧张,初步拟定了一个接待计划。

田先生来的那一天,大概9、10点钟,他与夫人一起

步入学校,我和另一位女老师在校门口迎接他俩,寒暄了几句就陪同他们在校园内走走,同时,将学校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介绍,那时我们还比较拘谨,不随便多说话,因此当时接待的气氛不很热烈,他俩的情绪也显得沉静,几分钟后,走进南楼底楼的几间教室,记得当时的墙上还贴着批《水浒传》的语录,那天,校革委会领导借故把全校教师都送到市二中学去开什么会,学生也因此停课一天,校内一片寂静,学校一点也不像学校。退出南楼后,田先生当即跟我说这个学校不

是他当时就读的学校,我随即告诉他,当初的学校现在是一所小学,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征地新建了这所中学并改名为五十一中学。我告诉田先生原来的学校现在还在,是否请您去看看,他看着手表说:没时间了,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前后不过十几分钟,也没有拍一张照片(当时照相机还没有普遍使用,今天想来真有点遗憾)。我们将田先生夫妇俩送至门口握手道别。

第二次接待田先生,记得是在1979年5、6月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派来的张启昆、陈伟同志分任正、副校长,思想比较解放,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很好,教师的工作热情很高,当时田先生通过市有关部门打电话给校领导,他要重访五十一中学,他有一个要求,希望能见当年曾教过他的老师,我们与有关老同志一起回忆,并排了一份名单,记得有朱家泽、陈冰清、施文希等近十人。那天上午9时许,田先生夫妇带了一子女来到学校,田先生穿着短袖衬衫,个子不高,留短平头发,带一副黑边眼镜。我们在红楼的校长室内安排了老教师们与田先生的见面会,当时

大家讲了一些什么话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有几个情节还有一些印象,一开始,副校长陈伟同志向田先生逐一介绍在场的老教师,时隔30年,田先生都认得,他说陈冰清是他的班主任,施老师教他历史,朱家泽是他的公民课……,为了接待田先生,事先,教导处的陈老师特地把解放前保存下来的学生学籍档案找出来,当我们将田先生的那份材料翻给他看时,他拿到手里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异常激动,那张已泛黄的一寸报名照上是一个剃光头穿背带裤的小男孩,田先生当场哈哈大笑,并递给旁边的夫人和小孩看,陈伟副校长告诉他,登记表反面还有当时的学习成绩记录,田先生装出有点紧张的样子,问在场的老师,我的学习成绩可以看看吗?当各位老师含笑点头时,田先生翻了过来,一看,他马上说:我的成绩不好,还有“红灯”呢,随即他又递给夫人和孩子看,当时的气氛相当轻松欢快,时间很快过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应田先生的要求,安排田先生等去南楼楼听了潘益善老师的一堂物理课,听课时,田先生很认真,课后给予很高的评价。



田长霖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记得他当时说,教学内容相当于美国大学一年级的内容,访问的时间快到了,田先生提议大家合影留念,于是在红楼前大家与田先生全家照了几张,我看得出这次会见给他留下十分深刻而愉快的印象。

以后,田先生对位育中学甚为关心,1984年下半年,在当时的教卫办主任王今秋将迁入新址,新位育中学无论从规模、设备、办学思想都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展,今后几年位育中学将会有更大的变化,希望田先生有机会来沪时再去位育中学看看。

本版编辑 吴梅

边走边画

悦中?旅游乐,乐在图画中。

然而,我所谓的“乐在图画中”,不仅仅仅如此,其中还有“图将好景”,归去长“相忆”之意。雁山的烽火台、老庙、北京的长城、庐山的望江亭、三叠泉,画过瘦西湖长桥、扬州个园……凡是我感兴趣的一景一物,我都用笔去勾勒描摹。

长城(速写)
刘雄鹏 绘文

一篇在98年8月写的《田长霖教授位育情》,当时刊登在8月10日的《徐汇报》上。主要介绍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位育中学两次接待田长霖教授的情景(估计极大多数校友以及位育中学领导都不太了解)。虽然隔了三、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似仍在眼前,难以忘却。田教授是杰出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四十多岁时,即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他多次回国访问,也多次回校看望老师、畅叙旧情。94年6月他当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时,在当时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话:“这对于我来说,中科院院士是最高的荣誉,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是如何为中国尽一点绵薄之力。我是一名工程师,今天我又是中科院院士,我要在工、科两院,中、美之间起好桥梁作用……”他还担任过台湾中研院院士,积极地斡旋于海峡两岸,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田教授02年10月因患脑肿瘤而不幸病故,享年67岁,英年早逝,世人尤其位育校友无不为之痛惜。我找出这篇十五年前写的文章提供给你们,以表达对这位杰出位育校友的崇敬之情和深切怀念!

另一篇写于四年前,当时在一次偶然机会遇见蒋衍老师,谈及位育七十周年校庆时,我向他建议,可否发动员一部分尚健在的老教师,写一些回忆位育中学往事,以告后人发扬位育优良传统,我表示会抽时间先写出来,他深表赞成。两个月后,我写好这篇文章交给他(还选了一些我拍的位育中学的旧照片)。不久,他告诉我已收集到二十多篇,内容甚为广泛且生动活泼,争取在第二年成册付印。后来因某种原因被担搁而不了了之。蒋衍病危住院期间,我多次去探望,谈及此事时,他非常懊丧地对我说,“这件事未办成,是我这一生的一件最遗憾的事,许多老教师的精力白花了,内心不安啊!”现在,蒋衍老师不幸也离我们而去了,校庆七十周年也度过了,我找出存在电脑中的这篇文章,也有二个意思:一是让校友们了解一些位育中学过去的人和事,从中可见我对位育的感情,二是对蒋衍老师的思念之情。同时,这篇文章也可能会激发起有些校友对位育中学的一点记忆。

多次来美探美,与许多校友欢聚,十分高兴。你们许多校友热心参加校友会活动,会刊也办得很好,真不容易!发这两篇表示我对你们的支持和对各位校友的敬意!听黄镛说,会刊将在一月底定稿,就急匆匆发给你。虽然我也仔细校阅一遍,文字上可能还有疏漏,请有关校友费心修正。

春节将到,祝你家并各位校友马年吉祥如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黄承海老师 2014, 1, 20

去年到湾区探亲途中约旧金山剧院的老朋友卡琳导演见面畅谈时，她颇有兴趣地问我是否后悔在洛杉矶安家，我一听就笑了。早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应邀来美为旧金山剧院搞设计时，旧金山人对自己城市的热爱和自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记得我和卡琳导演及布景设计罗夫与观众座谈时，台下的观众向我呼喊：“多看看旧金山吧，这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更有人主动来与剧院接洽，要为我做游览向导。同时，旧金山人从不掩饰他们对洛杉矶的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洛杉矶太平坦、太难看。当时听着来自南加州的我的教授与他们就此争论时，我只是毫无立场地觉得有趣。但是，当我自己在大洛杉矶地区安家扎营，熟悉到它成为第二故乡后，才体会到洛杉矶以至南加州人的委屈。这里虽没有北加州如此高耸茂密的秀美林木，却有连延不断的傲人的海滨沙滩带来的迷人的浩瀚景致。再说南加州本身是丘陵地带，到处是山头斜坡，并不平坦。我本人就在山头上住了十年后刚搬回海边，正在为享受各种平地带来的方便和乐趣而沾沾自喜呢。难怪这位旧金山的老友会把我一下逗乐了。

住在即使不是太高的山上，也会感受到其优点。除了高度带来的景色、气温和空气质量的优势外，地势的拔高往往给人一种居高临下，超脱尘世的自我感觉，这当然有点夸张。但高度也同时带来许多不便。首先网络电讯信号都不佳，局限很大，使我在十年中不停地花很多功夫去解决此难题。再则，外出散步稍走远一些就要爬坡。虽说也是一种锻炼，但毕竟对年迈的膝关节和体力是一种不安全因素。特别是老公越来越偏好不开车而去搭公车，每当他执意地在烈日下爬坡上下时，我就多下一次决心要搬回平地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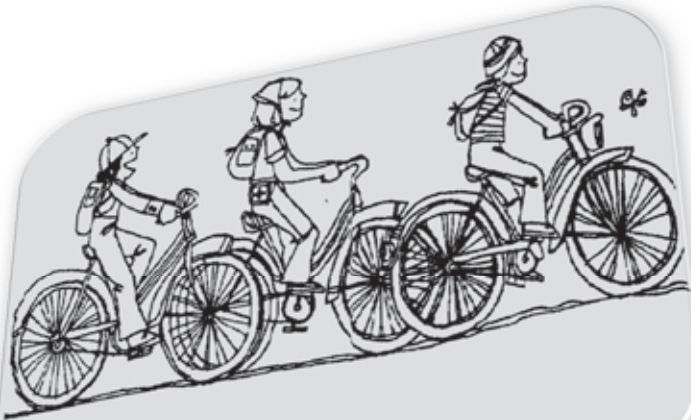
当杀回平原的计划在Seal Beach退休社区开始实施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回平地的好处。最初几次看房过程中我就开始喜欢上了那在占地1平方英里的绿草坪上四通八达的小路，不宽不窄、平顺蜿蜒，每个交叉拐弯处都周到地加了弧形转角，特别适合骑自行车。骑车锻炼在山上、多坡地带或交通繁忙地带是一种奢望，年龄和体力已不允许自己去尝试单车爬山或与汽车抢道。但对我们这类出身于自行车王国曾驱车千里不在话下的中国人来说，在封闭的健身房去踩那假假的自行车健身器又实在觉得可笑，所以拿到学位出了校门后，我已有二十多年没碰自行车了。没想到这次搬家竟重新燃起了骑车的兴致。特别看到从社区到海边栈桥的不到两英里的马路旁都有标准规格的自行车通

道，我进而萌发了美滋滋的周末骑车去海边小镇进早餐的愿望……

在搬迁安顿的大工程终于告一段落后，我立即着手实施这盼望已久的自行车项目。经过一番对各类车型、品牌及专家和用户评论的仔细调查，我把目标定在28英寸的介于运动和休闲之间的混合型单车。车行的售货员将我们要的车装配调整后，向我们仔细交待了自行车的交通法规，又让我们戴上头盔。于是我们将新车推向试车场地，信心满满地准备展示久违的熟练车技。意想不到的，我和老公同时在新车上歪歪扭扭，东摆西晃，怎么也扶不正车把，稳不住方向。我们跳下车，面面相觑，尴尬地问售货员这种车型是不是特别不稳。他摇头道这些车都一样。我们又试了另一种车型，结果差不多。“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我问，他笑着点点头。在不情不愿地承认自己必须重新开始学骑车的失落中，我们惴惴不安地将两辆新车运回家，开始了每天的骑车练习。

找回以往的娴熟车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必然。

我在宽阔的社区汽车道上摇摇晃晃地骑，吓得后面的汽车都不敢超车。到人行道和钟爱的草坪小道上骑，道路变窄却使神经更紧张，车把更不稳。好容易找到一些感觉，能放松一些骑上一段，第二天却又开始晃上了。骑车变得很遭罪。我并不相信自己从此骑不了车了，但在坚持练习之余，也开始了重新思索考量。这次意外的练车经历使我意识到自己关节的灵活度和掌控平衡



乐在骑中

周家钧 65届

的能力远不如从前的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功能的减退将是必然的。看着社区中老人们最普遍的是骑三轮自行车，我开始疑惑我们这28英寸的车型将能持续几年，是否很安全。再则，我们很想携车旅行，开车到其他旅游点时就也能有机会骑车。但要卸下这新车的前轮并不像描述中那么简单，再把两辆大车放进我的越野休闲车也不容易，又实在不愿在车上加自行车架。于是我开始新一轮的搜索调查，进而向老公提出了转买20英寸折叠自行车的新方案。大约三周后，我们已经骑着一红一绿的小车在社区小道上奔驰了。再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每天练习，在确定自己具有足够稳定的控车能力后，我们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带着头盔上了大马路，骑了半个多小时，如愿以偿地用自行车代步到海边小镇享用了美味的早餐。

当自行车重新成为生活的一个相当主要的内容后，我们才发现在美国这个汽车王国中，骑自行车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是很优越的。各种价位的车的质量普遍都很可靠，有些车铺甚至还提供随时退货的服务。自行车的维修和保养又便宜又周到。条件允许的城市，特别是旅游城镇，都铺设了自行车道，甚至为骑者设计了多条骑车路线，并在网上详细注明其距离、海拔、路况及坡度。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自行车与汽车具有同等分享道路的权利。公共汽车、地铁和轻轨车一般都允许和协助乘客携带自行车。多种杂志和协会一直在评选全国对自行车最友好的城市和地区。当选城市也视此为环保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成就。当然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骑车还是很危险，更不适合我们这样的年龄层。对于周围绝大多数骑者来说，自行车也还主要是健身休闲的器具。然而，这个健身休闲的自行车骑手的人数不可小觑。每次周末我们沿着各条海边路线骑行，一个又一个配备全套运动服饰装置的自行车队接连不断地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周末的公园、海滩、餐厅或小店，也到处可见骑车族的人潮身影。随着与当地的骑车文化的日渐接近，我们不断地发现环境和路况均佳的新鲜骑车线路。我们曾携车开往圣地亚哥，享受Mission Bay海滩上12英里的自行车道，不亦乐乎。可回来后，我们在邻居Sunset Beach接Huntington Beach的海滩上发现了一条8.5英里同样精彩、路况更佳的车道，还不像圣地亚哥海滩那么拥挤。不久，

我们又在离家不到1英里处发现了一条沿着圣盖博河的长达28英里的非常专业的自行车道。它从我们的Seal Beach海边起源，笔直北插市区，连接洛城的好几条自行车主线路。这条车道平整而科学，各进出口的坡度都很舒服，每个桥墩下有一个貌似很陡的凹档，却有用正常车速便可顺利上下滑过的精准度。我们虽没有雄心骑完全程，这条车道却为我们骑往海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和乐趣。

现在，我们又可以很溜很帅地驾驭自行车了。我们这一红一绿的小车队在社区里很出名显眼。无论在社区或海边，我们也经常会被各类男女拦下询问到哪里去购买我们这样的小车。尤其是我这辆标准女子型的带弧度的车身，在美国不常见，所以特受青睐。我已经反复当了这款车的免费推销员。至少在我们社区已有两辆与我一模一样的绿色小车了。骑车也成为我们活动筋骨，呼吸新鲜空气和适当日晒的日常活动。无论是悠闲穿梭在绿茵草坪间或丛林秀木边，还是迎风乘骑在奔腾海浪旁，我都感到心旷神怡。我不禁回想到刚开始在美国开车时，在雨天望着车窗外的磅礴大雨，心中为再也不用穿着雨披、浑身湿漉漉地骑车而庆幸。如今我又在为重返自行车坐骑而陶醉。这应该不是无谓的喜新厌旧或喜旧厌新的循环，而算是一种升华吧。若真是，愿以此与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窗同胞们分享。



羽毛画

周国辉 59届

在布拉格的“计划外”旅程

王家斌 65届



克》里的人物命名的，如卢卡斯中尉炖土豆。卢卡斯中尉是帅克当勤务兵时服侍的奥匈帝国军队的军官。我们喝了汤，又吃了烤猪肉和土豆，觉得很可口。服务员是个大学生，喜欢跟我们交谈。我说起在中国接触过捷克生产的太脱拉柴油机和斯柯达公共汽车，他很自豪地说，斯柯达轿车是欧洲生产的最好的轿车了。往后几天我们在布拉格街头真的看到过很漂亮的斯柯达轿车。可能还有人记得，60年代上海的49路公共汽车用的就是柴油机驱动的斯柯达车，造型跟上海客车厂造的不一样，座位很舒服。

这时人暖和过来了，力气也恢复了。其实出餐厅步行三百米就是穿城而过的伏尔塔瓦河。夜色下

多年前读到，三国魏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一日忽兴起外出访友，到了朋友家门口却不入，说是已尽了兴了。外出旅行时，偶尔脱开原来的计划，随兴而行，或者有时迷了路，说不定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古人说的“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道出了其中的一点味道。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验。

十一月中的布拉格，天暗得早。我和宓哲新找到老城的市政厅广场，已近下午5点，赶上了市政厅钟楼上的天文钟



报时。这座天文钟安装于1410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三古老的天文钟。我们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只见到处是游客。信步走出广场，在附近的小街小巷里转，觉得周围有点冷清，也有点找不到方向了。原来我们已经走出游客常去的区域了。忽然看见路边有一家餐馆，招牌是捷克文 Švejk Restaurant U Karla。我不认识捷克文，但在招牌上那个一脸憨笑、穿着奥匈帝国士兵制服的头像我一眼就认出了，正是好兵帅克！

电影《好兵帅克》里的帅克

捷克作家哈谢克的长篇小说《好兵帅克》被改编成电影，1957年在国内上映，我看了至今还记得。《维基百科》的这一词条是这样介绍的：

“主人翁帅克(Švejk)是一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捷克籍普通士兵，他出身市民，看似愚蠢而实际上极富机智并带有痞气。本书笔法幽默，对白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帅克乐观、幽默的态度也使他成为捷克民族的象征。”

此时天已全黑下来了，起了点秋风，也感到饿了。偏偏那店里透出的黄色灯光又显得暖暖的，像是在招呼过往的客人。我们决定就在这家餐馆吃晚饭了。餐厅内部的装饰很朴实，但让人觉得自在。他们的菜单上有几道菜是以《好兵帅



布拉格Švejk Restaurant U Karla餐馆（屋子建于1896-1897）

的河边很美，可以看到灯光照亮的查理大桥和远处山上的布拉格城堡。不知从哪儿隐隐传来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停留的几天里，好多次听到过这段乐曲，但从来没有那晚在河边听到的那样让我感动。如果那个晚上没有走错路，说不定就没有机会看到这儿的夜景了。（题头图：夜色下的伏尔塔瓦河，可以看到查理大桥和布拉格城堡）



布拉格街头的斯柯达轿车

巴黎街头火警

在巴黎郊外的蒙马特地区，有一座著名的“圣心大教堂”，为了赶在中午坐欧洲快铁离开巴黎前去那儿观赏，我们一早就坐地铁赶去那里，八点不到，我们就赶到那里，圣心大教堂，是坐落在蒙马特的山顶，是观赏巴黎的绝佳处，在晨曦的笼罩下，可以看到远处埃菲尔铁塔的倩影，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以及雾气中的巴黎建筑。圣心大教堂是用一种叫“伦敦堡”的特殊白石建成的，据说这种白石，可以在接触水或雨水时，分泌出一种俗称玻璃屑的白色物质，能使建筑在积年累月的风雨冲刷中越变越白。这就是圣心教堂如此雪白晶莹的原因。我们欣赏着那混杂着拜占庭建筑风格和罗马建筑的表现手法的教堂，又观赏了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大堂。在教堂外的台阶上，我们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刚才穿过的蜿蜒小径的一角，冒出浓浓的黑烟。鞭长莫及，我们继续着我们的游程。下山了，我们回到来路，只见六七辆消防车停在那边，周围是看热闹的人群，和忙着留影的法国警察，与跑东跑西的消防员，有的爬上了云梯，又爬下来，有的找水，一瞬间又一股黑黑的浓烟从窗口喷出，随后是火苗，又涌出一大团的火焰……。我们也只能看看，照相，随后就赶紧离开，地铁站也给封锁了，连续走了二个站，才坐上地铁去酒店。

旅途遇到着火，这是唯一的一次，很值得留恋。

优待残疾人

到了法国，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闻名天下的埃菲尔铁塔，穿过售卖工艺品的黑人流浪人群后，来到了雄伟壮丽的铁塔下，长长的人流有条不紊地在排队购票，突然一个高大的法国警察叫住了我，用他带法国腔的英语和我说着什么，我一头雾水，在英国读过书的女儿回头和他交谈，之后告诉我：因为我拄着拐杖，他把我看作残疾人对待，陪我女儿去买残疾人的优待票，并从另外一扇门送我们去乘电梯，在电梯口，我看到告示：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小心扒手。是用英文，

法文，日文，中文四种文字书写。铁塔的电梯可以乘四五十人，共有三个观景台，5楼是餐厅，酒吧，6楼是第一观景台，10楼是第二观景台，一般都是在6楼观景，我们出了电梯，在落日的余霞下，塞纳河隐隐可见，远处的荣军院，罗浮宫都清晰可见。塔上风很大，对来自赤道的我们，零度气温是很难想象的。

光天化日下的抢劫

“Catch him”一声吼叫，打破了宁静的夜空，顺着声音看去，从刚打开的电梯门，冲出一个20多岁的年青人，三下，二下就转得不見掉了，叫着，嚷着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亚裔人，紧跟着的是他肥胖的太太。只见他俩奔上跑下，一无所获。看着他们茫然的样子，我想：这和光天化日下的抢劫没有两样，利用游客在美景面前的放松警觉下手，真是污了埃

菲尔铁塔的美名。埃菲尔铁塔的第一观景台，方圆才不到百米，来回走动的人数才2,3百人。是铁架，没有可藏身的地方，上下就只有一部电梯，都可以抢劫，还不見人影，难道真有隐身术，隐身人？

说到偷盗，不得不提到意大利。那天在罗马，我们坐地铁去圣彼得大教堂，地铁来了，我拄着拐杖走进车厢，突然感觉有只手在我口袋里，我一惊，抛掉拐杖，一把从口袋里抓到

那只小手，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吉卜赛女人抱着一个小孩，若无其事地把手抽回去，我诧异地看着她，1.40m左右的高度，很熟练地把小孩从左手转到右手，转身离开。周围是同情的眼光，一个意大利军人站起来，让我坐下，久久我都不能平静。

我们住在罗马火车站旁，网上查知有个中餐厅不远，就去吃了。回来时，太太和女儿走在前面，我随后。只见她俩过马路时，左右窜出4个10多岁的男孩子，紧跟着他们，我马上叫了一声，女儿回头看到，就停步不走了，那4个男孩悻悻然从他们身边走过，消失在人群中。



巴黎街头火警一角



西贡行

石洪基 66届

在这个时候去越南，去西贡，很是新鲜好奇。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旅行，飞机在西贡的新山一机场落地，我随着人流向入境处走去。我是去办一个展览会，在巴黎办的签证，多次出入。新山一机场在六十年代出过名：越共奇袭新山一机场，对我来说，名字不陌生。机场比起一流的大机场是要小多了，好像几十年来改变不大。

一拨飞机的人下来，在各个入境口就排起了队。我的队伍前面的检查站坐着二个人，一个资格老些，肩上有三颗星；另一个显然要年轻些，在一旁看着。整个边检只有这个口是二个人。轮到我了！我把护照递给主办的年龄大些的那个人。他翻看了一会，又对照屏幕核对了一会儿，慢慢地问道：

“你是中国人？”

“是的。”

“来这里干吗？”

“我来办一个展览会。”

“唔，你说法语，还是英语？”

“都说点儿。”

“你住在哪里？”

“住法国。”

“你是中国籍？”

“唔。”

“你是多次出入，那下次来的话你认识我？”

我有点纳闷：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认识你？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认识我吗？”

我有点明白了：“可能吧。”

“你知道纪念品吧，给我带些纪念品。你有纪念品吗？”，说着把我的护照搁在一边，等我的反应。我说：“我没有纪念品，如果下次入境时有的话，我可以送你。但你得把护照还给我，这不是纪念品。”他看着我，把护照还给了我。我边走边思忖：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要“纪

念品”，身后坐着徒弟，小小的大厅里其他人也听得见？

取了我的二件行李，推向出口。海关的四、五个人，见人就拦，一律过爱克斯光检查。他们要求我打开行李，里面是一台只有屏幕能工作，但没有“内脏”的仪器和相关的印刷资料。

“这是来办一个展览，这是样机，没有商业价值”，我说。

“不行，先生，你不能这样出关。按照越南的法律，你必须经过海关申报”。

我明白这是敲榨：这样的展品，这样的展览会，我办过多次，在其它国家从不需要申报！这时是晚上十点，我急着去旅馆，心里有点烦。

“先生，你上这儿来”，他招呼我。“按照越南的法律，这是要经过海关的，这需要时间和钱，会耽误你的展览；另一个办法是我们替你办，你现在就可以过去”。

我想这还不明白吗？我掏出五十欧元交给他。他说这少了。此时另一女的过来，说了几句，他就让我走了。我关上箱子，为我的出租车着急：我一共才九十欧元现金，去掉五十欧元，如再碰上一个宰人的司机，我很可能到不了旅馆。机场里看不到兑换外币的窗口，也没有ATM。很可能是情急之下我没有看到。晚上十点，旅客就这些，空间就这么大，出路就一个方向，上哪里找去！我正思忖，并自言自语，海关的人又叫我过去：

“这是二十万盾，相当十美元，坐出租进城够了”。

一下里，我有点“感激”，他们尽管敲榨，还有点人情味，不让你陷于绝境。这是“亚洲特色”。

一下飞机，就遇到这些事，这究竟是怎么一个国家，当前的越南社会又是怎么一个状态？想起以前曾经听一个法国的销售经理对我说过：“最腐败的是越南，什么都有价目：你要见处长，是这个价位；要见局长，是这个价位；要见部长，是这个价位……”果然如此？

一出机场，就已是市区。新山一机场就在市区紧边上，好像以前上海的龙华机场与市区的关系，离开机场就能看到街道。西贡纬度很低，没有四季，只有雨季和旱



越南国际分析仪展览会简朴的开幕式

« 祖国统一纪念馆 »



季。所谓旱季，只是雨水少些，树木长年葱绿。街上行人朴素，衣着随便，见不到西装革履的白领，也没有服饰清凉的小姐。像是倒退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尽管是夜里，还有许多人，很热闹。

我的展览会当地的代理商协助，办得很好。这些年轻人，大都不到三十岁，干劲足，只是需要培训，以便熟悉我们的产品。他们的销售经理也才三十左右，叫Phuong，女性。她介绍公司情况，希望外国人了解他们的国家。三十岁的人，是七五年越南统一后生长的一代，对战争没有什么概念，估计只有官方灌输的思想。他们很感兴趣我在西方待了这么久却还是中国国籍。Phuong的家乡在越南中部，相对落后，所以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西贡并住了下来。她很直率，说她的梦想是去美国。我们去饭馆吃饭，Phuong说是人们常去的地方。到了一看，有点像快餐店，简单的桌子，凳子，小小的店面，吃的是典型的越南餐：生，辛香，微辣。店里很少装饰，服务员都是年轻人，但他们都会说点英语。接待外国人多了，也配备了境外银行卡支付的机器，很方便。Phuong很热情，直爽，把我面前的杯子拿过去，先喝一口，然后替你放各种调料，放到她嘴里尝一下，感到不够味，再加几片不知名的叶子，再放嘴里品味，砸砸嘴认为可以了，把杯子推回我面前：“可以了，你尝尝，很好喝的”。接着又替你搅拌汤面，还是那样，要她尝过认可后才是真正的越南味。他们在主食碗边上放上几个小碟，里面是各种不知名的香菜和调料。对吃惯江南苏浙沪火侯设中，略带甜味菜肴的人来说，我未能习惯。

年轻的一代，到处都一样，Phuong的举止，到处都能遇到。无论是越南，或是中国，或是欧洲，都有这些直率的年轻人，他们讲述自己的思想，目标，希望能被别人理解。不喜欢绕圈子，讲客套。虽说是生意场上不能谦让，但这一代的年轻人更直接了当。Phuong是销售经理，说英语，交流多些。她关心的是对我们的产品能拿到更多的折扣，对质量没有意见。她希望他们的公司业务能扩展到东南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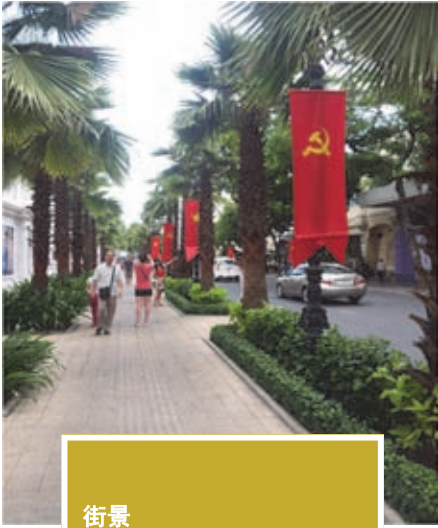
扩展到东南亚，这其实是公司老板的期望。老板大概三十多岁，看起来不像一般个子矮小，肤色深的越南人。他年轻，文雅，衣着整洁，戴着眼镜。他诉说创办公司的不易：“头痛，特别是在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市场里，公司的业绩会收缩”。他想扩展柬埔寨市场，直言柬埔寨人懒惰，没有越南人精明。不过，他没有途径，还没有拿到订单。他不顾忌贬低不发达国家的人的素养，或是他根本不在乎？他是商人，只求实际。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对赚钱的欲望表达得更明确，赤裸。他很忙，东奔西走，我只见了两回，短暂的礼节性的碰面。

我们在西贡的一家普通的阿拉伯人开的小餐馆边吃边谈。这是阿拉伯和越南加西方餐馆的混合物，阿拉伯的装饰，西方的制式，越南的口味：头盘，主食，甜品。当地的菜单，饮料必加冰块，可口可乐很普遍。简单的快餐式一顿，大约十万盾（五美元），阿拉伯餐馆的有点像欧洲普通小餐馆的一顿，则要六七十万盾，一点都不便宜，但是人少，比较安静，外国顾客居多，间或也有越南人。这里还有台湾的，韩国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餐馆。越南不像中国，再多的外国餐馆，外国文化进来，还是会被中华文化淹没；越南的这些外国影响，挤兑着本国特色。西方的影响，或者说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马来亚的影响随处可见。越南正在向他们靠拢。也可能这是因为在西贡，在河内可能会正统些。

西贡是越南的经济龙头，共产党政权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这从城市的交通上可见一斑：满街跑着轻型摩托，成群结队，如同我们以前在上海见到的庞大的自行车群。它们与为数相对较少的汽车和自行车争道，车上坐着二人，三人或四人，带头盔或不带，无人监管。他们成群结队，横冲直撞，又都在最后一刻互相避让，如同两股不同的水流交叉会聚成为一团，然后又分离得清清楚楚，各向而行。西方行人过马路的方式在这里行不通，必须与无数的摩托，汽车“互动”才能过去。很多街口没有信号灯，车流不断，但人却能照样穿行。没有见到事故，也见不到交警。后来才注意到他们大都在不显眼的街角闲着，躲避着直射的太阳，根本不管交通。整个城市就在这摩托的噪声中自己运转着，不用管！



« 战争纪念馆 »中与中国有关的三张照片



街景

海

但是，党的影子还是能感觉到。如同中国大陆一样，随处可见的标语，旗帜点缀着城市，小到陋巷，大到通衢，好像要与巨大夺目，光彩耀眼的各国广告争锋。在宽阔的西贡河的对岸，有点像开发前的浦东，很少建筑，平坦开阔，只见一排高大的宣传画正对着这边的建筑，又好像是上的浦西。我不懂越南文，只看到画着胡志明和儿童的画面。我也注意到街道上装饰着红旗和标语以及久违的镰刀锤子的党旗。共产党是靠宣传起家的，在战争年代，这些宣传得民心，老百姓响应；现在，这一神奇效果在中国已消失，要改弦更张了。越南和中国，在这里很相像。

西贡的开放还可以从街上日益增长的外国的商铺中看到。尤其是韩国人！韩国人的大企业有自己的班车和学校。随着韩国人增多，这里在新兴区域还可以看到韩国的银行，以及许多韩国的小吃店，个体户，小店面，很受欢迎。这里还是越南年轻人心中的时尚去处。眼明手快的年轻人只要敢干，是可以得先于众人的。

我住的旅馆在西贡市中心，据说越共围城时，是外国记者集中居住的地方。旅馆和周围多法式建筑，高大宽敞。这里是西贡的中心，也是西贡的对外窗口，脸面。法式建筑中夹杂着一些待拆的破旧的楼房。代之而起的是新建的大楼，是旅馆和写字楼。但是，好像缺乏规划，有一种仓促感。四月底，中午气温已在三十度以上。早晚要好些，还时常有点风，那是海上吹来的风，一扫白天的热气，感觉凉爽。使我想起少年时上海的夏季。我的活动范围不大，没有城市的总体概念，没有见到快速车道和立交桥。城市还是在平面上展开。我中午和晚上会出去吃饭，用不着走很远，到处都有餐馆。路上常常会有人来招呼：“要不要按摩”？“要不要nice girl”？也常常碰到骑摩托的人主动兜生意，示意上他的车。旅馆的总机也会打电话来问是否需要什么服务。西贡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胡志明市。随着政权的更替，街名也有些改变的：《黎笋街》，《阮文追街》等。也有保留的街名，如法国《巴斯德街》。这可能是唯一的以法国人命名的街了。市中心车水马龙，各种广告都有，还见到了海尔的大幅广告。不过，据说他们很抵制中国货。有很多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东西。仔细观察，那些兴旺的小商品集市中的大多数却很可能是中国货。要卖中国货，常常得去除标记。不知道海尔

的生意做得任何？在中越不和这点上，我的越南同行们当然不会对我有任何表示，但当我首次入境时，那个边境警官对我的态度却很有代表性。他很聪明地既要钱财，又可以刁难一下我这个中国人，所以根本不用管身后的“徒弟”和别人是否听得见。

有一张照片，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记忆中：西贡被攻陷的那天，一辆坦克冲入阮文绍的“总统府”。为此，我专门去参观了这一建筑。它现在是《越南祖国统一纪念馆》。一个大院子，一栋T字形的三层楼房，前面很宽大，开阔，里面是大大小小的会议厅，地下是指挥所，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有几个电话，很简洁。显然重新布置过。一九七五年的四月底，随着美军再也不愿意支撑这个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攻击下奄奄一息的政权，北方的军队如潮水般地涌入，南越政权跟纸搭的城堡一般地垮台了。三十八年过去了，如今站在这个院子里，周围是川流不息的参观的人群，其中有很多学生。大部分的参观者还不到三十八岁。他们能感受到当年为各自的不同价值观而战的惨烈吗？他们能区别这些不同观念在今天的意义吗？西贡今天还有着以“阮文追”名字命名的大街。他是因被控谋杀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而被杀的。他为之捐躯的理想是今天这样的吗？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还能记得他吗？



市中心

多少年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就只是一条普通的街名了。其人其事，会是很遥远淡薄的回忆了。当然，没有什么永恒的。

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都在进行各自的改革开放政策，尽管各有特色，却在许多地方有相同之处，在越南见到的与中国相同之处是什么呢？是街上五光十色的广告，是花花绿绿的舶来品，是地下色情服务，是日益漫延的污染；还是GDP的增长，是可以公开地向往移民美国，是生活更为自由，是百姓有更多的民主，是人人可以参政议政……所有的这些相同之处，就是社会的不同阶层的需要，就是藏在背后的“普世价值”。执政者有执政者的“普世价值”，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普世价值。什么时候这二者合二为一了，这个世界就完美了。

我已回家，但西贡留给我的记忆却依然清晰：那好似几十年前上海夏天的炎热的太阳和傍晚的凉风，那个不用爬上爬下，还能见到开阔天空的呈平面型的城市，那些衣着简朴的骑着小型摩托匆匆上下班的人群……西贡落后于上海，香港，新加坡等一线大都会，但我感到她正在大步地赶上来。

海外游子吟（歌词五首）

柯晓明 67届

1. 寻梦在他乡

我扬起远航的风帆，
驶向遥远的彼岸。
任凭狂风和巨浪，
寻找那心中的殿堂。

我肩负亲人的期望，
难忘殷切的目光。
何惧黑夜和孤独，
笑迎那黎明的曙光。

燃烧的青春，伴我天下闯荡。
I have a dream, 寻梦在他乡。

我迈开坚实的步伐，
攀登奇异的险峰。
不怕山高又路长，
领略那无限的风光。

我放流春天的思潮，
汇入浩荡的百川。
纵然曲曲连弯弯，
奔向那辽阔的海洋。

风云的人生，看我豪情万丈。
I have a dream, 寻梦在他乡。

2. 奋斗在他乡

月色银霜，孤灯寒窗。
莘莘学子，追梦他乡。
探索科学的真谛，
寻觅智慧的宝藏。

啊，海外学子！
望断星空，夜还未央；
高处不胜寒，正道沧桑。

问候你，海外学子，
我为你挂肚牵肠！
海阔天空，雄鹰飞翔。
山穷水尽，柳暗花香。
汗水浇灌的硕果，
师长同行的赞扬。

啊，海外学子！
冲破晨雾，笑迎曙光；
迈步从头越，道路漫长。
祝福你，海外学子，
我祝你再创辉煌！

3. 秋思在它乡

你象缕缕秋风，
轻轻吹进老宅的门窗。
带着我深情的思念，
问候白发慈祥的爹娘。

你象朵朵秋云，
悠悠飘过母校的课堂。
伴随那朗朗的书声，
把辛勤耕耘的老师探望。

秋天的思念，故乡的情怀，
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你象片片秋叶，
层层映红故乡的山岗。
留下你多情的色彩，
描绘富饶美丽的家乡。

你象弯弯秋月，
漾漾撒落村边的池塘。
停住你温柔的目光，
轻吻我俩初恋的地方。

秋天的思念，故乡的情怀，
我一定要回到你的身旁！

4. 我象微风和浪花 (故乡，我心爱的人！)

扑面的阵阵微风，
扬起你那黑亮的秀发，
抚摸你那绽放的双颊。
那随风飘来的白云，
就象是纯洁的白色海棠。
我多想就是温柔的微风，
偎依在你的身旁。

啊，心爱的人，
微风阵阵，送我回到你的身旁！

跳跃的朵朵浪花，
伴随你那热情的胸膛，
追逐你那欢快的时光。
那浪击银铃的歌声，
就象是清澈的泉水叮当。
我多想就是不息的浪花，
和你在一起歌唱。

啊，心爱的人，
浪花朵朵，伴我为你幸福歌唱！

5. 放飞新的梦想

昨夜细雨无声，
清晨鸟啼梦晓。
春水东流，雪溶北疆。
绿色的田野上，
新的生命，低吟浅唱。

昨夜繁星当空，
清晨霞光万丈。
夏耘骄阳，稻花飘香。
火红的田野上，
新的乐章，谱写正忙。

在希望的新天地，
我们谱写新的乐章！

昨夜镰月弯弯，
清晨天高云淡。
秋菊傲霜，麦浪翻滚。
金色的田野上，
新的歌声，丰收满仓。

昨夜絮雪漫扬，
清晨晶莹风光。
冬梅报春，素裹银装。
洁白的田野上，
新的梦想，放飞远方。

在希望的新天地，
我们放飞新的梦想！

从六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郊区的丰收拖拉机厂工作。按现在的眼光，那时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住陋室，穿布衣，吃的喝的都是粗茶淡饭。但还是能讲几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丰收拖拉机厂坐落在上海郊区颛桥，离镇上有十几分钟路程。住厂里的集体宿舍，食堂供应一日三餐，基本上够了。偶尔上街夜宵，也只吃一角几分的阳春面。镇上大街往尽头走，有一家饭馆。同事间都知道它的剥皮大烤和肉丝菜汤面特别好。一碗肉丝菜汤面三角七分，却不舍得吃。有一次经不住同事的邀约，去尝了一次。面条是大锅煮的，没有什么特别；但肉丝和青菜是小锅炒的，汤是用骨头熬的，味道确实比阳春面好。

1966年我到农村当拖拉机手耕地，体验了三个农忙季节的生活。三夏和三秋去松江县的华阳桥公社和佘山公社，双抢去上海县的颛桥公社。

上海郊区的农业机械化在当时已经比较发达了（松江农机站还挂了一块“全国农业机械化试验站”的牌子）。农忙要抢季节、农时，往往是刚收下成熟的庄稼，就要用到拖拉机翻地、整地，再种下下一季的庄稼。双抢时更要讲究“早上一片黄，晚上一片绿”，也就是早上收割了稻，晚上已经插好秧了。我们拖拉机手只要接到消息哪里有地要耕，就要马上赶过去，常常还要连夜赶工。那年三夏是我第一次学耕地，跟师傅学了一段时间，铧犁、旋耕犁和水田耙都会用，可以独立操作了，有时就一个人上夜班。夜深了，周围一片漆黑，只有拖拉机上的前后大灯和仪表板上的两盏小灯伴着我，虽然发动机的声音很响，还是觉得有点冷清。开到地头，骤然看见田埂上有人站着跟我打招呼，原来是生产队里人叫我去吃夜点心。拖拉机一熄火，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可以听见虫鸣蛙叫了。这时又饿又累，跟着来的社员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回村里。机耕队到了生产队里，常常落脚在队长家里，帮着做饭、招呼的往往就是队长的妻子，松江人叫“队长娘子”。农忙时节，队里大家都忙，不会特地到街上买菜，所以总是白米干饭，炒个蔬菜或是酱菜，蒸点咸鱼。好在松江出米，队里会分给社员一点好米，加上肚子饿，所以觉得还是很可口。有时候准备饭的人见我还有个半大的小伙子（那年我还没满二十岁），照顾我，另外给我蒸点山芋，算是开小灶了。我受了厚待，心下感动，就觉得那山芋格外的香甜。

还是在松江的事。那年的三秋接近尾声，已经找不到什么地块了，师傅带我到另一个机耕队的临时住所去串

门。我们有口福，那天正赶上他们烧红烧肉。附近的生产队杀猪，所以肉是极新鲜的。每人出五毛钱，肉按人头分成若干份，用稻草扎了，加酱油下锅煮，松江人叫“扎肉”。没煮多久，就肉香四溢，可以吃了。火候正好，肉酥了，却也不烂，很有咬嚼。这是我生平吃到的最香的红烧肉了。

1974年深秋我们车间一批人去长春、沈阳、天津、南京几个城市参观拖拉机、汽车行业的几个工厂，回上海途中陪一位同事去河北沧州他老家探望他的父母。那是道地的华北农村，我第一次睡了真正的炕。第二天同事的母亲特地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老太太派她老伴到街上割肉，还一再吩咐：“肉要割肥的。”同事有好几个哥哥，有当老师的，有在县里工作的，还有在北京大机关里工作的，这天都聚齐了。那天还请

我到当老师的哥哥的学校里喝酒。大家坐在学生用的小椅子上，围了一圈，轮着用一只化学实验室里的烧杯喝酒。在南方只有黄酒是烫了喝的，白酒、桂花酒这样的酒只喝冷的。但这天喝的是很烈的烧酒，又用酒精灯加热过，喝下去马上觉得一股热气往下流，又往上直涌，顷刻间好像身上充满了幽燕大地上热血男子的那种慷慨悲歌的豪侠之气。

七十年代中，我厂的排球队参加公司组织的排球联赛，我算是教练，另一位同事当队长，

有十几个队员。位育中学的两位校友顾小峰和康国伟也是队员。打球本身就是一件乐事，而且逢到比赛可以趁机回市区家里，车费还可以报销。在厂里训练，也都是用的上班时间。逢到外出比赛，厂体协发给每人一张一角七分的夜班券（原来是二角五分，后来国务院下文件，各行各业节约开支30%，所以夜班券也相应减了下来），队长把这些夜班券都攒了下来。联赛结束，我们厂得了个亚军，大家自都欢喜不尽，当然要庆祝一下。于是约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郊区的厂里回到市区后，到陕西南路上的粤海饭店（原为美心酒家，文革中改此名。现在那一片房子都已拆了，盖起了大楼，美心酒家迁到了徐家汇）聚餐，就用那攒下来的夜班券的钱，可能各人还再付了一点。排球队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厂里又是活跃分子，本来就不安分，现在聚在一起，更是热闹。吃了点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兴致都很高，喝得很爽。现在我有时候听见年轻人在公共场所大声谈笑，会皱眉头。那天在粤海饭店一定也会有许多人皱眉头。我喝了十三杯啤酒，而且没



粗茶淡饭忆往事

王家斌 65届

有醉。那是是我记忆中喝得最痛快的一次。

有一次，我却因为喝酒误了事。

厂里的食堂逢到春节、国庆、劳动节总要加餐。加餐前几天，机床边，宿舍里大家已经在议论这次会有些什么菜，要好的同事已经在商量怎样趁此机会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了。到了加餐那一天，厂里的节日气氛一下子浓起来了，标志之一是小卖部提早开门，而且香烟、老酒早早地就卖完了。早几天就发下了餐券。从厂长、党委书记到扫地工人，一视同仁，每人一张。晚饭开饭时间没到，食堂里已经挤得满满的。排在后面的人探头看先买到的人手里拿着什么，生怕轮到自己会发完了。凭券（有时还要自己付一角菜票）可领一份菜，一般是一块红烧大排或者一块红烧大肉，一个狮子头，一只酱油蛋，一点蔬菜，还有一碗极鲜的清汤。有时还会有一块熏鱼。有人就在食堂里吃了。家在附近的往往还舍不得，把菜带回家跟家人分享。多数人是拿回宿舍吃了。同宿舍的或是要好的同事聚在一起，把各人的菜放在一起，多半还要加点菜，或者开几个罐头，关起门来喝酒了。这时在宿舍的楼道里走一遭，总能听到各寝室里传出的笑谈声、劝酒声。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喝了酒发酒疯、闹事的。

大约是七十年代中的某一次过节，不知是什么原因加餐放在了中午。我跟宿舍里的几个老师傅喝了点酒，觉得犯困，上床睡着了。朦胧中一个老师傅把我推醒了：“小王快醒醒，厂车要开了。”厂车是送职工回市区的。我赶紧起床，总算没有误了厂车，却把到期应该归还的一本书忘在床上。书是从上海科技图书馆借来的。

岳阳路近肇嘉浜路口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在1970年改名为上海科技图书馆，并对社会开放。我们厂有一张集体借书证，可以去那儿看书、借书。星期六从厂里

回到市区时间还早，我就常常去图书馆。有时调休或者病假在家，我也会去走走。图书馆里有宽敞明亮的阅览室，有上千种开架陈列的中、外文期刊，其中不少外文期刊还是原版的。有着全套的著名的英文期刊如《Nature》，《Science》和早年的中文的科学期刊。一间房间的书架上放着几千种中、外文的参考工具书和图书馆收到的新书。馆内环境安静，读者很少。偶尔会见到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书生模样的人在查资料，显然是从附近中科院各研究所来的科研人员。我在这儿第一次看到一本叫The World of Learning的年鉴，专门介绍全世界各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读到过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介绍六十年代后期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大部头的科普书。这儿还可以外借书刊。那几年我和厂里几个朋友特别迷航空、航天，常借《Aviation Week and Space Technology》，《Machine Design》，《航空情报》这样的期刊看。有一期的《Machine Design》里有一篇文章介绍一所美国的大学组织新生参加比赛，要求制作一辆小车，用老鼠夹子上的弹簧做动力，看谁的车子跑得最远。后来我厂里一个朋友还把文章翻成中文在朋友间传阅。1972年，我和校友陈文乔（65届高中）和我厂里几个朋友从这些英文期刊里找了几篇跟太空飞行有关的文章翻成中文，配上插图，复写了几份，装订成册，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居然还出了一本书。因为常去，跟图书馆的几个工作人员比较熟悉了，碰到还会聊上几句。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可以看到好书的地方很不容易，我很珍惜，尽量遵守他们的规章制度，借来的书都小心保护，从来不过期。这次因为喝酒逾期还书，我心里很自责。一个星期后再去还书，倒也没有罚款或停借。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再也没有因为喝酒而误了事。

注：本文作者当过拖拉机手、磨床工、钳工，还当过工程师、图书馆员，现已退休。退休前是多伦多大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图书馆馆长。

接第46页：悼念毛金华同学

我总在想，当年我们这帮狗崽子，被逼着从狗洞里爬出来，恭恭顺顺地任人摆布。我们只能自认晦气，怪自己投错了娘胎。可金华，一个工人的儿子，根正苗红，他凭什么遭人歧视和迫害？

我又在想，如果当年金华分配在上海工厂，他现在应是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如果当年金华不去江西插队，他一定不要在壮年时，就匆匆离去。然而，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有的只是残酷的现实：一句“重在表现”的狗屁话一连“莫须有”的罪过都不需要一就能逼着金华离开上海，如今他又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还想起了金华15岁的儿子。啊，15岁！那是花样年华，情窦初开的年纪。但等着金华15岁儿子的，不是姑娘初恋的情话，而是父亲临终的嘱咐。我的儿子应和他一般大。我不敢想象，如果我至今还在淮北，我儿子会怎么样？他会失去自己的父亲么？也许，他会像金华儿子一样，少年丧

父，只能哭天喊地，只能无奈地抹干眼泪，带着心灵的创痛，独自去闯荡社会，在尔虞我诈中杀出一条生活的血路。

我更想起了金华妈，那位善良的母亲。我不敢想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怎么能送得了她的黑发儿子。她一定会哭得死去活来，她一定会拽住灵柩不放，她一定会跺脚，她一定会哀嚎：“金华，你怎能这么狠心，丢下你的老妈和你年幼的儿子，就这么一个人走了？”

我一边想，一边徘徊在费城的“友情公园”，象是在期待什么。也许，我在期待暑后的蟋蟀，展开它们银铃般的歌喉，为昔日的那位粉丝朋友，献上最终的“安魂曲”。也许，我在期待美丽的“黑鸭子”，用她们天籁般的和声，为金华这位好人，吟唱“一路平安”。也许，我什么都不期待。我只是沐着黄昏金色的余辉，庆幸自己能熬过淮北那段度日如年的插队岁月，健康地来到美国，健康地活在美国！

年前，同学间重接断线，恢复了联系。我急忙发短信给同学，打听金华的消息，传来的却是几个字的噩耗：“金华已经走了。”我心头猛地一沉。后来又了解到，金华48岁那年死于肝癌，丢下他15岁的儿子，口眼难闭。

金华原是我班的体育委员。他体格强健，篮球打得好，又是学校游泳队的健儿，人称“浪里白条”。这样的男生，自然博得女生的青睐。班上的卫生委员，是个女生，她就热衷于近距离地为金华点眼药水。我对金华则是崇拜。他虽只年长我一岁，但言谈举止俨然像个大哥哥，我就当了“跟屁虫”。那年暑期，我玩蟋蟀玩疯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蹬着拖鞋，有时还打着赤膊，直奔金华家，去看他半夜时刚捉到的蟋蟀。金华几乎每天半夜都会去汾阳路科学院附近的乱草丛中捉蟋蟀，一捉一个准。他还解释说，那里的蟋蟀，头大乌黑，身板厚实，脚劲就好，能抵挡住对方的猛攻乱咬。他多次怂恿我和他一起去，可我不敢，连向我妈提出的勇气都没有。“我妈可不管，”金华常自豪地说，令我羡慕不已。顺便说一句，金华妈真是一位慈母。她总微笑着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听凭我们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

我们常去找金华的邻居“黑皮”斗蟋蟀。金华嘴里衔着蟋蟀草，昂着头，迈开大步，走在前面，像个出征的英雄。我则小心翼翼地手捧着几个蟋蟀盆子，狗腿子似地跟着。一群野孩子，就这么蹲在地上，或趴在地上，小屁股翘得半天高，一起呐喊，一起助威。至终，赢的一方总趾高气扬，输的一方总垂头丧气。这般的欢乐和爽快，如今的孩子，想都别想。

可惜，同学间的友情和交往，竟被“文革”中的“血统论”扼杀了。金华是工人的儿子，是“红五类”，必须得和我这个“非红五类”子弟划清界线。我们不再往来，有时在学校偶遇，也都急忙忙地相互躲避，连招呼也不打。可金华从未训斥过我，也没动过粗，他的嘴是干净的，他的手没沾上肮脏。我的同桌葛温暖也是同样的厚道，并没因为她的英雄老子而英姿飒爽。她淡淡的微笑，透着人性的朴实和善良，传递着女性特有的“温暖”。

后来，不知怎的，金华，这个工人的儿子，忽地遭灾，在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至今都弄不懂，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或得罪了什么人，会挨“整”。“福”从祸来的是，

我们又恢复了交往，因为我们已经脚碰脚，都被打入“遭侮辱，遭损害”的另类。

金华的厄运一直延续到毕业分配。当时的政策是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金华，作为工人的儿子，理上和班上大多数“红五类”子女一样，分配在上海工厂，可他的去向却一直没有着落。一天，他匆匆来学校找我，说他妈为了他分配的事，想找毕工组谈谈，正在校门外等着。金华问我能否去把他妈领进学校。我有些不理解，金华就解释说，一些不喜欢他的人，正在校门口待着，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妈来找毕工组。我立刻明白，也顾不得对自己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金华妈领进学校。他们还真找到了毕工组的负责人，就争辩说，金华是工人的儿子，按阶级路线理应分配到上海工厂。不料，该负责人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党的阶级路线，还包括重在表现呢！”

很多个月后，金华又来找我，要我陪他去蒋衍老师的家。原来金华打算和严雪洲一起去江西插队，也好有个照应。严的申请批准了，可他的申请还没消息。金华怕去不了江西，会一个人被分配到更远更苦的地方，所以就想找蒋求情。蒋老师倒很客气，说如果他能帮上忙，他是一定会帮的，只是他没有实权，就怕有人从中作梗。蒋指着我说：“如果张立民去江西，肯定没问题。”我也打趣地回答：“那就把我的名额让给金华吧。”金华可没有半点开玩笑的心思，他重复着说，自己出身好，是工人的儿子。他据理力争，弄得蒋也十分尴尬。

离开蒋家后，金华告诉我，他那个读大学的哥哥也出事了，他妈为了两个儿子整天提心吊胆，所以一定要金华尽早去插队，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金华喋喋不休，激动得有些结巴：“我成份好，是工人的儿子，不让我进工厂，我也算了，如果连江西都不让去，还让人活么？！”

金华攥紧着双拳，他的整张脸因愤恨而扭曲，他的整个身子因愤恨而颤抖。

后来，金华终于去了江西，我也去了淮北。从此，我们各自沦落天涯，失去了联系。

如今，金华却走了！一个工人的儿子，在48岁的壮年时，就这么早早地独自走了，于心于理何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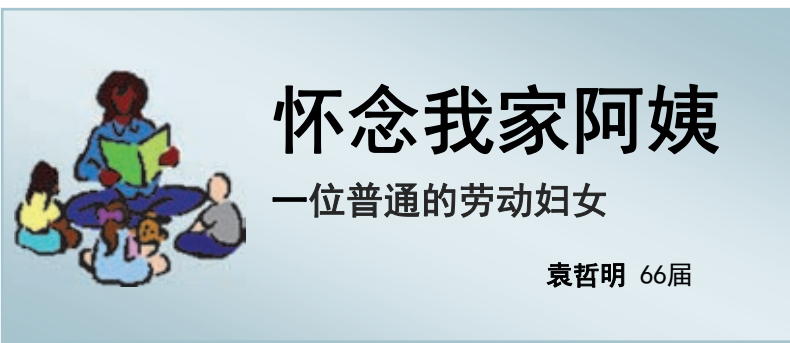
前不久收到我哥哥传来的几张照片，是他这次清明时节去绵阳拜祭我一位阿姨所拍的照片，墓碑上有她女儿女婿和她小辈的名字，同时也刻上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表达了我们对她深深的怀念！看到我哥哥代表我们姐妹献花、敬香、拜祭的照片，勾起了我对她无限的思念！往事的点点滴滴瞬间萦绕在我的脑海，一种想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普通而不平凡的阿姨的冲动油然而生，我想这应该是对她最好的敬献！

我的阿姨叫傅翠贞，是广东海南县人。但她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她是我们家原来的保姆，是一位极其平凡劳动妇女中的一员，她在我们家里前后干了二十多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把她的前半生完全奉献给了我们的家庭，辛辛苦苦把我们五个孩子带大。

阿姨出身贫寒，祖辈都是种田的农民，家里孩子多，她很小就和她的姐姐到广州来做童工，当时只有12岁，和她姐姐在一个丝织厂里干活，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小小的双手不得不整天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因为在滚

烫的热水中，浸泡的蚕茧才能抽得出丝来。他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几个小时，双手泡得又红又肿，可想而知，对这么大年纪的孩子来说，劳动的繁重完全超出了其身体的承受能力。在丝织厂干了几

年（具体几年，记不清了），其后她又和她的姐姐干过几种不同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来到曾驻扎在中国的韩国军队，帮助洗衣烧饭，期间她姐姐的女儿（她的外甥女）出生了。后来她姐姐因病去世，她就带着她外甥女，四处打工讨生活。最后来到重庆，在我娘娘（姑妈）家帮佣。抗战胜利后，她带着外甥女随我娘娘、姑夫回到上海。抗战期间我父母在重庆生活，我母亲是国立交通大学的学生，1942年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重庆，我母亲当时是在校二年级的学生也来到重庆；父亲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先在黔桂一带国民党军队参加与日作战，而后又回到陆军大学教书。四六年我母亲带着三个月大的哥哥从重庆返回上海，我娘娘就介绍阿姨来我家照顾我哥哥，这就是她在我家干活的开始。她外甥女（我们叫她雪莲姐）也就此来到我家生活，1948年我出生了，阿姨就负责照顾我们两个孩子。上海解放不久，我父亲因工作需要被派往香港工作，我母亲留在上海工作，阿姨就负责照看我们以及料理家务。1952年我父亲从香港调回上海工作，自此家里就“不太平”了。我哥哥是个极其调皮的小孩，五岁就上小学，小时候经常跟着一帮孩子会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如爬六层大楼的“水落管”，一不留神掉下来，其后果不堪设想。当然有人会来告诉，自然免不了我父亲一顿“尺子”。记忆中，我哥哥没少吃过我父



怀念我家阿姨

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

袁哲明 66届

亲的“尺子”，我阿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在一边暗暗流泪。所以经常有人上门告状，她只敢告诉我母亲，我父亲知道后，就训斥她：你这样包庇他（哥哥），是害了他。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被我父亲打过，因为我比较乖巧，是“小跟屁虫”，或许我做的错事，都算在我哥哥头上。当然后来他很有出息。父亲为了教育培养他，决定高中要把他送去寄宿学校读书。记得在位育中学读初中时，他的数理化很好，但语文很差，初三时，我父亲给他恶补语文，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学，自此学会了独立生活，而后又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

自从1955年后我的三个妹妹相继出世，（55年7月、57年1月、58年7月）阿姨的家务负担腾空而起，（那时她的外甥女为了减轻她的负担，离开我家去武汉水利水电学校读中专。）整日被买菜、烧饭、做菜，洗衣，照看孩子捆绑着，不但肩负着繁重的家务，还要承受沉重的精神负担。那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两件事。

五八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的中妹妹只有一岁半，那天我阿姨在小锅里热了牛奶放在桌上让它晾凉，自己去厨房准备我们放学回来吃的午饭。我妹妹那时肯定饿极了，迫不及待地用她的小手，仰着头，抓住小锅的边缘往外拉，当时她的高度还够不到桌子，她的用力一拉，把牛奶锅打翻，滚烫的牛奶全部倒在她的脖子上，也沾到了她的脸，她声嘶力竭的大哭，唤来了我阿姨，当她看到这一幕，吓坏了，魂灵出窍，定神后，马上带我妹妹去淮海医院急诊，进行清洗处理。晚上她战战兢兢地等着我父亲下班回来。她深知闯大祸了。自然我父亲责备她：不应该把会伤及孩子的物品放在他们能够得着的地方。那时我妹妹痛的整天哭，她也跟着掉眼泪，她悉心照料着我妹妹，每两天就带她去医院换药，除了做家务外，她整天抱着我妹妹，晚上也坐着抱着她，妹妹痛醒后大哭，她就摇晃她，让她能尽快睡去。这样日日夜夜的照料，我中妹妹的烫伤终于结疤了，因为骚痒，她不行地想要抓痒，阿姨又要不时地看住她，不要让她抓破了。在她全身心的照顾下，妹妹的烫伤终于好了，庆幸的是在她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当然在脖子上留下了永远退不掉的疤痕。

三个妹妹的抚养给阿姨带来了繁重的家务，他们小时候，如果有一个孩子生病要带去医院看病，她必须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家里有一辆儿童推车，有时候是一个坐着，两个站着，或两个坐着，一个站着。大妹妹大一点时，就是两个坐着，一个跟着。到医院看病，她既要照看生病的妹妹，还要照顾两个不生病的妹妹。

小妹妹一岁时又发生了一件使阿姨胆战心惊的事。

当时我小妹妹刚刚在学走路，阿姨家务忙，就把她放在学步车里，让她自由行走。那是一个酷暑，屋内极闷，以前家里又没有空调，为了有穿堂风，阿姨把大门打开。小妹妹在学步车里顺着走廊，一直溜步到楼梯口。突然阿姨听到我二妹妹的大声呼叫：阿姨快来！阿姨快来！听到喊声，阿姨急忙从厨房冲出去一看，惊恐万状：我的二妹妹正在凭她全身力气抓住学步车的圆圈，而我小妹妹和学步车正在走廊的楼梯边缘，阿姨吓出一身冷汗。那时我的二妹妹只有2岁半，如果不是我这个机灵而勇敢的妹妹及时拼命地拉住学步车，将会发生什么事？不堪设想。阿姨在我们家里，不但终日劳作，而且整日还要担惊受怕，她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阿姨小时候没有条件和机会上学，她是广东人，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叫她“阿翠”，我想她的正名傅翠贞也是我妈妈在当时上海户口登记时给她起的。小时候我们也跟着大人叫她“阿翠”。自从她亲手带大的外甥女，中专毕业工作后，就由原来一直称她“阿姨”改为“妈妈”，我们也由原来称她“阿翠”改称为“阿姨”。

在我妹妹们的记忆中，他们从来就称她“阿姨”。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想认字。五八年里弄发了本普及识字本，她叫我哥哥教她识字，学得很认真。我哥哥还清楚地记得：为了鼓励他教课的积极性，每次教完课，她都会给他五分钱去买零食吃。可惜，那时她的家务实在太繁重，根本没时间温故而知新，加上她那时年纪已偏大（46岁），而且一个11-12岁，才刚刚升入初中的孩子，有多少教学经验来教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中年劳动妇女？所以，阿姨老记不住教的新词，最终还是把所学过的单词都忘了，我只记得她只会写她自己的名字，似乎也是歪歪斜斜。

阿姨在我家二十多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起早摸黑，尽心尽力。每天5点钟不到就起床，出外排队买菜，6点多钟回来，马上烧早饭，七点钟左右帮我妹妹们穿衣起床，准备早饭，早饭后，送他们去托儿所、幼儿园。回家后就是洗菜烧饭、洗衣服……晚上九点钟要弄我妹妹他们睡觉，然后她继续干活。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既使你的手从不下冷水，许多人都会生冻疮。何况阿姨天天要洗菜洗衣服，当然免不了下冷水。过去根本没有洗衣机，更不像现在水龙头开出来就有热水。以前家里‘铜甬’里烧热水灌热水瓶是用来喝的。家里洗澡用热水，还得上‘老虎灶’去打。当时我们跟她说：放点热水洗衣服，冻疮会好一点，但她从来舍不得烧壶热水，当然这么大的一个浴缸，更不可能放那么多的热水去过衣服了。所以记得，每到冬天

她都生冻疮，常常是手指裂、冻疮烂，十指总是又红又肿，经常化脓流血，她仅仅擦一点防裂霜、冻疮膏，再用纱布包一下，仍然不间断地下冷水洗菜、洗衣服。现在回想起来，那刺心的痛一定犹如刀割，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有半桌埋怨。

时间回到文化大革命，家中发生的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是文革刚开始，扫四旧时期。当时几乎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解放前拍的旧照片：男的穿西装戴领带，女的涂口红穿旗袍，我家当然还有一些我父亲穿军装和一些生活在海外亲友的照片，特别是在台湾，或‘有历史问题’的亲友照片。想当初文革风横扫一切，但凡有这些旧照片的家庭都以最快的速度去销毁它，以免招来飞来横祸。当时我母亲也为这些照片担惊受怕，想尽快销毁它。起先母亲和阿姨以火烧的方式来处理旧照片，但因为数量较大，火柴点燃的效果不好，一是照片不容易烧毁，烟雾却过大，怕被周围邻居发现告发更是罪加一等。处理了一小部分照片后，我



母亲去上班了。白天阿姨就自己处理剩下的照片，她把她们撕碎丢到抽水马桶中冲掉。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一則她没有把照片撕得很碎，另外每次都把较多的碎照片放进马桶再抽水，结果抽水马桶给堵住了。母亲下班回来看到这种情况，自然很害怕。当时他们还心存侥幸：说不定明天马桶就通了。想不到一天比一天堵（其实后来知道，往马桶里丢撕碎的照片，我们不是仅此一家，当时是整座大楼家家户户都在做的事，而我们在二楼，从上堵到下，不堵才怪了。）三天以后，阿姨不得不到房管所叫他们来通马桶。两个工人来后，在厕所里弄了大半天，抽水马桶还是不通，他们只得到外面打开连接马桶的大粪便管，把塞住管子的碎照片都掏出来，马桶总算通了。可事情没有完，那两个工人一看是碎照片，知道肯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就告诉我阿姨，不许动挖出来的碎照片，说他们要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阿姨和母亲提心吊胆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母亲上班出门时形如“佷灶猫”，惶惶不可终日。下班回来时，也是胆战心惊，深怕又发生了什么。然后阿姨告诉母亲，她已经把那堆脏东西丢到垃圾桶内了。我母亲后怕地说：万一他们查起来怎么办？阿姨说：我不怕，就说我清理掉的，如果问起碎照片，也是我撕的放进马桶的。所幸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阿姨虽然没有文化，不懂政治，但她的良知清楚她主人的清白。在这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相信有许多象阿姨那样善良而纯朴的劳动人民，保护了不少无辜的人

们受到冲击。

阿姨虽然出身低微，但得到每一个认识她的人的尊敬。父母和我们孩子们都称她为阿姨，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叫她‘阿翠’阿姨。她是广东人，说着一口带着广东腔的上海话，周围邻居都尊称她为‘广东阿姨’。她为人和善可亲，总是一脸的笑容。小朋友到我家来玩，她总是笑眯眯的接待和招待，小学的同学齐正、蒋正宇，中学的同学洪懿华一定会记得我家的“广东阿姨”。阿姨和我们生活多年，她已经完全成了我们家的一员，父母长年累月在外忙于工作，我们的生活起居，甚至学习监督都是阿姨一手来管的，我们和阿姨的感情完全胜于和父母。小时候，阿姨在厨房里干活，我常常喜欢躲在她背后，突然在她嘴里塞进一个零食。零食是我的最爱，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她吃。当妹妹们大一点的时候，阿姨下午稍许有点时间可以坐下来。放学回来，我总喜欢缠着她听她讲她的过去，并让她教我讲广东话。可惜，她有空教我的时间实在有限，主观上我又没有想好好去学，到现在只记住广东话的‘1-10’和‘小孩’的发音，当初如果好好学，现在能多掌握一种方言有多好！

阿姨在我家一直干到1968年。她的女儿（也就是她的外甥女）到上海来生孩子，住在我家坐月子。一个月后她要回绵阳单位工作，为了照顾她的外孙女，阿姨他们祖孙三人一起离开上海。那天我们兄妹五人去火车站送他们，还没等火车离开，我们就忍不住放声大哭，离别的眼泪再也刹不住了。回到家里，想到阿姨，我们又抱头痛哭。这之后的一个多月，每想到阿姨，我们兄妹几个，都会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对一个人的感情有这么深，离别后的一个多月中，还因思念而流泪。

1971年5.1我哥哥结婚，阿姨特地从绵阳带着她的外孙女（她要照顾她）来参加他的婚礼。参加她亲手带大的第一个孩子的婚礼，她当然非常高兴。我们留她在家住下来。一年后我的大侄子出生了，阿姨又帮着我嫂子坐月子，精心照顾着大人和婴儿。直到1972年6月再次回绵阳。阿姨从来不计较她的报酬，记得当时我父母给她的工资从最初每月¥10，后来增加到¥12，又后来增加到1¥15。71年到我家后，她又闲不住，里里外外帮我们干家务，特别是我侄子出生后，更是尽力照顾，所以我父母给她每个月¥20。她硬不肯收，说：我来你家作客，我们两个人吃饭，怎么还要你们给我钱？结果父母就把它存在银行里。等72年6月他们离开时，父母就把这笔钱给她，她怎么也不肯收。我们不得不把钱寄去绵阳，不久钱又被退了回来，随后我们还是把它寄了回去。

阿姨在带大了她的外孙女，外孙后，86年她又再次来上海我家小住，那时我们五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工作了，其中三个孩子都结婚生子，看到我们都长得高高大大，对她很孝顺，她笑得都合不拢嘴。

我最后见到阿姨是在2000年回国探亲，在去西安到

成都的旅游途中，我和我先生特地去绵阳看望她和她的家人。见到阿姨的激动场面，至今记忆犹新：阿姨紧紧搂着我，高兴地连连叫着我的名字：哲明，哲明..，我也紧紧抱着她叫着：阿姨，阿姨..，激动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然后她让我坐下来问长问短，就像久别重逢的母女相聚，有说不完的话。虽然那时她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但头脑仍然清楚，身体很硬朗，我为之十分欣慰！我没机会在她身边孝顺，唯能留下一点钱作为对她的孝敬！但她还是一再推让，说她有钱。这就是一个朴实的阿姨！她只懂得奉献，而不索取任何回报。看着她那驼了的背，想着她一生辛劳，就是她以她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我们家大半个天。一个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辛辛苦苦带大了8个孩子（我们兄妹五人，外甥女和她的两个孩子）不由感到她的高大而让人肃然起敬！

阿姨最后一次来上海是2002年。她外孙女来上海工作，结了婚买了房，邀请她来小住，她总算可以享享清福了，那年是她整整九十岁。我哥哥和两个妹妹代表我们兄妹五人为阿姨在浦东的一个饭店喜庆她九十大寿。寿宴完毕，他们带她到浦东陆家嘴最热闹的地方转了转，然后带她到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参观，来到该会议中心沿黄浦江的观景平台，隔江观赏对岸浦西外滩的高楼大厦，看着弯弯曲曲的黄浦江一览无遗，来往船只穿梭不殆，风景极其优美，阿姨看得眼花缭乱，异常兴奋。我相信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回到绵阳后，2004年下半年阿姨不慎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胃口大减。虽然女儿全家精心照料，但因长期卧床，热疮溃烂不断，折磨多日，2005年终因年高体弱、整个机体衰竭而病逝，享年九十三岁。阿姨病逝后，上海的兄妹们去电深沉哀悼（他们没有及时通知我）并汇去一笔钱，请她的女儿在墓碑上加上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以表示我们对她永远的怀念！

或许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亲自到阿姨的墓前向她敬花、鞠躬来拜祭，但是她永远活在我（我们）的心中！谨此向她敬献我们永远的尊敬、爱戴和思念！



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存放着多达十九盒由一位著名华人学者捐赠的宝贵资料，其中包括五本英文书稿，大量英文文章底稿和演讲手稿，电函，及与名人的书信来往。这位国内鲜为人知的学者就是自一九四一年便旅居美国的伯父张歆海。在老一辈知识界，他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他在教育领域和政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歆海伯父从上海华童公学毕业后便进入清华学堂学习，一九一九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和国际关系，两年后荣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有一天，一位教授在班上说，只有两位学生的文章写得最好，一位是后来任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的斐光来先生，另一位是歆海伯父，而美国学生个个望洋兴叹。回国后，伯父先在北京大学任英文系主任，后在清华大学任英文教授，再后来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副校长。他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时，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曾聘用赛珍珠女士为中大英语教师，还把林语堂先生介绍给她，开启了他们俩人数十年的密切合作关系。伯父在一九三二年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随后任葡萄牙，波兰和捷克三国公使。

伯父有一位很特殊的学生，他就是我就读上海外语学院时的语法老师陆福遐教授。陆老师曾担任位育中学的教务长，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学生见他往往避而远之。陆老师来自江阴县，出身清贫，英语自学成才，他一心想进中大英语系学习。在入学口试的关键时刻，不巧遇到伯父。伯父认为他口语不流利，建议他延迟一年入学以提高口语能力，伯父的决定无疑对这位年轻人是一重大打击。不过陆老师见到我时似乎已忘记往事，当面赞扬伯父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打消了我担心被“穿小鞋”的顾虑。

歆海伯父被公认为才气横溢，学识渊博，融会贯通中西两学。上外英语系主任方重先生如此评论他：“你伯父是能用英文著书立说为数不多的人才。”一九五六年，Simon and Schuster 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 *The Fabulous Concubine*，该书以赛金花，太平天国及八国联军为题材，并融入他个人的外交生涯经历。张大千先生特意为此书书套作画，原著则保存在英国一博物馆内。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位育六二届有一校友曾想购买该书版权，请好莱坞名导演 Oliver Stone 拍成电影。

一九六二年，陈洁如女士移居香港后，欲与人合作写蒋介石的英文传记，经人推荐找到了最佳人选歆海伯父，两人以前都写过这方面的书，我伯父一九四四年写过一书 *Chiang Kai-shek: Asian Man of Destiny*，而陈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也写过对蒋的回忆。用中文或英文写传记的人比比皆是，写蒋也不缺人才，但是用炉火纯青的英文写蒋非

伯父莫属。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书很快脱稿，定名 *My Seven Years with Chiang Kai-shek*。台湾方面闻之大惊失色，由元老陈立夫出面写信劝阻陈洁如女士出书，后来用重金购买了版权（据云是三十万美金），该书就此夭折，手稿仍在胡佛中心可查。

歆海伯父一生信奉，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是一位有使命感的民族主义者，主张以孔学为治国之本，坚称马列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最终会被抛弃。他常说，中国千年不衰的原因是因为它有 *Continuity*。二次大战时，他没有像林语堂返回重庆抗战（林不久又回美国），伯父选择留在美国，奔走东西海岸各大城市发表演讲，介绍国民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争取美国民众的支持。他还担任驻美大使宋子文的特别助理，宋往往会深夜派人送急件或电报让伯父审定。尽管他与宋有私交，当亲戚求他找宋帮忙找工作时，他拒绝了，他说宋这个人不吃情面这一套。当时，美国好莱坞流行战争片以支持反法西斯斗争。歆海伯父也参加了 *So Proudly We Hail* 一片的

拍摄，担任主要配角。他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努力，并作出重要贡献，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激赏。在他的 *America and China* 一书中，他回顾历史，总结史实，预测中美两国迟早会走在一起。他还协助李宗仁将军起草备忘录递

交给美国参议院，敦促美国政要正视现实，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七二年尼克松访华证实了他的预言。该书再版时由他的朋友艾德加·斯诺作序。

五十年代，中印因边界发生冲突时，他在纽约时报载文，指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强加于中国的非法产物。以后又在纽约时报载文，强调钓鱼岛历来属于中国。当时能在美国主流媒体登文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华人屈指可数。即使在中日关系较好的时期，他在 *America and China* 一书中仍警告国人须提防日本的军事野心和扩张主义。近年来围绕钓鱼岛的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伯父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惊人远见。

一九七二年九月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歆海伯父从纽约启程访华，回到阔别三十多年日思夜想的上海。他似乎又回到了童年，他想吃蟹壳黄，他想重访幼时居住的“华兴坊”，老人因激动和劳累而一病不起，入住华东医院数周后不幸去世。美中友好协会在纽约为其举行了追悼会，黄华大使亲自出席并致悼词。

作为张歆海的亲侄子，往往被刮目相待；实际上，伯父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个名人，还不如说是治学严谨的长者。他的鞭策和熏陶使我日后无论求学或工作时得益匪浅。



我的伯父张歆海

(1898-1972)

We came from dust and to
dust we shall return.

张秉颐 61 届

我2009年移民美国后，因要照顾八旬老母一直住在兰辛的妹妹家中，托比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托比是我妹妹家养的一条“吉娃娃”小狗，2009年4月落户到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虽然它已满六岁，但在“孙子辈”里仍属小不点。托比有着纯正的血统，身材匀称，嗓音嘹亮，一身雪白油亮的皮毛上，点缀着片片浅褐色的斑点，两只尖尖的耳朵时常警惕地竖立着，一双圆圆的黑色大眼睛水汪汪的，似乎总是盈满了伤感的泪水。据说托比因为血统纯正，长得英俊潇洒，曾经是一条价值连城的雄性种狗，为繁殖优良后代立过大功。在过了生育高峰后，被主人送进了弃狗收容站，等候着好心人的领养。

之前，托比曾被几家人家抱走，但不知何故都被退了回去。最后抱养它的是一位养了七条“吉娃娃”的女士，她很爱托比，但托比性格孤傲，唯我独宠，极不合群，所幸那七只小狗不仅是它的同类，而且清一色是雌性，因而托比与女朋友们相处倒也还和睦，只是总给人形单影只可怜兮兮的感觉。女主人知道托比的心思，决心给它找一户爱狗的好人家，让托比能享受到充分的关爱。



托比的故事

姚方方 66届

托比来到我家，立刻成为人见人爱的宝贝，不仅因为它漂亮的外貌，温顺的性格，还有它对主人家的忠诚，都使它成为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宠物。

托比长得小巧玲珑，白白净净，身体没有异味，大家都爱抱它，不仅家人疼爱它，外人都都喜欢它。每当家里来了生人，它会围着大声吼叫，但只要客人把它抱在怀里，就会立刻安静下来，欣然聆听着人们对它的夸奖，安然享受着人们对它的爱抚。每当它外出溜达时，常会引来路人惊喜的目光，正在开车的会朝它微笑；迎面而来的会情不自禁站住，询问它的姓名和年龄；孩子们更是抢着抚摸它发亮的皮毛，嘴里不住地赞美“*He is so cute*”。可见托比的得宠真是非同一般。



托比的淘气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每当晚上家人围坐一起用餐时，托比总是乖乖地卧在外甥安德鲁的膝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大家吃饭，时不时伸出舌头舔舔嘴巴，一幅垂涎三尺的样子。一次安德鲁正往嘴里唆着面条，

长长的面条一头在他嘴里，一头还在碗里，谁知托比出其不意，伸长脖子张开嘴巴，突然间拦腰抢走了这根面条，等大家反应过来，托比已将面条吞进肚里，正吧嗒着嘴回味着美食的香味，顿时引得家人哄堂大笑。还有一次我正用墩布清洁走廊和厨房，地面上还残留着清洁剂，猛然间伴随着“踏踏踏”的狗蹄声，托比不知从何处飞奔而来，仿佛一个初上溜冰场的新手，它东倒西歪趑趄起起地在地上打着滑，一路出溜着进了厨房，把我逗得笑翻了天，它却蹬着一双大眼睛痴痴地看着我，好像在问：“有什么可笑的？”

托比最好玩的事是抓小花鼠。

我家的厨房外是一个连着花园的木质平台，常有小花鼠在此活动。托比每天都会隔着玻璃门观察花鼠的动向，一发现有花鼠出动，就象发现了敌情似的扯着嗓门狂吠起来，同时用爪子急切地挠着门。待我将门打开，它便如利箭般射出门去，勇猛地扑向它的敌人，只可惜花鼠此时早就溜之大吉了。于是它只能悻悻地在平台上瞎逛，东溜达一下，西晃荡一圈，等待花鼠的再次出现。日子长了，托比认定平台上有个洞是花鼠的窝，就经常在洞口守候，每

次从花园里玩耍回来，路过那个洞口是非去不可的。它像一个护家的忠诚卫士，自觉地保护着家园，我们虽被它的精神所感动，但还是常常会取笑它，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傍晚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忙完了家务，常喜欢在平台的木椅上歇一会，一边呼吸着户外清新的空气，一边欣赏着远处天边晚霞那变幻无穷的神奇和绚丽。此时托比会跑过来跳到我的膝上依偎着，我便将它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它柔软的皮毛，托比则舒服地闭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此情此景曾无数次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一种对弱小生命爱怜和保护的情怀油然而生。

回想在妹妹家居住的日子里，托比着实带给我无比的快乐和温暖，让我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渐渐排解了乡愁，不再感到寂寞。我要感谢至高而伟大的造物主，创造了如此奇妙而丰富的大千世界，让人类与动物能如此相互依存，和谐相处。

大自然给予我们如此之多，我们又该如何善待它呢？

提起米老鼠和唐老鸭，恐怕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与儿童都不会感到陌生。虽然创造这些可爱的动画明星的华特·迪斯尼先生早已作古，但他在半个世纪前所建立的娱乐王国，如今已在全球亚、欧、美洲开花结果。除美国本土的洛杉矶、奥兰多2处外，还在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等3处大放异彩。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浦东新区，也将建立全球第六座迪士尼乐园。与此同时发展的，还有迪士尼出品的电影、有关的书籍、文具、玩具、服装、纪念品、音像资料等附属产品以及上市的股票。迪士尼不愧是全球娱乐界的龙头老大，而我在这个娱乐王国中工作了近18个年头，其间所见所闻不乏有趣的故事，愿与大家分享。

1990年5月，我以美国公民子女的身份移居美国。在经过了工作和收入极不稳定的10个月，终于进入我梦寐以求的“迪士尼世界”。确切地说，是进入了位于佛州奥兰多市的“迪士尼世界”4个主题公园之一的“明日世界”内的中国馆。当时得知中国馆正需要美术人才，我就拿了1尊我用彩色面团捏制的弥勒大肚佛和1幅装在8寸白瓷盘内、我自己侧面的泥塑浮雕去应试。中国馆的经理F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很是欣赏，在面试了我的简历和英语会话能力后，又让我当场把一位游客的英文姓名译成中文，并用黑颜料书写在一幅红布上。我用我擅长的隶书，端正地为游客书写了他的中文姓名，客人和经理都很满意，遂当即被中国馆录用为商场的专职美术师。从此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迪士尼”打工生涯，主要是在白色的T恤上为游客手绘花鸟鱼虫、动物山水等图案；或是将游客的姓名译成中文后，书写在白纸、折扇、图片或T恤上。

“未来世界”与“世界精品屋”

“明日世界”主要向游客展示当今世界在工业、农业、医学、航天、运输、环保、传媒等领域最新的科技成果及其应用、这些新技术发展的远景及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影响等，知识性、趣味性很强，深受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喜爱。公园共有员工约2万人。我第一天去上班时，就被它约有4个足球场面积大的员工停车场惊呆了。各场馆的员工上下班，都需由园内后场2条公共汽车专线，把员工从更衣大楼送到各场馆后门。该公园共分成两大部分，其前半部分为“未来世界”，是由太空星球馆、大地馆、海洋馆、幻想馆、能源馆、汽车测试馆、航天体验馆、创造馆、生物馆等9大场馆组成。不少场馆的设计都非常人性化，游客不需步行，只要坐在自动的轨道电车内，就可既省力、又仔细地参观完全部景点。当游客乘车进入直径约30米的球状太空馆时，头顶马上出现满天星斗，导游车忽上忽下地盘旋上升，犹如坐在宇宙飞船内，观赏我们居住的地球与其他星球，既壮观又神秘。游客在海洋馆内，可以乘坐模

拟的潜水电梯，下沉到几百米的海底，就近观赏深海中的奇异生物及与鲨鱼共舞的工作人员。在大地馆的实验大棚内，无土栽培的自动控制水分与养料的瓜果蔬菜，比一般市场上的要大1到2倍，令人啧啧称奇。生物馆内的电影，可以带你人体内错综复杂的血管中遨游。汽车馆内可以使你体验到汽车在出厂前的碰撞试验，以及在65公里高速行驶时急转弯的刺激。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在幻想馆内观看3D的立体电影，它不但使你在视觉上感到身临其境，更在嗅觉、触觉上也能让你体会到独特魅力。

主题公园的第二部分是“世界精品屋”。它挑选了全球亚、非、欧、美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围绕着一个圆形的大湖，建成各具该国建筑特色的11个国家馆，宛如一个小型的世博会。由位于12点中心位置上的美国馆开始，顺时针排列有日本馆、摩洛哥馆、法国馆、英国馆、加拿大馆、墨西哥馆、挪威馆、中国馆、德国馆和意大利馆等11个馆。当初设计时，在中国馆与德国馆之间，预留了一块空地，打算建苏联馆，可惜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原本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苏联，已解体分成几个独立国家，国力及影响大不如前，此计划只能作罢。权宜之计，临时在空地上搭建了几座茅草屋顶的非洲风格的贸易小屋。

11个国家馆不但在外形上展示了它们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例如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罗马的海神喷泉广场、中国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玛雅人的金字塔等，还在各国馆内，以照片、实物或影像等形式，展示了各国独有的历史、文化、科技及工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每个馆还附设有民族风味的快餐厅和饭馆。中国馆是由“九龙饭馆”、“莲花快餐厅”、“永丰商店”、“柳荫阁”及“祈年殿”5部分组成。前3部分是由美籍华人Y先生向迪士尼总部承包及管理的，而后两部分则是由迪士尼直接管理的。以缩小1倍比例建造的天坛祈年殿内，每天连续不断放映360度球幕电影，形象地向全世界游客介绍当今中国的巨大变化及雄伟秀丽的自然风光。每位走出影院的观众，都对我们翘起了大拇指赞叹不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除了常规运作外，主题公园每年还必有两次盛大活动：一次是在每年三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举办的“国际花卉园艺节”。届时，整个公园被无数鲜花与盆景装饰得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犹如一个花的海洋。第二个大型活动是在每年九十月秋高气爽之际，会举办一次“世界美食美酒节”，历时1个多月。11个国家馆都会临时增设不少食品摊位，介绍并销售本国最有特色的小吃、点心及美酒。

书画表演和推销T恤作品

我的工作岗位，就在天坛电影院出口处的“永丰商



在迪士尼推销我的T恤画作

周国辉 59届

店”大厅内，每天从早到晚为游客们作书画表演及推销我绘制的T恤作品。我在工作台及四周都镶嵌有螺钿花鸟图案的黑色书桌旁，一面为游客翻译，一面将他们的姓名书写在白纸上、书签、画片、折扇或是T恤上；也可以根据游客要求，在白色或黑色T恤上绘制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及山水人物等。从设计、绘制到烘干，大约30至45分钟。游客们可当场取货，也可在3小时后为他们送到公园大门口，或是隔日中午前送到他们下榻的迪士尼所属的旅馆。

我最擅长的是临摹徐悲鸿大师的水墨奔马，仅寥寥数笔，一匹栩栩如生、鬃毛飞扬、四蹄生风的骏马就跃然衣上。我还在衣角上书写“马到成功”4个汉字，签上我的姓名，最后用红色绘制了一方“福”字印章，并用英语向游客解释，此画含意是祝你事业成功发达，生活美满幸福。平时在我工作的时候，总会有不少游客饶有兴趣地围在我的书桌前凝神观看，他们都为汉字书法会形会意之奇妙和握笔运笔之潇洒而叹为观止。我则趁此机会，一面为顾客解释汉字的起源、变化及含意，一面示范几个褒义的字词，如福、禄、寿、禧等，使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留下深刻印象。我把自己当作一名向世界传布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友谊使者，再苦再累也值得。虽然以前我也曾接触过水彩、油画、雕塑、木刻等美术表现形式，但要在柔软的T恤上作画还是很陌生。因此在应聘来迪士尼中国馆工作之前，我事先向一位来自北京的美术老师请教，初步了解了在T恤上作画的特点及用色的方法。上岗不到1个月，我就基本适应这项工作了。虽然每天工作近9个小时，但看到我的作品被广大游客喜爱选购时，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成就感。有一次一位大企业家，为了要在年终的员工庆祝会上发放纪念品，特地来信订购60件有奔马图案及50件有熊猫图案的T恤。我与另一位美术师突击了3天，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受到了经理的表扬。

中国馆的华人老板、华人员工以及员工生活

我所在的中国馆是由美籍华人Y先生与迪士尼签下20年承包合同的。我工作的“永丰商店”，主要销售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各类商品与纪念品。例如闻名世界的杭州丝织地毯、福建寿山石雕、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茶壶及龙井、武夷等地名茶、上海丝绸服装、儿童玩具、各式缀珠手提包、手绘丝伞、红木家具、内画鼻烟瓶及传统的中国食品及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因为价廉物美、品种齐全，很受各国游客喜爱。

中国馆共有近200名员工，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也有少部分是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还有一些来自越南、老挝、印尼等东南亚华侨，因为是同文同种，相处都很和睦。除大部分是当地具有公民或绿卡身份的华人外，还有一小部分是由迪士尼总部派的专员和从中国直接招聘来的学生工。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方言，但到了美国就像亲兄弟姐妹一般，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帮助，在工作中主动协作配合，犹如一个大家庭。

我在中国馆前6年，主要工作是为游客写姓名、画T恤。1997年后，经理把我调到一个玩具及纪念品的专柜上做销售员，并由于我在促销中能根据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游客，采取不同方法投其所好，柜台销售额一直呈上升趋势，老板又把我从普通店员提升到部门主管，并由原来按小时计算工资，改为每月领取固定薪水。除工作外，我在剩下不多的业余时间里，主要以阅读书报、看电视和影碟消遣，还随时把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所想以打油诗的形式记录下来，18年内也集得了五六百首。

迪士尼是专为广大游客提供娱乐与休闲的，所以越是节假日游客就越多。而美国的国定节假日也比中国多，尤其是集中在下半年，从7月4日的国庆节开始，马上就是大中小学的暑假旺季2个月；10月底的“万圣节”；11月底的“感恩节”；12月底的“圣诞节”。尤其是12月31日的除夕迎新年，游客要比平日多三四倍，营业时间要过午夜12时，我们更要工作到元旦凌晨2时才能下班。届时老板会亲自为每位主管发放红包。每逢国定节假日，我们都能获得双倍工资，但在节假日的前后3天内，不能迟到1分钟，否则会被取消双薪。

中国馆每年春节都要举办一次全体职工参加的联欢晚会，由我与一位来自上海“友谊商店”的女播音员一起策划，我主持。约2百名员工下班后脱去工作服，换上漂亮服装，聚集在天坛的祈年殿内。每人在领取了老板发放的内有1块银币的红包后，一面品尝着“九龙饭店”特制的丰盛自助餐；一面观看由中国馆各部门员工自娱自乐的小节目。凡在中国馆连续工作满5年的员工，均可享受每月有一次机会，可以免费携带3位亲友入园。全年共有36人次，也为员工的亲友们节省了不少费用。

迪士尼的事业历经几十年经久不衰，得益于创始人高明的创意及决策者们科学的管理与各部门有效的运作。甚至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其公司的股票不降反升，一股拆成两股。公园内容逐年更新，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而集科学性、趣味性、惊险性的游艺内容，也同样吸引着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国籍的成年游客。而与公园配套的十几个迪士尼度假旅店，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机场接送、住宿、饮食、公园门票、购物等一条龙服务。旅客仅凭一张住宿卡，即可方便地玩遍各个主题公园，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2008年2月，我达到了美国规定的退休年龄，即65岁10个月。于是在5月份，我向公司提出退休。虽说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要与自己朝夕相处十几年的同事与上司分手，心中也难免生出一丝凄凉。退休前2个月，偶遇承包商、美籍华人Y先生来店视察。我告知他即将退休并向他道别，感谢他10多年来对我的关照。第二天他特地来店里给了我1张支票，上面的附言是：“赠给我的老朋友与本店最有价值的员工”，面额是1万美元。

上海人都知道周小燕，她是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六十多年前，她满载声誉从法国留学归来，执教上海音乐学院，今朝已是桃李满天下的音坛泰斗了。她的许多得意门生都成了蜚声中外的歌唱家。在创作以她为主题的油画之前，我曾把她的生平列了个表，计算有多少因素要纳入构图里。

第一个因素自然是演唱。我对“小燕阿姨”的初次印象，被定格在舞台上唱花腔女高音那一刻。当时我是小学生，完全被她美妙的歌声迷住。记得曲名是《夜莺咏叹调》，大家都称她为中国的夜莺。有鉴于此，我在画中央天空中象征性地画了只仰头张喙的夜莺鸟伫立树梢头，外加一轮明亮的大月亮映衬身后，以突显夜莺之夜态。“小燕教授”的学生们当推第二个因素。她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如廖昌永、李秀英、张建一、魏松、高曼华，还有年轻一代的于冠群等。这些歌唱家不但在中国的舞台上，而且在世界歌剧舞台上引领风骚。我把他们画在图右侧，融入背后的参天松木，以示当年的幼苗，如今已成栋梁之材。第三个因素横贯构图下部，即黄

河水花和长城。它们蜿蜒交织，既像中华文化源泉之波，又似舞台上的谢幕鲜花。同时，它们触响了周小燕艺术生涯中的另一首著名歌曲《长城谣》。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上海的形象。周小燕出生在武汉，但她回国以后成家立业在上海。她长期生活和热爱的这方宝地，以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为代表被安排在画面的左侧，与为她伴奏的钢琴影象衔接叠印，构成运动感和时代强音感。

创作期间，我拜访了周小燕几次，画了多幅速写。看着96岁高龄的她每天给学生授课，谁能不佩服？她穿着三寸高跟鞋，在琴声中舞臂击拍，声音洪亮地要求：“圆溜溜，必须唱得圆溜溜！”我抓住了这个振奋向上的姿

态，她的右手扬起来，食指伸出作第一状。如果这是教课，那么她正在鼓励学生争取第一名。她的严格使那么多学生在国际比赛上获得冠军！如果这是唱歌，那么她正在发出亮丽的最高音。西方歌剧演员的水平，通常凭一个字

母就可以判断出来：C。能唱到 high C，那就可能是接近帕瓦罗蒂这一级别的。唱不到高音C的歌手不会太优秀。西方观众就等着听唱响高音C的那一刻。作曲家普希尼、罗西尼等常常让咏叹调高潮部分达到高音C，而且拖得很长，制造高潮，赢得掌声。其它因素，譬如运动员和艺术家时常把祥瑞物戴在身上，祈求最好的发挥。周小燕也一样，有块玉饰挂在脖子上，保佑她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紧张过后，我曾向我透露了保持精力超凡的秘诀：

“几十年来，我每天做气功，能进入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忘我自旋的境界。”更使我惊奇的是，这气功法是她无师自通的！构图里的最后一个因素，化身为第二只夜莺，正展翅飞向月中长鸣的第一只。它代表周小燕的丈夫张骏祥。张骏祥是耶鲁大学博士，已故著名导演

戏剧家。他和我父母是同事。记录我三、四岁时淘气样的几张精彩照片，就是他用携带回国的老像机捕捉到的。他和周小燕是同甘共苦的模范夫妻，一骏一燕比翼齐飞，就象那件著名的西汉青铜雕国宝。

我据此写了一首倚今声小词《燕归来》，油画完成出版后，题在赠她的画册扉页上：

荣不做，辱无惊。艺术铸心灵。高歌一曲万城倾。中华好夜莺。

育人苗，织星海。争领环球风采。长空回首伴君行。马踏飞燕盈。



燕飞莺鸣

封底油画《周小燕》创作手记

汤沐黎 66届



油画《周小燕》

汤沐黎 66 届